

延安

精神探索

魯直文集

魯直著 魯曉鵬編

香港大學出版社開放取用電子書

延安精神探索

延安精神探索

魯直文集

魯直 著

魯曉鵬 編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https://hkupress.hku.hk>

© 2026 香港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88-8946-85-3 (平裝)

版權所有。未經香港大學出版社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電子或機械）方式，包括影印、錄製或通過信息存儲或檢索系統，複製或轉載本書任何部分。

10 9 8 7 6 5 4 3 2 1

新世紀印刷實業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編者序	1
魯直自傳 (1953 年)	21
魯直文章	29

一、陝甘寧邊區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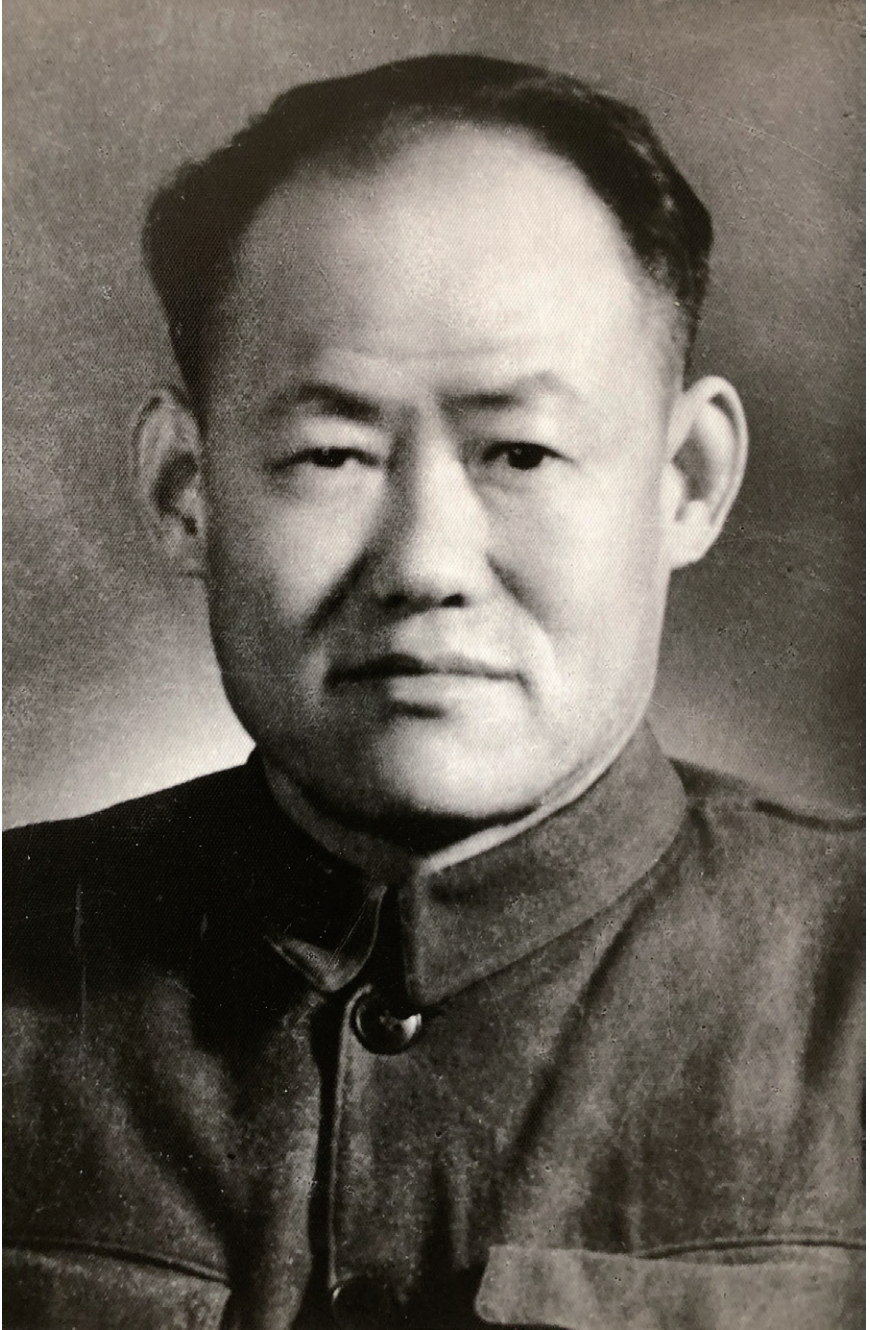
1. 對「集體」開荒意見	33
2. 論農村支部在今年生產中的作用	35
3. 南區合作社運鹽隊是怎樣組織起來的	39
4. 延安南區發展婦紡的經驗	42
5. 模範的白塬村：勞動英雄石明德講，魯直記	46
6. 組織模範村之間的參觀	54
7. 關於鄉長工作	55
8. 開展「五母」運動	56
9. 關於小學教育問題	61
10. 靖邊的識字組和黑板報	68
11. 靖邊植樹的經驗	73
12. 靖邊改良土地的三種新方法	77
13. 靖邊楊橋畔水利調查	80

二、軍隊政治與文化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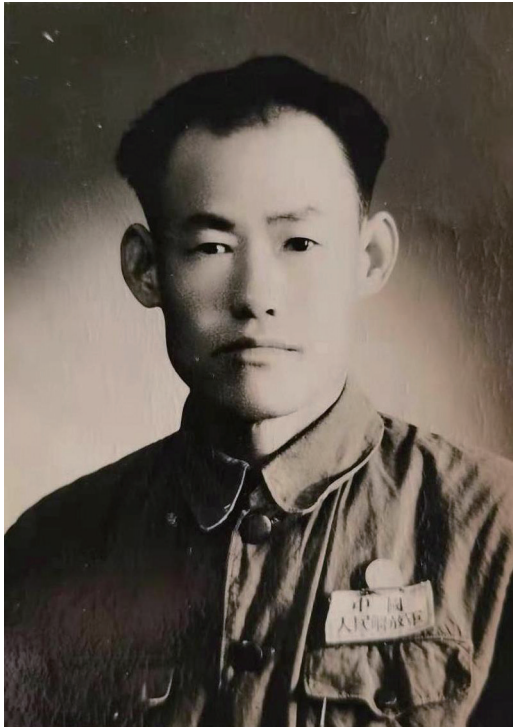
- | | |
|--|-----|
| 1. 政指傅秀芳同志的領導方法和作風 | 89 |
| 2. 開展邊區部隊的聯手運動 | 95 |
| 3. 一年來宣傳工作基本總結與今後的意見：1949年4月26日在野政
宣傳會議上的發言 | 98 |
| 4. 部隊文藝工作的情況與今後的任務：在西北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
大會上的報告 | 108 |
| 5. 附錄：新聞報道。西北舉行首屆文代大會，號召發揚過去陝甘寧
邊區人民文藝運動的正確方向，並討論開展各兄弟民族的文藝
工作問題 | 114 |
| 6. 貫徹部隊速成中學的教育方針：1951年4月13日在速成中學
會議上的報告 | 116 |
| 7. 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建立強大國防軍：紀念建軍24週年 | 125 |

三、新中國經濟發展

- | | |
|---|-----|
| 1. 陝西省工業建設的開端 | 135 |
| 2. 在工業企業中開展群眾運動的若干經驗 | 139 |
| 3. 附錄：新聞報道。重慶、西安市委動員全民開展增產節約運動，
立刻行動起來多多增產糧鋼 | 148 |



1. 魯直肖像之一



2. 魯直肖像之二



3. 魯直與夫人林佩丹（林縵華、林美珍）於蘭州市，1951年前後



4. 魯直與林佩丹，西北軍區，1950年代



5. 魯直（後排左二）與甘泗淇、李貞（前排右二、右三）等軍區領導同事



6. 魯直在北京參加全軍宣傳工作會議，1950年前後（前排右一）



7. 魯直在朝鮮，抗美援朝期間（左二）



8. 左起高劍夫、魯直、王永年、李玉欣、莫耶。西北軍區《人民軍隊》報社門前，1952年前後。



9. 魯直在西北軍區運動場上（前排左）



10. 魯直在西北軍區工地勞動



11. 魯直（後排左二）調離西北軍區時，與林佩丹以及軍區同事合影，1954年



12. 魯直與橫山縣魯家河親人合影，1954年，林佩丹拍攝



13. 魯直（二排左四）與陝西省委工作檢查團在延安，1958年



14. 魯直與西安市經濟委員會全體同事於西安，1962年



15. 魯直在會上發言，西安



16. 魯直與家人在西安



17. 魯直全家合影，北京，1964年



18. 魯直與魯曉鵬，北京火車站，赴江西幹校前夕，1969年前後



19. 陝北橫山縣魯家河風光，2014年夏



20. 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辦公廳舊址，2021年，魯小燕拍攝



21. 延安中共西北局組織部舊址，2021年，魯小燕拍攝



22. 魯曉鵬與女兒魯若蘭 (Caroline Lu) 在魯直、林佩丹 (林縵華) 墓前，陝北橫山老家魯家河村，2024年7月

編者序

魯曉鵬

啊，延安，
你這莊嚴雄偉的城牆，
築成堅固的抗日的陣線。
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
在歷史上燦爛輝煌。

《延安頌》，莫耶詞，1938年

在今後支部黨員中，必須使得邊區農民「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倉有餘糧」，人人豐衣足食起來。如果哪裏還有民不聊生、家徒四壁的農戶，那麼，那個鄉的支部工作就做的不好。今後判斷支部工作的好壞，應依該鄉人民生活的好壞為標準。

魯直，〈論農村支部在今年生產中的作用〉，1943年

一、延安研究，延安精神

本書的目的是通過一個具體個案、一個歷史人物、他的寫作和相關原始材料來進一步加深對所謂延安精神的探索。延安研究是當下海內外學界的一個重要議題，而人們所倡導的延安精神在中國國內是主導性話語。

首先回顧一下相關歷史、時間表和重要事件。明朝末年，陝北農民起義軍轉戰中國各地，撼動明朝政權。其中最著名的是出生於延安府、當時米脂縣、今為橫山區的李自成。他攻克京城，推翻明王朝。時至20世紀，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之前，劉志丹等人領導的陝北紅軍在陝北活動，並一度在橫山縣一帶成立蘇維埃政權。1935年，從南方來的中國工農紅軍到達

陝北，長征結束。1937年1月，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它成為中國紅色政權的中心。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這是中華民國內由共產黨領導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特別行政區。直到1948年初，中共中央離開陝北去華北，這段時間被稱為「延安時期」。

延安精神是中國社會中乃至學術研究界裏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1968年5月3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延安精神」這個詞組最早出現於此。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此篇文章對延安精神的闡述不免極端、片面和左傾。現在一般認為，延安精神的主要原則和方針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調查研究，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放思想，理論聯繫實際，找到適合中國具體國情的方案，自力更生，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¹ 延安研究也是當代中國史的一個研究重點，涉及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誠如延安研究學者孫曉忠教授所言：「延安的革命實踐如何在對晚清以來中國問題的回應中，將中國革命的難題性呈現出來，並為今天中國如何再次創造出一個新的共識和共同體提供靈感。」編輯相關的資料，「不僅試圖保存其史料價值，而且想通過對原始資料的再呈現，展現這段歷史中蘊含的普遍性意義。」² 不同於那些收錄眾多作者文章的選集，我們編纂一部獨特的一個人的文集，讀者從中能夠清晰地體驗這段歷史進程和思想發展的連貫性、有機性、整體性。

本書要介紹的人物是魯直。魯直，原名魯嘉廉，陝西省橫山縣人（今陝西省榆林市橫山區人），出生於1914年。1928年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先後擔任東鄉赤衛隊大隊長，橫山縣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長、財政部長，中共西北局統戰部幹事，西北局組織部組織科長，西北局辦公廳秘書，綏遠省伊東工委書記，陝甘

1. 有關「延安精神」的英文表述，見 Chen Qingqing, Hu Yuwei, and Zhang Changyue, “Yan’an Spirit an Inspiration in Guiding the CPC to Advance National Rejuvenation,” *Global Times*, Nov. 1, 2022。文章如此定義「延安精神」：“The Yan’an spirit, which was forged during this period, has become the CPC’s most precious treasure. It calls for firmness in correct political orientation,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and developing self-reliance and encouraging pioneering efforts.” 鏈接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11/1278485.shtml>。

2. 孫曉忠，〈創造一個新世界——延安鄉村建設經驗〉，載孫曉忠、高明編，《延安鄉村建設資料》，第1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頁16。

寧邊區靖邊縣委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第一野戰軍和西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兼文化部長，延安電影製片廠董事，新華社西北野戰分社社長，陝西省委委員，陝西省計劃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中共陝西省委工業部長，西安市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墾部科委副主任等職。1971年，在江西省永修縣的「五七幹校」去世，終年57歲。

在魯直幾十年的豐富多彩的革命生涯中，他參與和主持了各類工作：陝甘寧邊區的地方工作和農業生產，西北野戰軍的政治工作，陝西省工業和經濟發展。期間，他撰寫和發表了大量文章。這本書收集了他的21篇文章，兩篇有關他的《人民日報》新聞報道，和他於1953年寫的自傳。其中15篇文章來源於1940年代在延安發行的《解放日報》；4篇是他在第一野戰軍、西北軍區的報告、發言和文稿；一篇文章在1950年代發表於《人民日報》；另一篇文章發表於陝西省委主辦的期刊《思想戰線》。有些稿子以前沒有和公眾見面。應當說，他的一些文章在當時有很大的閱讀量和影響力。根據魯直的工作性質和從政階段，文集按時間順序分為幾個部分：一、陝甘寧邊區建設，二、軍隊政治與文化工作，三、新中國經濟發展。今天閱讀這些文章和寶貴的歷史資料，有助於人們了解中國革命歷史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程。

《解放日報》於1941年在延安創刊，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從1942年9月起，它也成為中共西北局的機關報。1947年，國民黨軍隊攻陷延安，《解放日報》停刊。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後半期和解放戰爭初期發行的最重要的報紙。本文集收錄了魯直從1942年5月至1946年12月的五年期間在《解放日報》發表的15篇文章。³在這段期間，他先後任職於中共西北局、陝甘寧邊區靖邊縣委和西北野戰軍。這些文章集中體現了延安精神，而這種精神也在他後來的工作和寫作中展示出來。

3. 在《解放日報》發行之前，魯直也為陝甘寧邊區其他報刊撰文。見魯直，〈在何紹南蹂躪下橫山民眾苦矣！強迫停止農作修築碉堡，收刮民眾存糧強拉民夫〉，《新中華報》（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廿六日星期五），第三版。魯直，〈靖邊徵收救國公糧中的幾點經驗〉，《團結》第24期（1940年4月8日），頁28。魯直，〈靖邊的優待抗屬工作〉，《團結》第25期（1940年6月8日），頁19。魯直，〈反對「四大怕」〉，《黨的生活》第2期（1941年11月25日），頁37。

魯直的文章不僅是他個人的作品，而且是反映了一個廣大的歷史風貌，所謂「延安精神」、延安作風、延安道路。⁴他是這個精神形成和鑄造過程中的一位參與者和實踐者。魯直的文章和活動體現了這樣的精神。魯直經歷了陝甘寧邊區的建設和發展，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延安整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設。因為他的職務和工作，他寫出了大量的對這些事件及時而有針對性的文章。他的一些文章或被用作黨校學習班的教材，或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被反復收錄在相關的文集裏，比如《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延安鄉村建設資料》，以及其他選集。⁵他的文章也被刊登在相關網站，比如《陝甘寧邊區紅色記憶多媒體資源庫：延安精神庫》。⁶在中國大陸以及海外，他的文章被研究中國革命的學者引用。⁷他在《解放日報》

4. 有關「延安精神」的各種討論和定義，見陝西省圖書館建立的網站，《陝甘寧邊區紅色記憶多媒體資源庫：延安精神庫》，<https://www.sxlib.org.cn/dfzy/yajs/>。早在1970年代，美國學者馬克·賽爾登（Mark Seldon）提出「延安道路」的觀點。見Mark Seldon, *The 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中譯本，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崇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另見新作，美國學者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著，石岩譯，《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英文版：Accidental Holy L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Nor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2]）。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於1990年在北京成立。鏈接https://www.1921.org.cn/zzjg/2022/02/10/detailed_2022021016414.html
5. 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第5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頁424–32。孫曉忠、高明編，《延安鄉村建設資料》，4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本書收錄魯直三篇文章，見第1卷，頁364–67、562–69；第3卷，頁327–33。
6. 見網站《陝甘寧邊區紅色記憶多媒體資源庫：延安精神庫》。魯直，〈南區合作社運鹽隊是怎樣組織起來的〉，https://www.sxlib.org.cn/dfzy/yajs/qwts_5014/yajs/nqhzsxlx/201701/t20170109_589091.html。魯直，〈延安南區發展婦紡的經驗〉，https://www.sxlib.org.cn/dfzy/yajs/qwts_5014/yajs/nqhzsxlx/201701/t20170109_589090.html。魯直，〈關於小學教育問題〉，https://www.sxlib.org.cn/dfzy/sjk/wxjl/slhb/sngmgjdsxlxdwjl/201704/t20170425_679920.html。
7. 引用和討論魯直文章的部分相關學術論文，涉及婦女問題、家庭問題、開荒種地、勞動方式、邊區經濟發展、共產黨幹部的工作作風、黨與群眾的關係、中國革命，方方面面。見董麗敏，〈組織起來：「新婦女」與「新社會」的構建——以延安時期的婦女紡織生產運動為中心的考察〉，《婦女研究論叢》114期（2017年11月第6期），頁10–22。本文曾於2017年在德國弗萊堡大學漢學系主辦的「延安與中國的社會主義」（Yan'an and Chinese Socialism）工作坊上宣讀。王穎，〈走出家庭與鞏固家庭：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婦女解放（1937–1945）〉，《開放時代》第4期（2018年），頁12–35。程文俠、李慧，〈革命目標的裂變與群眾路線的轉向：1940年代中共婦女政策的溫和化〉，《社會》第39卷，第3期（2019年），頁210–40。Harlan David Chambers, *Revolutionary Times: Temporalities*

發表的諸篇報告，比如〈對「集體」開荒意見〉、〈南區合作社運鹽隊是怎樣組織起來的〉、〈延安南區發展婦紡的經驗〉、〈關於小學教育問題〉、〈靖邊楊橋畔水利調查〉，已成為經典性文章。他所講述的陝甘寧邊區人民說實話、幹實事的作風被奉為優良的革命傳統。他的文章屬社會學、傳播學、政治學、歷史學的範疇。當一些學者分析延安時期的文學和藝術時，他們也時常引用他文章的觀點和論述作為佐證及參照。

在1949年之後，中國在很長時間裏對個體發家致富的問題和生產發展的所有制問題，糾結不定，反復搖擺，對甚麼姓「社」、甚麼姓「資」，爭論不休。極左思潮一度佔據上風，農村和城市不停地割「資本主義的尾巴」，農民保留一定的自留地都很困難。結果農村凋敝，農民越加貧困。改革開放之初，國家逐漸對社會主義有了新的定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允許各種形式的所有制存在，包括私有制。這個問題早在延安時期，就有過論爭。重溫魯直等人那時的文章有現實意義。他們的文章好像是針對1970年代末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問題。以下我們引用魯直的文章，〈論農村支部在今年生產中的作用〉。此文在1943年2月初發表於延安的《解放日報》。

同時在這裏又應該糾正一個口號，就是過去把反對一部分幹部的貪污腐化，擴大成為一般的在黨員農村中，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所以個別地方就造成了某些黨員和群眾的生產不積極，而害怕發了財，人家說他「資本主義思想」發展了。一部分群眾則認為共產黨員愛窮不愛富，比如1941年徵糧，一斗四升麥子折一斗小米，群眾就說，共產黨員是窮光蛋，生下窮肚子，愛吃小米不吃麥。這些都說明了對於邊區的建設認識問題上，還不夠清楚。因此在今後支部黨員中，必須使得邊區農民「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倉有餘糧」，人人豐衣足食起來。如果哪裏還有民不聊生、家徒四壁的農戶，那麼，那個鄉的支部工作就做的不好。今後判斷支部工作的好壞，應依該鄉人民生活的好壞為標準。

of Mobilization and Narratives in China's Revolution (博士論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022)，頁113、115。尹雪，〈由秧歌劇探析陝甘寧邊區的婦女工作〉，《國學》第11卷，第3期（2023年9月）：頁322-27，鏈接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3050>。

魯直明確指出，貧窮不是光榮，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不應當是「窮光蛋」，致富也不是資本主義思想，農村黨支部的任務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人豐衣足食才是邊區人民的生活目標。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考慮成立經濟特區的問題，比如深圳特區。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敏銳地指出：當年的陝甘寧邊區就是個特區。要摸著石頭過河，尋找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這正是延安精神在新的歷史時期發揚光大。魯直等人當初在延安的思考在今天仍耐人尋味。

魯直生平簡介

魯直（魯嘉廉）出生於一個貧窮農民家庭。隨著他的大哥魯嘉禮和二哥魯嘉順年齡的增長，家裏的勞動力增加，家庭生活逐步改善。於是家裏人就商量讓家裏最小的男孩子去上學。那時橫山縣城有一所高級小學——橫山縣第一高級小學。魯直的家鄉魯家河距縣城有100里路程。他的大哥魯嘉禮比他年長10歲，送他從魯家河上學的事就由他大哥完成。魯嘉禮的孫子魯利國回憶他從爺爺那裏聽到的關於他三爺（魯直）的往事，說道：

記得我小時候爺爺對我講：那時你三爺只有十幾歲，我趕了兩頭毛驢馱著兩口袋綠豆，哥倆一路說笑，一整天走了100里地到學校去報到。你三爺看到別人的家長都搭個搭襖，裏面裝著響洋來送孩子上學，就問：「大哥，為甚麼人家來上學都背個搭襖，裏面裝著響洋咣當咣當的來了，咱們怎麼趕著毛驢馱著綠豆來了？」我爺爺說：「咱家沒錢，要用綠豆在縣城集市換成錢才能給你交學費。」綠豆是當時陝北最貴的一種農作物。搭襖是以前陝北人用於出門時裝東西的一種器物，前後各一口袋連在一起搭在肩膀上。響洋是陝北人對銀元的俗稱。

1927年，13歲的魯直開始就讀於橫山高級小學。後來一大批該校的師生參加革命，魯直便是其中一個。魯直在他的〈自傳〉裏講到這段經歷。

橫山縣是陝北革命搖籃。在蘇維埃運動和抗日戰爭初期，魯直生活和工作在陝北橫山。歷史上，劉志丹帶領西北紅軍兩次攻打橫山城。1935年秋，劉志丹第一次攻打橫山城，於農曆八月初九（公曆9月6日）帶領部隊集結在魯家河，即魯直的家鄉。作為口述歷史，據魯家河後人回憶，劉志

丹住在魯家河兩戶人家，其一是在「陽砭」的魯直家。陽砭是指向陽的山坡。魯利國小時候聽他爺爺講講述當年情景以及他三爺（魯直）的行動：

劉志丹打橫山縣城，有一次部隊駐紮在魯家河前後溝有十里地，司令部紮在陽砭上和背砭上，出發前動員令是在陽砭上作的，因為咱們陽砭上院子有臺階，靠窖洞處高。我爺爺講劉志丹個子不高，臉紅楚楚的，手一揮一揮的講話。當時有個拓四先生，他是小理河流域一個紳士一樣的人，會看病。三爺當時因為生病跟他學藝。劉志丹部隊駐魯家河時請拓四先生給戰士看病，就是我爺爺背著藥箱的。我爺爺講，當年我三爺說他和拓四先生學藝是假，可能是搞地下工作的幌子或怕家裏人擔心。

魯直加入劉志丹隊伍行列，跟他的隊伍走了。《橫山裏下來些游擊隊》等《信天遊》風格的民歌唱遍陝北。

對面（價）溝裏流河水，
橫山裏下來些游擊隊。
一面面紅旗嶮畔上插，
快把咱們的游擊隊迎回咱家。
滾滾的（那個）米湯（啲）熱騰騰的饅，
招待咱游擊隊好吃喝。
三號號的盒子（啲），
紅（個）纓纓（啊），
跟上我的哥哥鬧革命。
你當兵，我宣傳，
咱們一搭的鬧革命多喜歡。
紅豆角角熟南瓜，革命成功了再回家。

1938年，魯直在延安橋兒溝的中央黨校學習，長達六個月。之後五年，他任職於延安的中共西北局。1943年，他參加延安整風運動，聆聽了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毛澤東最初在1941年做了這個報告。這份報告後來成了延安整風的重要文件。以下是他闡釋「實事求是」的著名論斷：

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⁸

毛澤東在延安做的這個論述指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工作作風。魯直便是這個歷史時期的一個產物和參與者。

在陝甘寧邊區工作期間，魯直撰寫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討邊區的建設和生產：農業、牧業、林業、開荒種地、興建水利、植樹治沙、土地改良、辦合作社、婦女紡織、小學教育、識字掃盲、鄉村治理、移民政策、「二流子」改造。他不斷總結經驗，頻繁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他的文章反映出邊區人民鮮活生動的社會實踐，在邊區得到巨大反響。1944年，魯直被中共西北局調任靖邊縣委書記。由於他在靖邊縣的卓越工作，他被陝甘寧邊區評為「模範縣委書記」。

值得一提的是，30集熱播電視劇《陝北漢子》（2011年）的主人公白文煥與魯直的交往。這位西北傳奇人物生活在靖邊。魯直任靖邊縣委書記時，登門拜訪白文煥，共商邊區建設事宜。白文煥去世後，魯直在靖邊主持追悼會紀念他。

魯直是農民家庭的兒子，有著倔強自立的性格，也有與普通人一樣的對自己家人深厚的愛。有一次他大哥的兒子魯宜民去延安看他，一見面魯直就讓侄子不要走了，要送他去上學。魯宜民回答說，他已經在家裏管事了，所以不上學了。當時魯直只說了一句：沒出息。然後再也不提此事。

8.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1），頁801。

他又問了一些家事，侄子說他奶奶去世了。魯直聽到母親去世的消息就哭了。這是魯宜民唯一一次看見他三叔魯直哭。

1945年，解放戰爭開始，解放軍擴編部隊，需要吸收優秀的地方幹部。中共西北局領導把魯直介紹給西北野戰軍領導，說：這是我們的模範縣委書記。從1945至1954年，魯直先後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宣傳部長、西北野戰軍及第一野戰軍宣傳部長和文化部長、新華社西北野戰分社社長。他參加了保衛延安戰役、蟠龍戰役、羊馬河戰役、兩次榆林戰役、宜川瓦子街戰役、荔北戰役、寶雞戰役（西府戰役）、西安解放戰役、蘭州解放戰役等。

在魯直的〈自傳〉中，他寫到自己參加了西北野戰軍在寶雞戰役之後於土基鎮召開的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受益匪淺。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在國內播放的電視劇《西北歲月》，該劇的第30集再現了1948年在陝西洛川縣土基鎮召開的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的場景。會議總結了寶雞戰役的得失和經驗教訓。會議氣氛緊張激烈，彭德懷司令員做了慷慨激昂的發言。追溯歷史原貌，當時魯直便列席會議，坐在會場中。

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魯直身為部隊高級幹部，經常與戰士摸爬滾打在一起，深入連隊，調查研究，做戰時的宣傳工作和戰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撰寫了如何做好部隊思想政治工作的報告，受到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的高度評價，並在全軍推廣。這樣深入、細緻、有針對性的宣傳工作，有效地鼓舞了全體指戰員的士氣，提高了他們的覺悟，推動了革命戰爭的發展。

在第一野戰軍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領導下，他參與、組織、實施了著名的西北新式整軍運動。這種「訴苦」教育激發了戰士的鬥志，有效地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他在西北軍區的講話：〈一年來宣傳工作基本總結和今後意見：1949年4月26日在野政宣傳會議上的發言〉，詳細總結了這次運動。毛澤東專門撰寫〈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一文，盛讚西北的新式整軍運動，將它的經驗介紹到全國其他野戰軍。⁹

從1946年到1954年，因為職務的原因，魯直也是西北地區文藝工作的負責人之一。他要新的解放區貫徹和實施在延安形成的文藝政策。

9. 毛澤東，〈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1），頁1291-96。

1949年5月，西北野戰軍攻克西安市，他和同事立即著手闡釋和傳播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號召文藝工作者踐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在西安，魯直領導的部門陸續布置放映蘇聯電影和東北電影製片廠製作的革命題材的新電影。1950年9月，西北首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西安舉行。同時，西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成立，其領導層包括柯仲平、魯直等人。會議要求西北各地區和各族民族的文藝工作者促進民族團結，發揚陝甘寧邊區建立起來的文藝政策，為西北的發展和建設貢獻力量。¹⁰

在全國解放後的1950年代初期，魯直在蘭州主持的西北軍區宣傳部和文化部是當時西北地區的文化重鎮，一個人才濟濟的場所。這裏聚集了一批才華橫溢的文化工作者，包括《人民軍隊報》主編莫耶（《延安頌》歌詞作者）、作家杜鵬程（小說《保衛延安》作者）、畫家黃胄、攝影師杜修賢等人。日後他們復員轉業，奔赴各自的工作崗位，在新中國的文化和宣傳戰線上取得了驕人的成績。1954年，魯直40歲，也從部隊轉業到地方。他離開西北軍區時，部隊給他評定的軍銜為「准軍」。

根據部隊要求，他於1953年寫了一篇〈自傳〉。他回顧自己家庭出身，描繪陝北地區的社會狀況，講述自己參加革命的經歷，並深刻分析自己的思想發展。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個人小傳。它幫助讀者了解一個革命者的人生軌跡和內心世界。

從1954年至1963年，魯直在陝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工作，先後擔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陝西省計劃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陝西省工業部長、西安市委書記。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在陝西的實施，他起了重要作用。1956年，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陝西省工業建設的開端〉。正如他在文中指出：「陝西省是祖國的內地，具有發展工業的有利條

10. 延安整風運動和與之相關的文藝政策的形成，一直是海內外學者的研究熱題。1942年3、4月間，丁玲、艾青、王實味、蕭軍等作家陸續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議論延安社會的方方面面。毛澤東覺得有必要統一文藝界思想和認識，於是在同年5月召開座談會，寫下〈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於10月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此時魯直是中共西北局的地方幹部，雖然他也為《解放日報》撰文，但並沒有介入文藝問題的辯論。有關不同角度的學術研究，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魏時煜，《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6）。

件，國家從合理分布工業區劃的觀點出發，確定陝西為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建設的重點地區之一，給予我們的工業建設任務十分艱巨。」在任內，他認真處理陝西的國防工業與地方工業的特殊關係。

1962年初，魯直來到北京參加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會議上，西安市委推舉他代表西安小組發言。他如實地講述了「大躍進」以來西安和陝西經濟發展的狀況和存在的問題。會議期間，他也坦率地表達了他對過國內和黨內一些現象的觀點。回到西北後，他被錯誤地批評，受到不公平的處置，被調離陝西。1963年，他前往國家農墾部工作，全家搬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期間，魯直一家人被下放到位於江西省永修縣的「五七幹校」。他被極左路線殘酷迫害，冠以莫須有的罪名，含冤去世。之後，他的家人為他的案子四處奔走申訴，直到最終平反昭雪。

魯直晚年的悲劇，再次證明了一個事實：當一個國家背離其初衷，拋棄魯直一代人信奉的實事求是的原則，而片面追求不切實際和不可祈望的目標，國家和個人都會遭遇災難。不及時糾正錯誤，反而開展無情的內部清洗運動，更是雪上加霜。¹¹

魯直文章導讀

編訂這部文集是為了幫助人們了解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和軌跡。這些寶貴的史料使讀者更深刻地認識西北地區的革命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程，以及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一般民眾對陝北革命史和陝甘寧邊區的直接感性認識，來源於耳熟能詳的由陝北民歌與民間藝術演變而來的革命歌曲和文藝小品，如《橫山裏下來些游擊隊》、《山丹丹開花紅豔豔》、《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和《邊區十唱》（又名《軍民大生產》）。作為親身參與者和見證者，魯直在〈自傳〉裏講述了他在家鄉橫山參加革命和蘇維埃運動的過程，以及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盛事。同樣作為當事人和組織者，他的文章最精細、最直接地探討了陝甘寧邊區的社會活動、生產方式、民間組織，比如變工隊、互助組、

11. 本書把「延安精神」定位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等原則。然而，根據有些學者，1940年代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日後中國無情的政治運動的前奏。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開荒種地、婦女紡織。他不斷地總結和歸納工作經驗，推敲施政方針，摸索前進道路。他通常不厭其煩地用大量翔實的數字、統計和具體案例說明問題。他反復強調的工作原則和領導方法是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調查研究、有的放矢、切合實際、艱苦樸素。他摒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脫離群眾、空泛口號、奢靡享樂。

魯直的每篇文章和報告，都是細緻的調查研究的結果，其中沒有空洞的語言和教條，而是呈現出一個生機勃勃的世界和栩栩如生的畫卷。讀者遇到不可勝數的有名有姓的真實人物：合作社社員、合作社主任、運輸隊員、運輸隊長、運鹽隊長、村民、鄉長、紡織婦女、莊稼漢、識字農民、勞動模範、戰鬥英雄、植樹英雄、積極分子。文集裏的主人公是陝甘寧邊區的有血有肉的普通民眾、基層幹部、變工隊、札(扎)工隊、識字組、搭工組、合作社、黨支部；在西北浴血奮戰的解放軍戰士，從班排連營團旅師軍，乃至整個野戰軍；覆蓋三秦大地各個行業勤勞工作的廣大職工。魯直記述了這些人的生活、工作、言行，並分析他們細微的內心思想活動。

年輕魯直最初在家鄉參加革命，是出於對不公正的舊秩序的憤恨。在〈自傳〉裏，他回憶當年地主對他家人的欺凌和壓迫，以及魯氏兄弟的反抗。

這個地主的族戚，仗著地主的錢勢，無故的欺侮我們。在一個秋收莊稼場上，地主的女婿大黑狗騎在大哥的頭上，當時激起了我們兄弟的憤怒，就和地主們棍鬥了一場，打爛地主尚生浩父親禿老漢腦袋，撞下了天大的禍。

參加革命後，通過工作的磨練和不懈的學習，魯直從一個滿腔熱血的青年轉變為一位成熟的革命者、建設者、行政領導。他善於通過寫作來介入社會，以此表達他對時事的看法和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

如果讀者想充分理解這部文集裏收錄的文章的內涵，不妨把它們放在幾個大的歷史進程之中。這就是：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延安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必備的優良作風；適合中國特點的經濟發展道路。

這部文集集中的前15篇文章均發表於《解放日報》。最前面7篇文章是魯直在延安的中共西北局工作時的文章，寫於1942至1944年。其後6篇文

章是魯直任靖邊縣委書記時的文章，寫於1944年和1945年，他介紹靖邊縣的施政經驗、生產運動和各項措施。國共內戰期間，他離開靖邊縣，被調到解放軍西北野戰軍擔任職務。他於1946年在《解放日報》發表的兩篇文章，是講述西北野戰軍的政治工作。1947年胡宗南率領國民黨軍隊攻佔延安，《解放日報》停刊。

從本書的第一篇文章開始，「實事求是」的精神始終貫穿著全書內容。第一篇文章是〈對「集體」開荒意見〉（1942年5月9日）。文章不長，卻反映了魯直的思維方式和工作風格。在大生產運動中，開荒是件大事，但是「集體開荒」的具體操作是否可行，農民是否能承受，魯直直言不諱的提出自己的意見，為開荒農人算細帳。「集體農場」或大規模的集體化運作不適合當時陝北農村的狀況。以家庭和個體為單位的開荒形式更合適。事實上，令人喜愛的陝北秧歌劇《兄妹開荒》正是反映了以家庭為單位的陝甘寧邊區的勞動情景。¹² 1943年農曆春節，陽曆2月5日，在延安城南門外的廣場上魯迅藝術學院的師生表演了新秧歌劇《兄妹開荒》，轟動延安城。前來觀看的延安各界群眾達兩萬多人，毛澤東等邊區領導人也在場。

文集的第二篇是〈論農村支部在今年生產中的作用〉，寫於1943年農曆開春之際。文章開宗明義地講出黨的一切工作的目的：群眾利益。

首先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支部的幹部思想中，要轉變和建立一個新的觀念，使他們認清邊區現在的環境，把自己的思想放在一個為群眾的利益上，經常應以發展生產，領導生產，為支部的第一位工作。凡所措施，以群眾利益出發，這種思想，就是群眾觀念，是應該建立的一個觀念。

支部幹部應當領導群眾發家致富，改善生活。發家致富，不要害怕別人說農民有「資本主義思想」，「今後判斷支部工作的好壞，應依該鄉人民生活的好壞為標準。」魯直論及當時邊區的一個重要話題和及時任務，即基層幹部在春耕生產中應當起到的領導作用。¹³

12. 參見尹雪，〈由秧歌劇探析陝甘寧邊區的婦女工作〉。

13. 參見高崗，〈春耕領導的兩個典型〉，魯直記，《高崗文集》，薛駿富、白浩亭編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無頁數。原文發表於《解放日報》（1943年5月18日），第1版、第2版。

文集的第三篇〈南區合作社運鹽隊是怎樣組織起來的〉是一篇經常被引用的經典。運鹽是邊區經濟活動中重要的一環。毛澤東曾讚揚高克林於1941年所寫的延安運鹽隊的調查報告，把它作為工作作風轉變的典範。毛澤東把報告定名為〈魯忠才長征記〉，將其於《解放日報》上發表，並寫了按語。魯直於1943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南區合作社運鹽隊是怎樣組織起來的〉，是對這種說實話、幹實事作風的繼承與發展。他盛讚延安南區合作社主任劉建章。在文章的結尾，他如此寫道：

第一，劉建章同志的工作方法，是實事求是的，他並不大吹大擂地空喊組織，空喊宣傳，他沒有一點公式，他是從調查研究開始，從找典型，睽目標著手，首先了解群眾的心理，然後抓著一點去做。

第二，劉建章同志的工作路線，是從群眾利益出發，解決群眾困難的，不論做甚麼，他首先了解群眾的情感、情緒和需要，他總怕群眾吃了虧，總怕對群眾沒有利益，經常抓著群眾的心理和要求。……他的工作路線，是群眾路線。

第三，劉建章同志的工作作風，是艱苦樸素的，他做合作社經濟工作八年之久，但他從來沒有不安心工作，或享樂腐化。他的生活非常樸素，對個人的利益，絲毫沒有打算。合作社離他家庭雖然很近，但他總是不願回去，有人勸他照顧照顧家庭，他還說：「不管它，合作社工作這樣忙，哪裏顧上家哩！」因此，他在群眾中的威信就很高。他在南區說話，真是一呼百應，和群眾是真正有著血肉聯繫。

這裏魯直精闢地總結了延安精神的三個方面：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從群眾利益出發的工作路線；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

文集的第四篇文章〈延安南區發展婦紡的經驗〉（1943年）也是一篇經常被引用的經典。國內外研究中國婦女解放、女性問題、陝甘寧邊區合作社的學者經常提起這篇報告。婦女參加集體紡織工作，在文學作品中也得到描述，比如趙樹理的短篇小說《傳家寶》（1949年）。¹⁴ 魯直這篇文章並沒有誇大織布婦女的先進思想，而是平直地分析這些普通農村婦女的工作動機，進而講明了優秀邊區幹部所必備的切合實際的工作作風。他告誡大

14. 參見董麗敏，〈組織起來：「新婦女」與「新社會」的構建〉。

家要警惕一刀切、公式化、不切實際的做法。不顧實際情況的激進政策不會把事情搞好，反而適得其反。在陝甘寧邊區實行的溫和的、實事求是的政策有益於當地群眾。¹⁵

文集的第五篇文章〈模範的白塬村：勞動英雄石明德講，魯直記〉和第六篇文章〈組織模範村之間的參觀〉都是討論當時陝甘寧邊區在大生產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大批勞動模範的湧現和他們的表率作用。石明德起初是個難民，從富平縣逃亡到邊區。之後，他通過自己的勤奮工作，被評為勞動英雄，成為眾所周知的模範。邊區出現了歌頌他的民歌《石明德》和秦腔《石明德》。¹⁶魯直極其詳細的記錄了石明德的勞動概況、工作進展、生產計劃。其中有趣的一段是石明德對村裏幾位有名有姓的「二流子」的改造。在記錄的結尾，石明德說出他明年的生產計劃：

我看了吳滿有同志的生產計劃，我的條件不如他，但我不甘落後，願意和吳滿有同志進行友誼的競賽，特別我敢和吳滿有同志競賽組織全行政村的勞動力，同時要長期的堅持下去。這個競賽，願意在明年勞動英雄代表大會上評判。

石明德希望和吳滿有展開勞動競賽！吳滿有，陝西橫山人，是邊區著名的勞動模範。邊區政府號召群眾向他學習。詩人艾青寫了長詩〈吳滿有〉。藝術家古元做了版畫《向吳滿有看齊》。毛岸青從蘇聯回國，來到延安，毛澤東請吳滿有做毛岸青的「農業老師」。

文集第七篇文章〈關於鄉長工作〉的開頭這樣寫到：「『組織起來』的號召，在全邊區的每個鄉村裏，都在實際的成為行動了。各種勞動組織，在黨政領導和勞動英雄的推動下，都在組織進行了。」這篇文章是回應毛澤東1943年11月29日在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組織起來〉。¹⁷毛澤東號召把邊區的一切力量組織起來，投入到大生產運動中。魯直就此再次論及邊區基層幹部的功能和作風。這篇文章不長，但是分量很重。魯直明確指出：鄉長的工作重點不該是增加群眾對公家的各種服務和負擔，而是組織群眾、幫助群眾發展生產，減少他們的負擔，解決他們的困難。

15. 見程文俠、李慧，〈革命目標的裂變與群眾路線的轉向〉。

16. 有關魯直的記錄和石明德的案例，見秦林芳，〈論抗戰後期解放區文學中的難民敘事〉，《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3期（2021年5月），頁52-59。

17. 毛澤東，〈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頁928-36。

文集集中的第八至十三篇文章是魯直任靖邊縣委書記時寫的文章。它們依次是：〈開展「五母」運動〉、〈關於小學教育問題〉、〈靖邊的識字組和黑板報〉、〈靖邊植樹的經驗〉、〈靖邊改良土地的三種新方法〉、〈靖邊楊橋畔水利調查〉。所謂「五母」運動，是靖邊政府號召農民飼養母豬、母羊、母牛、母驢、母馬，豐衣足食，增加生產，改善生活。通過《解放日報》，魯直把他在靖邊縣的施政經驗和有效方法介紹給各地讀者。他在靖邊縣的諸多舉措是1939年以來陝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的延續。因為傑出的工作表現，他被邊區評為模範縣委書記。

如果我們把當時陝甘寧邊區流行的文藝作品和魯直的文章做對位式閱讀，那將又是一次有趣的體驗。在1944年產生於延安的秧歌劇《夫妻識字》是一個妙趣橫生、膾炙人口的文藝作品，它的魅力經久不衰，延續至今。其部分歌詞如下：

黑格隆冬天上，
出呀出星星。
黑板上寫字，
放呀麼放光明。
甚麼字，放光明？
學習！學習二字我認得清。
認的清，認的清，
要把道理說分明。
莊稼人為甚麼樣要識字？
不識字不知道大事情。
舊社會咱不識字。
糊裏糊塗受人欺。
如今咱們翻了身，
受苦人變成了當家的人，
睜眼的瞎子怎能行。

劇中一對農民夫妻歌唱著他們通過黑板報識字，以及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生產、耕地、織布、喂豬、攔羊、栽樹、馱鹽，等等。這些活動也是魯直的一系列文章探討的問題。

1944年10月上旬，魯直連續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兩篇文章，報道和討論邊區人民識字的問題：〈關於小學教育問題〉和〈靖邊的識字組和黑板

報》。時年30歲身為縣委書記的魯直，縝密而冷靜地分析了邊區男女老少識字掃盲的經歷、辦法、難處、方案和成績。在〈靖邊的識字組和黑板報〉一文中，魯直反映了部分群眾識字的困難。他如此記錄一些人最初的情緒：

開始組織時，婦女們有的說：「我們死婆姨有娃娃，記不下。」有的說：「人家不識，為甚麼要我來識，我一個人頂不起天。」還有的說：「識會字，要到毛工廠紡線子去，要當公家人。」

政府的幹部就是要正確引導民眾識字掃盲，提高他們的覺悟，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通過黑板報等途徑，讓民眾能文識字，以知識改變自己的命運。如前所述，在魯直的其他文章中，比如〈論農村支部在今年生產中的作用〉和〈關於鄉長工作〉，他同樣強調基層領導幹部的重要作用，要求他們有所作為，帶動群眾，搞好工作，起到表率作用。

文集中兩篇於1946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是魯直任職於西北野戰軍時寫的。它們是〈政指傅秀芳同志的領導方法和作風〉和〈開展邊區部隊的聯手運動〉。他摸索和總結軍隊政治工作的經驗。在〈政指傅秀芳同志的領導方法和作風〉一文的開始，魯直寫到這樣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

他回憶起，一個8月中秋節的日子。團部給每個戰士發了三個月餅，但因管理不慎，被人偷吃了幾個，每個人不到三個了。司務長向他請示意見，他很簡單的答覆了一句話：「不夠三個，就發上二個。」結果戰士們紛紛不滿的討論起來了。傅秀芳同志想，自己沒有貪污，戰士們為甚麼不滿呢！啊，不能怪戰士，要怪自己沒向戰士們解釋清楚。傅秀芳同志想來想去，想通了一個問題：工作方式簡單化，是不行的，必須改變自己的領導作風。

魯直進而探討部隊領導的工作作風問題。部隊要摒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弘揚群眾路線和民主作風，增進團結友愛。

1949年4月，他在西北野戰軍做了長篇工作報告：〈一年來宣傳工作基本總結與今後的意見〉。軍隊開展了群眾性的訴苦教育，以提高戰士的鬥志和覺悟。他說：這種訴苦的教育形式，起始於1946年的晉北綏包戰役後，如今在全軍普遍推行。這裏他同樣不厭其煩地舉例講述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茲舉一例，解放軍戰鬥英雄劉炳考的思想轉變。

四軍的劉炳考，在平時的工作中是一個比較差勁的戰士。但在每次戰爭中，則表現了非常勇敢的精神，可是，在評功時，因為平時差勁，多次的沒有評上，以後他就賭氣的說：「我劉炳考捉住胡宗南也立不了功。」因而影響了他的戰鬥情緒。以後給他立了功，他的毛病逐漸地改正了，目前已成為該軍比較傑出的戰鬥英雄了。

教育戰士、引導戰士、鼓勵戰士，是一個合格的軍隊政治工作者的職責。魯直的報告總結了西北野戰軍中一系列教育和培養革命戰士的有效舉措，是一篇難得的軍隊發展史上的文獻。

1950年9月，西北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西安召開。代表們來自西北的各個地區：陝西、新疆、寧夏等處。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盛會。魯直是會議的副主席，部隊代表團的領導。他在大會做了報告，題為〈部隊文藝工作的情況與今後的任務〉。他一方面總結了西北部隊裏文學和文藝工作的現狀，同時提出將來發展的願景。他指出：在西北的部隊內，有幾千人的文藝工作者，有文工團和宣傳隊。「在這些文藝組織中，有歌劇、話劇、京劇、秦腔、落子、也有舞蹈等，在這些文藝工作者中，有文藝作家、有戲劇工作者、有音樂工作者、有美術工作者、有電影工作者，其中又有女同志和小娃娃等。他們散布在部隊的各個角落裏，為著人民的解放事業服務，為了解放戰爭勝利服務，為了全體指戰員服務。」他繼續詳細地講述文藝工作者的各類活動和他們的貢獻：

他們在戰鬥的時候，有的到後勤部門作戰勤動員，有的到火線上去作戰場演唱，有的到連隊裏去作文化娛樂；在行軍的時候，他們沿途設立鼓動棚，打著鑼鼓，扭起秧歌，組織行軍娛樂；在部隊整訓的時候，他們馬上到連隊中去演戲，教唱歌子，幫助出黑板報，組織文化學習。尤其在新解放的廣大地區和城市裏，利用了各種各樣的宣傳形式，進行黨的政策宣傳，打破了群眾的疑慮心理，穩定了群眾的動盪情緒，並爭取了新區的不少知識分子參加了軍隊。

如其所述，部隊的文藝工作是人民軍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作為1950年代初期西北地區文學藝術領域的一位主要領導者，魯直在大會上對軍隊的文化工作做了精確翔實的總結。

解放初期，魯直所在的西北軍區幫助大批戰士、基層幹部、戰鬥英雄學習文化，識字掃盲，並為他們建立「速成中學」。為此，他在軍區做了

詳細的報告：〈貫徹部隊速成中學的教育方針〉。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24週年之際，1951年8月1日，魯直發表長文：〈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建立強大國防軍〉。他歸納中國革命的歷程和經驗，闡釋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他重述政治工作是人民軍隊建設的重要一項。

1950年代，中國進入和平發展時期。魯直的工作也起了變化。1955年，陝西省設立了省工業部，魯直擔任工業部長。之後，他又擔任西安市委書記。他參與主持陝西省和西安市的經濟建設工作。1956年，魯直為《人民日報》撰文，題為〈陝西省工業建設的開端〉，介紹陝西省的工業發展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他寫道：

現在，陝西省的面貌已經改變了。如果你到西安、咸陽、興平、寶雞一帶去觀光一下，你所看到的，已經不再是碉堡和城壕，而是一片一片的整齊嶄新的廠房和職工宿舍。到處聽到的，也是建築機械的轉動聲和運輸材料的火車、汽車的鳴笛聲。

隨著大規模工業建設的開始，交通運輸事業也在迅速發展。橫貫祖國西北、西南的大動脈——寶成鐵路，已經全線接軌了。

他讓人們看到陝西的巨大變化、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成果，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西北人民在各自的崗位上勤奮工作，改變了自己的環境，改變了歷史，改變了中國。今日人們重新閱讀這些的文章和報告，也是一次心靈的震撼，一種有益的體驗。

〈在工業企業中開展群眾運動的若干經驗〉一文寫於1959年，刊登於中共陝西省委主編的期刊《思想戰線》。此時魯直主持陝西省的工業發展。文章的重點是如何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新形勢下發揮黨的「群眾路線」的傳統。文章開頭這樣寫道：「發動群眾做好工作，這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我們的幹部一般都懂得必須發動群眾的道理。曾經在農村中和軍隊裏工作過的同志也都有一套發動群眾的本領。在全國解放之後，情況變了，搞好經濟建設，成為我們的主要任務。」魯直和他的同事們摸索和總結經驗，提出一些在工業生產中發動群眾運動的可行措施。這篇文章充滿哲理性。他指出：群眾運動發展是不平衡的、波浪式的。即使在當時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裏，「任何事物的發展，平衡總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長期的、絕對的。」「應該根據發展情況不斷地調整計劃，就是由平衡走向不平衡，再在不平衡的基礎上達到平衡。這種平衡和不平衡的交替出現，

說明企業的生產潛力是無窮無盡的。」在文章的結尾，魯直指出：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發動群眾改革規章制度，實行幹部、技術人員、工人群眾三結合，是企業管理的好辦法。

本書收錄的最後一篇文章，是1960年8月《人民日報》有關魯直的一則新聞報道。此時他在西安市委擔任領導工作。他仍然秉承群眾路線、腳踏實地、切實工作的優良傳統。「他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繼續深入生產第一線。市級各工業主管部門的領導幹部以至工廠企業的書記、廠長，第三季度都要以三分之二的時間到工廠、到車間、到高爐旁去，切切實實解決具體問題。」這樣的工作作風，是延安精神的延續。

在編輯此書的過程中，我得到同仁、友人、親人的協助，此處特表謝意。感謝魯曉龍、魯小燕對出版此書的支持、指導、幫助和所作的大量工作。感謝中國傳媒大學的向志利老師和她當時的「魅力聲音工作坊」團隊成員。他們在文章收集、文字輸入、文稿校對、文集編訂等方面，做了辛勤的工作。感謝張立娜、林吉安協助搜尋相關資料。感謝香港大學宋耕教授和華東師範大學孫曉忠教授的支持。感謝香港大學出版社鄧萬（Michael Duckworth）社長、容啟聰編輯、張承禧經理將此書列入出版社「開讀計劃」予以出版。因為年代久遠，有些原始材料已經模糊不清，字跡難辨，這些地方，我用 X 標示出來。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還將努力收集相關的資料和文章，做後續工作，將新的發現呈現給讀者。

魯直自傳

(1953年)

一、家庭生活及出身

余陝西橫山人，1914年出生於一個貧農家庭。父殿文，行三，母廉氏，皆良善勞動的農民。余兄弟三人，長加禮，次加順，姊妹四，皆嫁給農民。家有地30餘畝，石窯三孔，幼時欠債百十元。

父兄終年勞動，豐則可以糊口，歉必向外借貸，婚喪嫁娶成為莫大負擔。曾為兄娶，揭債於鄰村油房頭大地主侯清彥（天主教徒）。而地主僕役不時高騾大馬臨門討債。一年，因還不上利，將地押給地主數垧，自此地不夠種，父率兄外出尚新窯，租種地主尚生浩地三年。這個地主的族戚，仗著地主的錢勢，無故的欺侮我們。在一個秋收莊稼場上，地主的女婿大黑狗騎在大哥的頭上，當時激起了我們兄弟的憤怒，就和地主們棍鬥了一場，打爛地主尚生浩父親禿老漢腦袋，撞下了天大的禍。於是央人說情，殺豬賠禮，養傷道歉，花了數石穀子，地主收回土地不給再租，才算了事。翌年回家，兄為人傭工，家境從此更窮。我雖年幼，覺得富者如此不仁，貧者這樣可憐。加上同村同族有錢人的白視，更增加了我對富人的憎恨。

二、小學時代

1924年冬，官府興辦洋學堂，我家從來沒有念書人，族長們勸父送我上學，並允給予資助，於是即在1924年的冬天，送我入油房頭村的半公半私的小學堂。三個月讀了四本洋書（自然常識），還聽會了《百家姓》、《三字經》。老師拓世高是一個清末不第的佛教徒，對我頗為青垂。1925年

得族長魯炳業的一塊白洋的資助，供我繼續念書。當時正值大革命，縣城高級小學的暑期學生旅行隊，到我讀書的村子來旅行。他們很威風，散傳單、寫標語、罵洋人（神父）、打廟宇、組織農民協會、宣傳抗糧抗款。記得把我家的債主侯清彥也大罵了一頓，還給院牆上貼了標語。自己覺得念書倒是窮人的出路，於是更加用功了，在1927年的下半年，即求父親送我入縣城的高級小學了。

入校後，也是國民黨反動派背叛大革命的時候，像以前那樣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沒有了。記得當時校方修校舍，命令學生背磚頭，學生情緒不滿，普遍流行「上半年宣傳，下半年背磚」的話，對革命形勢表現了悲觀情緒。雖然如此，學校黨的活動並沒有停止，在每星期日的時候，許多同志都到鄉下玩，後來我參加少共以後，才知道這種玩是在作黨的宣傳活動。

黨在這時，對於學生中的工作，是通過講課和作文了解的。我記得在一次國文作業時，教員出了一道「我的志願」的題，在這個題目下，我寫了一大堆打倒「土豪劣紳」，為窮苦人謀幸福的話。教員劉經向（共產黨員）修改時，又添了些「為人類謀解放」，「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作殊死鬥爭」等語，並和我談了一次話，問我讀甚麼書，並願讀甚麼書，當時又給我一本《資本主義淺說》要我看。幾天後，在一個晚間，下自習的時候，高我一班的學生賀祥雲把我叫在禮堂角說：「有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你願入嗎？」我不知道這個組織的任務是甚麼，就允了加入。他走時囑我不可告知任何人，有甚麼事由他找我。我想這就是共產黨嗎？這是1928年4月間的事。

三、入少共後

這以後，大概要在每星期和他接一次頭，我們星期日要相隨二三人到城外鄉村宣傳一次，內容大概是宣傳農民抗糧抗款，抗白地捐。有時他給一些油印的文件要我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知道在南方有「紅軍游擊隊」。記得在暑期放假的時候，在城西瓜的一個石窯洞裏，開過一個十多人的會議，到會的有本校的賀祥雲、李瑞祥等，還有榆林中學回來的魯學曾

(魯賁)、魯紹曾、吳世才、綏師的王東高等，大體是布置暑期回家後的工作，和發生關係的問題，回家後我即和鄰村陳家石畔的王東高發生聯繫。

四、不幸遭遇

1928年陝北遭大旱，5月天未雨，禾草不生，下半年我即輟學，及秋共收一石秕糧，於10月間家兄率我逃荒安塞，於是我與共產主義青年團關係亦斷絕。在安塞度荒一年中，我為族叔牧牛一冬，給堂弟代讀半年（因他逃學不去念書）。於1929年回家，1930年2月又復學原高小，3月間又與學校的組織恢復關係，當時的校長李友竹（共產黨員）、教員郭致禮（共產黨員）在校主持工作。

4月間，我因年幼逃荒，積勞成疾，身染腎臟炎，渾身浮腫，回家療養，一病臥床四年，又和共產主義青年團脫離關係。在這四年多的病痛中，對父母是一個莫大的負擔和憂慮，對我是一個深重的磨折和懲罰。一息之餘，我仍讀書寫字。因為偏處落後的鄉村，家境又很困難，父母求神拜佛，兄為延醫診療，而被「拍牌賣當」的江湖醫生騙了好多錢。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願再增加家庭負擔，以後即拒絕延醫診治，獨自和病鬥爭。四年後，病漸痊癒，總算死裏逃生。在漫長的病年中，對我的思想鬥志起了腐蝕作用，一方面是在這四年中讀了一些左書右經；甚至三教九流、陰陽風鑿的封建文化，也看了不少。當時的思想認識是：將來在社會上雖不以此騙人，至少不為別人所騙；人家懂的東西我雖不能全懂，至少人家不懂的東西，我要知道一些。在這種思想支配之下，我對社會的憎恨與不滿，變成了對社會的縱橫與捭闔。這是我當時思想變化最大的一個時期。

五、參加土地革命

1935年，病體復原，陝北蘇維埃運動蓬勃發展，紅軍游擊隊活躍於安定、靖邊、橫山之間，到外傳播著紅軍勝利的消息。大概在同年7月間，紅軍游擊三縱隊消滅了油房頭村的民團李培英匪後，我縣四鄉開闢蘇區的

突擊隊到處出沒，9月間本區已成了「游擊區」，各鄉各村組織赤衛隊，當時我即擔任了東鄉赤衛隊的大隊長。同時即與陝西省赤源縣少共縣委四區區委的劉昆山同志接上了黨的關係，從此，我即走入了實際革命鬥爭的行列。

任赤衛軍大隊長時不二月，被調赤源縣第四區蘇維埃政府工作。在參加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鬥爭中，為農民的勇敢堅決的鬥爭精神所教育，記得在一次赤衛軍配合游擊隊消滅白軍的戰鬥中，一個手持矛子的農民竟繳得白軍快槍，覺得革命馬上就會成功，白軍很快就會消滅。一次路過回家的時候，嫂嫂問我革命是否鬧成了，我慷慨的對曰：「快成功了。」不久紅二十五軍與中央紅軍先後到達陝北，西北革命形勢有了新的進展。勞山、榆樹橋、直羅鎮三次戰鬥勝利後，我的革命情緒，和工作積極性更加高漲，滿以為共產主義社會馬上就實現了，或是現在就是共產主義了。這種思想的表現，是在當時沒有財政制度的混亂情況下的產物。當時陝北各個蘇區打土豪的財物，不分地區都可動用，這個區的幹部走到那個區，沒有任何手續，就可得到一切供應。幹部中連貪污自私的名詞也沒有聽說，舊社會的一切不良風氣，被革命的浪潮全部淹沒。這樣就造成了幹部中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所以在中央到達陝北整頓財政建立預決算制度時，我覺得非常驚異，尤其對於幹部帶警衛員，首長吃小鍋飯感到更不習慣，覺得革命為了「平等」，為甚麼要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表現了一種非常幼稚的思想。

1935年，陝北省橫山縣蘇維埃政府成立，我被調任縣蘇教育部長，以組織列寧小學、禁止纏足、破除迷信、反對買賣婚姻，是我當時的中心工作。1936年5月紅軍西征，中央撤出瓦窯堡，陝北許多較鞏固的蘇區變為游擊區，或敵佔區，當時教育工作不能開展，又調我任縣蘇財政部長。同年12月間，又調到三邊少數民族委員會工作，至1938年春送中央黨校學習。

六、在抗日時期

在兩年多的土地革命鬥爭中，我的思想發展過程，是由幼稚片面的認識階段逐漸向著比較實際全面的方向發展的階段。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六個

月內，學習了《列寧主義問題》、《中國革命運動史》、《政治經濟學》等，這對我的思想有進一步的提高，懂得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複雜性，以及其發展的不平衡性諸特點。特別是開六中全會時的許多由抗日前線回來的代表報告了前方抗日鬥爭的經驗，他們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鬥爭史實，說明了中國革命中的建黨、建軍、統一戰線諸問題，指出抗日戰爭勝利的前途，對我的教育是很大的。

同年底黨校畢業，分配到陝甘寧邊區黨委工作，由邊區黨委而邊區中央局、西北局，一直五年有餘。我參加了1943年偉大的整風運動，參加了「兩條路線」學習的報告和討論，聽了毛主席的〈改造學習報告〉。在這些報告和討論中，使自己學習了中國黨的歷史知識，使自己懂得了革命鬥爭的複雜和艱巨，也使自己了解了政策路線的錯誤對革命事業的嚴重危害性，左右傾主義給革命造下的不可彌補的損失。從此，認識到自己的無知，認識到自己懂得的東西太少了。那些教條主義者，主要原因就是缺乏鬥爭經驗和工作實踐。這次整風運動對我的教育，對我的思想提高是空前的。

在延安工作的五年中，除了參加整風運動的學習外，而實際工作中，在高崗同志、陳正人同志的領導下，對我的教育也是很大的，在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上，受益頗多。如在邊區自給自足的生產運動中，在反「磨擦」的鬥爭中，在處理許多政策性的問題上，使我得到了教育。比如在邊區生產運動中，對「吳滿有」運動的開展和合作互助組織的發展，學到了一些東西。我自己對於經濟建設各方面的經驗如合作社、運鹽、農業互助、水土保持等都曾作過一些研究。因此，在西北局工作的五年中，自感不論思想上和工作上都有不少的提高。

1944年西北局派我任綏遠省伊東工委書記兼靖邊縣委書記，這個工作對我是一個實際考驗。工委工作的對象是國民黨加蒙古少數民族，這個地區不僅有國民黨的軍政爪牙，而且有日寇的暗探走狗，所以在政策鬥爭上、工作方法上，如沒有嚴肅的立場和高度的靈活性，就會犯錯誤。而縣委的工作，當時重點是領導生產和經濟建設，根據該地條件，發展水利、開展畜牧、植樹造林為建設三大問題，在西北局的領導下，對這三方面的建設，我作了一般的努力，也收到了較大的成績。總之，在這階段的實際工作中，使我深感實際工作鍛煉的重要性。

七、入伍以後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延安幹部大批「下山」，西北局決調我到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部工作，於12月間返延安，參加軍隊工作。

在我進入這個工作崗位時，一切都是陌生的，不懂軍事知識，就是軍隊的生活、習慣、思想、作風等方面也是格格不入的，一切都要從頭學起，這是對我思想發展進程中的極大轉變。加之「下山」人員將原來幹部全部帶走，現有的宣傳部等於重新組織，對這一點，當時我表示了不滿，並向組織提出了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軍隊的宣傳工作，我只有從頭摸索，所以到聯政兩月後，就到新四旅了解情況。曾在一個連隊裏住了40多天，將該連的生產、戰鬥、學習等各方面作了一次全面的調查研究。從此，對軍隊工作算是踏上第一步。經過一年的摸索學習，對宣傳部工作有了一些體驗，但由於長期地作地方黨政工作，在生活習慣上總不如生長在部隊中的幹部那麼自然，某些地方總覺得有些彆扭，因此，就造成了我對軍隊工作的長期不安，這種思想一直到現在還時斷時續。

1947年1月，胡宗南匪軍集結大軍向陝甘寧地區進攻，首先即向關中隴東進犯。為了保衛邊區，粉碎敵人的進攻，中央決定將晉綏一縱隊、兩個旅與邊區的教導、新四、警一、警三、四個旅合組野戰集團軍。我又被調為野戰集團軍政治部宣傳部長。於1947年2月21日由延安出發向隴東西華池進發，迎擊胡匪48旅何閩部。此時，軍隊的政治工作，平時的我尚不懂，又要進入戰時的我，實在覺得沒法下手，但當時大敵當前，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任務偉大，只有服從組織，盡力而為。爭取早日消滅胡匪，光復邊區土地，是當時的主導思想。

3月中旬，延安失守，邊區轉入全面自衛戰爭，黨政軍民一體動員，我自己不安於軍隊工作的想法，也完全為戰爭的煙火焚毀，決心在這個偉大的戰爭中服務到底。因此，在三年的解放戰爭中，我對軍隊的工作由不安心而基本安心了。

在此偉大的解放戰爭中，在以彭老總為首的領導下，對我的教育和鍛煉是深刻的。不論在保衛延安時期、出擊關中時期、解放甘寧青時期，除對軍隊戰時的政治工作有了初步的體驗外，對於新區的民運、建政以及建黨、建軍等方面都獲得了一些體驗。對我教育比較深刻的有如米脂楊家

溝、洛川土基、黃龍富莊等幾次前委擴大會議。前者使我認識到在軍隊中工作不僅只是單純打仗，而是要會做建黨、建政、發動群眾等工作。後者使我認識到政策是黨的生命線，革命的任何部分，如對黨的政策執行不力，都會使革命事業招致損失（因為在富莊會議上檢討了黃龍山區的群眾工作），從此，我對軍隊政治工作，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1949年10月，大西北全部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西北軍區與第一野戰軍合併，戰爭的工作轉向平時。1950年軍隊又投入生產建設，戰時的宣傳教育工作，要轉向平時和生產中的宣傳教育，我對這樣的一個轉變又是陌生的。生產中的教育工作，以及其思想發展規律又要從新認識。自覺常趕不上時代的發展，老是在時代尾巴上，有如附驥。

大陸戰鬥基本結束，祖國的經濟、文化建設開始，到地方工作的思想重新復發，因此，西北軍政委會成立之後，我曾向組織要求轉業地方。1953年祖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開始，我又向組織要求轉業。這種思想的時隱時現，除了有個人主義的成分外，覺得我對地方建設工作的貢獻要比在軍隊大些，再加上身體、年齡的日漸不適合於軍隊生活，那就更加促進了這種轉業地方工作思想的發展。

八、結束語

一、從1928年參加少共以後，除了中間逃荒一年，臥病四年多的時間，脫離了黨的領導，沒有為黨工作外，其餘都是在黨的教育和領導下工作著。因此，在我的工作道路上，在近20年的歲月中，都是比較順利的，沒有犯過甚麼錯誤，因而也未受過紀律處分。這並不是我的高明，而是由於在黨的正確領導下，由人民和同志們的督促所致。關於這個問題，我的認識有兩點，一是沒犯錯誤者不見得比犯了錯誤的高明，犯了錯誤的也不見得比沒犯錯誤的低能。問題在於有無個人主義的目的與非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二是沒有作較大的負責工作，在小的工作範圍也不可能有甚麼重大問題的處理，間或不當或出了偏差，也不能影響全域，而在黨的領導與督促下，及時的得到了糾正，使你不能鑄成大錯。至於那些純出於個人主義的思想和動機，那又當別論。因此，我對我在這樣長時期的工作中，沒有犯過錯誤的認識，並不自豪，倒是在時刻的警惕自己。

二、在以往的歷史中，從我自己的思想發展看，使我更加認識了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正確性，認識了「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定律，在任何人身上都是適用的。如我在生病四年多的時間中，因為所處的環境，接觸到的事物和所讀的書籍，對於不滿的社會，不是用革命的手段，打爛舊機器，創造新時代，而是就舊社會的環境找生活的出路。因此，我在養病的幾年中，因為客觀環境和主觀條件的限制使我的思想相當的腐迂，竟想作一個舊社會中不訛不詐、正直是與的中間人，及初期參加革命的實際鬥爭之後，這種意識也曾一度的反映在我的言行中。在參加軍隊及解放戰爭的三年中，又由於地方工作作風的長期陶冶，使我的意識形態上又表現了對於軍隊工作的不習慣，但在偉大的解放戰爭的洪流中，軍隊生活的客觀現實，把我地方工作的思想作風，又逐漸的轉變過來。但在戰爭基本結束後，祖國開展經濟與文化建設，我的思想又為這個客觀環境所影響而產生了不安心於軍隊工作。因此，從我自己思想發展變化的過程看，從部隊的思想變化狀況看，使我深刻的體驗到對於思想發展及其變化的分析，不能絲毫的脫離客觀事物的存在。抽象的思想，就是具體事物在人們意識中的反映。問題在於你用甚麼觀點方法去認識這些具體事物而已。

三、由於我個人出身於半自給的農民家庭，倔強的自尊自立思想，在我的思想中相當濃厚。常以「大丈夫當以能力造命運」為自銘，「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以自勉。對於自己的名譽地位生活享受不如別人時，常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去趕上他；對於應該懂得的東西不懂時，不惜任何艱難也要把它學懂一些。古今中外，雖不能精通淵博，也要做到略知一二。這種思想在生活中的反映，是使旁人覺得我高傲自大、超群孤僻。這是我在今後的修養中應該努力克服的。

(1953年1月23日)

魯直文章

一、陝甘寧邊區建設

對「集體」開荒意見

《解放日報》4月28日的第一版上，登著延安縣組織突擊隊集體開荒的消息，我細想了一下這個計劃，並和延安縣某負責同志談過，有以下的不同意見：

第一，首先說明集體開荒的計劃，據報紙所載，「共計劃開荒7,300畝，組織集體工76隊，調集勞動力910個，耕牛106頭。」據說開過的荒地，將來又是集體鋤種，集體收割，秋收以後按勞動力分配糧食，這樣我看和「集體農場」的形式沒有兩樣。但在目前農民的覺悟條件下，個體農民對集體生產的勞動熱忱，我看是有很大影響的。有農民說：「每個人開荒能分到兩三畝，就是天年收了，能打個毬；反而把家裏的莊稼也耽誤了」；農民這樣的說法，裏邊是有他的道理。「顧此失彼」「田不養家」恐怕是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第二，「牡丹區、河莊區、豐富區，調集體工到柳林區開荒」，路程聽說100里遠近，往返要走四天。「烏羊區調集體工到姚店區開荒」，路程也就八九十里，往返至少也要三天。「青化區調集體工到川口區開荒」，路程也就百里遠近，往返也要四天功夫。我計算了一下，調910個勞動力，每人平均誤上走路工三天，也就要誤工2,730個工的。還有調106頭耕牛，這又能誤多少工？是可想而知的了。這些誤工，能種多少地？能賺多少錢？又是可想而知的了！

第三，調去的集體工，集體開荒，人要帶米，牛要帶草料，到了又沒有人煮飯，牛又沒有喂棲，人也恐要露宿。農民家裏吃飯，沒有米，可以

「互拉」吃，集體吃飯就不成了。這個問題我看是一個大問題。農民都說，「走了，家裏的就丟了」，因不願意。調集時起碼集合又要誤一天工，雖然說調去開荒 20 天，但是農民的家裏雞雞羊羊又不放心。聽說，川口區五鄉計劃去 130 頭牛，只有兩家願意去，這兩家據說不調集也去的，因為他們早就「考慮」那裏去開荒的。

根據上面的理由，我有下列的提議：

第一，組織突擊開荒，像這樣的方式，我看來最好停止了。如組織突擊，在名義和形式上，我意完全利用民間的固有的勞動互助形式，不必要甚麼「集體」的組織，如「編工」「扎工」都是可以利用的。沒有牛的可以和有牛的編工，不拘多少，三五都行，私人所有，互相調劑，不但彼此願意，而且在編工的時候，都怕吃虧，互相督促，對生產效率還能大大的提高。如有甚麼困難，公家盡量幫助解決（如沒有草料、子種、農具等），再在鼓勵宣傳的方式下去大量發動，不要弄成一個攤派的，動員的方式使老百姓一看起來，就把它看成一個負擔。

第二，在地區上不應該普遍的從 100 多里遠的地方去動員調集，應該是在區與區間，鄉與鄉間，村與村間，一兩鐘頭就可以聚合到山的距離。首先走路不誤工，飲食居住晝整夜零，各有所歸，牛不愁沒有喂圈，人不愁沒有宿處，又不怕家裏沒人照料，生產情緒自然會提高起來。哪一個編工的消極，哪一個就會吃虧的。

第三，有些地方如沒有荒地，政府可鼓勵農民在自願的條件下，去移動開荒，公家再幫助解決一些草料、子種、住房等困難問題。「一年莊稼二年種」，如果沒有準備，「日急慌忙」是很難弄好的。就是要集體開荒，應在每年秋季農閒時候，經宣傳鼓勵解釋的方式去發動農民開荒，應該是「未雨綢繆」，而不是「臨渴掘井」。當然我不是說，發動開荒是不應該的！

上述區區意見，考慮未必很周，特提出供大家研究。

（原載《解放日報》1942 年 5 月 9 日）

論農村支部在今年生產中的作用

立春將至，1943年的農業生產就要開始，老百姓照例的是在立春那天出「牛」了！各縣的生產方針和計劃，大都寫就，但是我們現在只能說他是紙上空文，而還不是實際的五穀收穫。因此1943年的全部農業任務的完成與否，它一方面依靠於全邊區人民的努力生產，另一方面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就是依靠散布邊區廣大農村裏的支部黨員，在農業生產中的實際領導作用。

首先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支部的幹部思想中，要轉變和建立一個新的觀念，使他們認清邊區現在的環境，把自己的思想放在一個為群眾的利益上，經常應以發展生產，領導生產，為支部的第一位工作。凡所措施，以群眾利益出發，這種思想，就是群眾觀念，是應該建立的一個觀念。同時現在的支部幹部中，有一部分人對領導生產，不但沒有注重，而且是相當忽視的，提起領導生產的時候，總說：老百姓自己會生產，何必自己多嘴呢？這種放棄領導以為群眾懂得的錯誤觀點，今天是應該轉變的。同時在這裏又應該糾正一個口號，就是過去把反對一部分幹部的貪污腐化，擴大成為一般的在黨員農村中，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所以個別地方就造成了某些黨員和群眾的生產不積極，而害怕發了財，人家說他「資本主義思想」發展了。一部分群眾則認為共產黨員愛窮不愛富，比如1941年徵糧，一斗四升麥子折一斗小米，群眾就說，共產黨員是窮光蛋，生下窮肚子，愛吃小米不吃麥。這些都說明了對於邊區的建設認識問題上，還不夠清楚。因此在今後支部黨員中，必須使得邊區農民「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倉有餘糧」，人人豐衣足食起來。如果哪裏還有民不聊生、家徒四壁的農戶，那麼，那個鄉的支部工作就做的不好。今後判斷支部工作的好壞，應依該鄉人民生活的好壞為標準。說到這裏，那麼支部幹部及黨員，轉變了他們舊的思想，建立了新的群眾觀念之後，在今年的生產中就應該作以下的一些工作了！

第一，要求每個支部黨員，執行毛主席提出的農業八大政策。首先一個問題，就是佔邊區人口半數沒分土地地區在農業政策上的減租交租問題，在這裏邊佃權問題又是其中農民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了。但在綏米、隴東、關中等地今年的減租過程中，某些地主藉故違犯租佃條例，暗裏不願減租，或者利用各種方法，收回農民租種土地。這些事情都是有害今年農業生產的，因此，支部黨員對於這些事情的發生，應該進行調解，一方面說服地主進行減租，保護佃農佃權，另一方面教育群眾好好交租，照顧雙方利益，既不使農民無田可耕，又要使地主有利可圖。這種問題的發生，在警備區是特別多的，因此，要求每個支部在春耕之前，對於本鄉農民的耕地問題，即有一個很好的解決，使得邊區的每個積極生產的「耕者有其田」。

第二，要求支部黨員都去積極生產影響群眾。黨員對於政府分配定的生產任務（開荒、運鹽、紡織等），應該保證完成，大家學習吳滿有的生產精神，使得每個農民的生產情緒提高到「起雞叫，睡半夜」的辛勤，使得本鄉本村沒有一個二流子懶民鬼。而對於某些生產情緒不高的農民，支部應該調查原因，說服教育，如有困難，即要協助解決。假使某些農村對個別農民因徵糧不公，致使農民生產情緒不高，而發生遷移搬家現象，這都是可能。那麼，支部就應很快進行解決，保證黨員不要發生。比如前年延安因徵糧發生農民搬家現象，一時相當嚴重，但是他們立即在黨內進行了動員，結果很快的就糾正了。因此，延安的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五年之中增加了一倍以上。這些農民的生產情緒一般都是很高的，所以延安的糧食收穫也較豐富。在這裏就說明了提高生產情緒和生產信心，在生產中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

第三，要求支部，堅決執行政府的移民政策，但這個問題上在邊區是有兩種不同的地區，和兩種不同的工作的。在警備區，人稠地少，人口是應該移出的。那麼這裏的地方支部，首先應該動員需要移居的黨員先移，

而且一個黨員宣傳幾個鄰舍親戚也移，打破他們「故土難離」的觀念，宣傳政府的優待移民的政策。但在延安、鄜縣、志丹等縣，地廣人稀，是要歡迎外來移民的。那麼，這些地區的支部工作也就不同了，應該好好的進行招呼、安置移民工作，協助解決窯洞、糧食、耕牛、農具等困難，使之能夠即時進行生產。同時要注意老戶排斥新戶的現象，教育老戶讓步新戶，新戶尊敬老戶，和睦友善，相互發展。這些工作，在今年的移民過程中，根據自己不同的情況，去進行支部對移民中的工作。

第四，要求支部、黨員、參加勞動互助組織，進行生產互助。如在農業生產上的「變工」、「札工」，運輸業上的「朋幫」、「帶頭」，牧畜上的「捎羊」、「混群」等等，都是邊區固有的一種勞動互助形式。支部即應利用這些舊有形式，把它加以擴大充實起來，使得每個人力、畜力，都能發揮他的最大效能。但是這些勞動互助的組織，應該是在經過自願的原則之下。如果農民不自願而強迫組織起來，不但不能提高勞動速度，反而會降低生產熱情的。舉個例說：「張三和李四變工背麥，張三體強，一回背兩捆，李四體弱，一回背一捆，如果公家把他們不自願的組織為變工隊，那麼張三本來一回可以背兩捆，但他就因不願意而背成一捆」（王國華同志談）。所以變工、札工的組織，它的內容是非常複雜的，如果不加研究，不看對象，千篇一律的把它官辦式的組織起來，一定是會弄得糟糕的。因此，農村的支部，對於這些勞動力的調劑問題，必須進行耐煩的說服工作，使之不論大小強弱的人力、畜力都能夠進行必要的調劑與互助，把它所有效能運用到生產戰線上來！

第五，要求支部，建立自動的、經常的工作，確立黨政的正確關係。過去支部與鄉政府的工作，一般的是一把抓的方式，致使工作發生不正常現象。根據延安、志丹兩縣的經驗，鄉村黨政工作完全有可能各自建立業務和制度，這樣工作才可能做得更好。這裏考其過去原因：主要由於戰爭環境遺留下來的舊的方式，另外就是支書與鄉長的互相依賴，互相推諉。如固臨某鄉，支書說運鹽工作是鄉長的行政工作，鄉長反說：倒是你的中心任務！這樣還在某些地區造成上面不來人，下面無事可作的現象。其次就是把經常工作當成動員工作，在鄉村裏不論春耕、秋收、選舉、教育都叫做動員工作，弄得群眾把動員工作都認為是向他們要東西。因此，支部今後須確定自己的經常工作，取消亂叫「動員」。再次，關於今年的鄉村會

議，在農忙時間，不要隨便召集，確定今後小組會至多半月開一次，如是地廣人稀距離太遠的鄉村，則20天開一次，支部會半月一次，黨員大會半年一次就行了。每次會議應有準備，盡量半天開完，至於其他一些不大緊要的會議，盡量少開，以至不開。鄉長對於徵收運鹽、公糧等尾欠，不要愛省勁，怕跑腿，應以多上門，少開會為原則。

總括以上問題，都是支部對今年生產中的重要問題，這裏提出上述意見，作為各地支部工作同志們的參考。

(原載《解放日報》1943年2月2日)

南區合作社運鹽隊是怎樣組織起來的

延安南區合作社的運鹽隊，已成為今天邊區運鹽事業中一個經常的工具了。它現在已有22隊，約600多條牲口（包括毛驢、騾子、駱駝等）。據劉隊長說：他們的計劃是一共要組織36隊，每隊30條牲口，趕3月底就要全部組織起來的。

南區合作社的運鹽隊，為甚麼能組織得這樣快？同時又組織得這樣好呢？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劉建章同志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從他開始組織運輸隊一直到現在，並沒有大吹大擂地去宣傳、組織，而是在群眾中進行實際的活動。一開始就調查研究，瞅目標。他找到了過去和他一起趕過牛的劉永祥同志，要求為合作社組織一個運輸隊，並和合作社合股一起來幹。劉永祥答應了他的要求，但他這時候還帶著病，眼睛看不清楚路，不能跟上運輸隊走。於是劉建章同志又找來了過去和他一道趕過腳的王耀祖代他領導。不料第一次去臨鎮販鹽，跌壞了兩個驢子，虧了很大的本。但是劉建章、劉永祥並不灰心，不折不撓地堅持下去，並改變了運輸路線，不去南路轉向三邊運鹽。此時劉永祥同志的眼病好了，他組織運輸隊的活動也就開始了。他不論在路途上，在宿店裏，在談話中，都不斷宣傳合作社組織運輸隊的問題，如說：「合作社能給腳戶解決困難，運輸合作是有利的等等……」由於他在腳戶中有威信，所以他的話就有人聽。於是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劉永祥的運輸隊就擴大到一百五六十個性口了。不僅是延安南區的大部分腳戶參加了，就是友區的駱駝客也參加了100多頭。在數量擴大之後，劉永祥同志隨即注意提高質量，那些不好的、疲乏

的牲口，都調換成好的、肥大的牲口。現在劉永祥運輸隊的牲口，都是經過挑選的好騾子，不但都能馱得多，而且都是「驢騾」。它在放青的時候，也能放場了！

在去年高幹會議提出運鹽任務之後，劉建章同志馬上就想到他的運輸隊的規模還不夠大，需要擴充，於是又照他去找劉永祥一樣的方法，去找到了南區一鄉腳戶馮世英。此時正是臨年過節，馮世英欠了許多虧空，沒法開銷。劉主任找到他之後，把他的這些困難完全解決了，並對他說：「合作社又要擴大運輸隊，你如入股合作運輸的話，咱們就和劉永祥一樣的合作運輸。」劉主任當即拿出了9萬元錢，湊給了馮世英，要他再買10個牲口，去鹽池馱一回鹽。又對他說：「如果有利為你賺的，虧了本，合作社也能幫你解決。」馮世英馱鹽回來，就賺了幾千元，於是他的信心提高了，不但自己參加為合作社的正式運輸隊，而且變成了合作社組織運輸的積極宣傳者和組織者。他到處宣傳合作運輸的有利，和合作社入股運輸是有好處的。因此，第一次他就把一起趕過腳戶的閻步盛拉來了；第二次又把他的叔伯兄弟馮世有拉來了；第三次又把好趕牲口賣柴的劉向春拉來了。當時劉向春只有一個騾子，隨時就宣傳把他的村子裏所有12個能馱的牲口，統統地組織到一起，而他自己作了隊長。他用這樣方式，一個一個地找到對象。從去年12月起到現在，就發展到一百五六十條牲口了，而現在還在大量的發展過程中。完成36隊、1,000多條牲口的計劃，據劉建章、劉永祥同志說「是沒有多大問題的」。

這裏檢討一下，南區合作社的運鹽隊，為甚麼能這樣順利的發展呢？我想有下列的幾個原因：

第一，劉建章同志的工作方法，是實事求是的，他並不大吹大擂地空喊組織，空喊宣傳，他沒有一點公式，他是從調查研究開始，從找典型，瞅目標著手，首先了解群眾的心理，然後抓著一點去做。他知道劉永祥是好趕牲口、有威信的腳戶，他調查了馮世英有困難，急需人來幫助。於是劉建章同志就找他們了，經過他們倆的社會關係去組織腳戶，經過群眾的口吻去向群眾宣傳。因此，群眾就很相信他，其組織力量、號召力量就特別大，他用這個方法是很靈的。

第二，劉建章同志的工作路線，是從群眾利益出發，解決群眾困難的，不論做甚麼，他首先了解群眾的情感、情緒和需要，他總怕群眾吃了

虧，總怕對群眾沒有利益，經常抓著群眾的心理和要求。比如他開始辦合作社的時候，群眾要求放帳，他即接受這個要求，就賒欠出賣貨物，群眾都說：「合作社真好，沒有現錢，還能來買貨。」他反對教條主義，他怕脫離群眾。比如，他組織馮世英運鹽，先就解決了他的困難，不要叫他吃虧。諸如此類的事情，都說明了他的工作路線，是群眾路線。

第三，劉建章同志的工作作風，是艱苦樸素的，他做合作社經濟工作八年之久，但他從來沒有不安心工作，或享樂腐化。他的生活非常樸素，對個人的利益，絲毫沒有打算。合作社離他家庭雖然很近，但他總是不願回去，有人勸他照顧照顧家庭，他還說：「不管它，合作社工作這樣忙，哪裏顧上家哩！」因此，他在群眾中的威信就很高。他在南區說話，真是一呼百應，和群眾是真正有著血肉聯繫。

目前正是各地組織運鹽隊的時候，這些工作方法，是值得我們來學習的。只要我們有這種精神，那麼，一定也會把運鹽隊組織起來，一定能使更多的劉永祥、馮世英湧現出來。

（原載《解放日報》1943年3月14日）

延安南區發展婦紡的經驗

南區共6個鄉，約7,000多人口中有2,000多婦女。這些住戶，大部分是從綏、米、榆、橫等縣移來的難民，根據該區第二鄉的調查，全區屬延安本地的老戶只有一姓。婦女們，除過料理家務和農忙時幫助男子送飯、擔水等事外，再沒有甚麼別的勞作。自從邊區政府提出發展婦紡的口號之後，南區和其他地方一樣的是響應了這個號召。在農村裏是照例的組織了紡織小組，但是這些組織，從未起過作用，而且一些會紡織的婦女，因不明真相，所以裝做不會紡。把婦紡組看做一種負擔，都在想法逃避參加。1940年延安縣府在高峯灣成立了一個紡織工廠，抽調婦女住廠學習，但是因為出於勉強動員，故派去的婦女終究沒有學會幾個。到1941年5月，劉主任計劃發展婦紡，可是沒有找到會紡織的人。後來他利用了親戚關係，找到了從葭縣來延安的一個織布工人高能文。於是合作社就買了1架織布機，6捆洋紗，25斤土紗。計劃在二鄉的南莊河設立一個紡織工廠，以便發展全區婦紡。而高能文這個人，對紡織事業是很熱心的，他感到沒有會紡紗的人，開工廠是一個大問題。因此，他隨時在打聽著哪裏有會紡紗的婦女。適值給他們修工廠房子的石匠李國泰說：他的老婆會紡線子，就是沒有棉花和車子。劉主任聽到了這個話，就做了車子，拿了棉花送交李國泰老婆去紡。並對她說：「只要你會紡，不管線子紡得好壞，合作社都要，並且還要獎賞你！」這時李國泰老婆就開始紡線了。在第一次交線的時候，劉主任發了她9元錢，因此，李國泰老婆紡線的積極性就提起來了。以後她又領了棉花回去，見莊裏的婦女，就滔滔不絕的誇獎劉主任獎

賞了她。並告訴大家說：「給合作社紡紗，是有利的事！」這時候她無形中就做了劉主任的宣傳員。因而南莊河從前本來會紡而裝得不會紡的王世業、王國義、張慶福等的老婆，聽了都開始紡上了。劉主任覺得鼓勵的方法很好，後來又給李國泰老婆獎賞了200元，此時正是換冬衣的時候，她用來買了芝麻呢土布，縫了一身棉衣給李國泰穿上。李國泰又是個石匠，經常在門外做工，生性又好說話，走到哪裏宣傳到哪裏。他說：「我的老婆紡線子，給我賺的穿了一身芝麻呢衣服，你們的老婆為甚麼也不叫去紡線呢？合作社好打交道，不論線子好壞都要，而劉主任還獎賞呢！」這樣一宣傳，全二鄉的男女，大家「眼紅了」。於是都紛紛去工廠裏領棉花學紡，到10月間就發展到八九十個紡婦了。

從此紡紗有利的口號，在鄉村間的婦女中，到處傳說著！到1942年的1月間，就發展到200多婦紡了，合作社又做了幾百架紡車，帶了些棉花，到農村裏散發了一回。並且規定：1個月能紡5斤線的，獎毛巾1條，能紡10斤線的，獎毛巾2條。開始學紡，就是不夠5斤，也獎毛巾1條。沒有米吃的難民，合作社還可以幫助調劑一些食糧，紡得不論好壞，交來合作社都收的。因此，走到處沒有一個婦女推辭不紡。此時，南區工廠的紗，也就不感甚麼困難了，但是紗的質量很不好，於是劉主任就想了一個提高質量的辦法，就把線子分成三等，一等55元，二等50元，三等45元。工廠洋布作價12元（低於市價6元），紡2斤棉花，交1斤線，賺的長頭按價換布。因此，婦女們為了多賺點布，大家都拚命地往好紡。但是她們交合作社的紗，仍然紡得壞，而劉主任不但不責備她們，而且交來的都收下了。為要線子都紡好，劉主任又想了一個辦法：規定交合作社本身的線子，也分了三等，一等交7兩，二等交8兩，三等交9兩（原先一律1斤交8兩）。這樣一來，好線就賺得更多了，婦女們又都爭取紡成一等線子，以便賺更多錢，所以合作社紗的質量，這時候就大大提高了！

南區婦女，自從開始紡織以來，就和合作社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她們一切日用品、針線、梭布等，都是在合作社裏置買，就是沒有現錢，也可以在合作社裏賒買布。婦女們對合作社劉主任的信仰，真是比任何人都要高。劉主任傳一句話，要婦女們來開會，不論怎樣忙，她們都要到會的。同時每次會議上，都敢說話毫無拘束，總有幾個婦女「鬥爭」的要獎賞她們。情緒非常熱烈，沒有一個表現抱怨不滿的氣象。在今年「三八」

節的時候，其他地方都要派人下鄉動員婦女開會，但是南區二鄉的「三八」節紀念會，只是劉主任傳一句話，就有一百多個農村婦女到會了。我們看，這些紡婦，雖然形式上沒有組織，但實際上比其他任何婦女組織都有力量。

但是南區的婦紡還是很不平衡的。據劉主任說：現在全區計二鄉400多名，一鄉150多名，三、五、六鄉300多名，四鄉只80多名，全區將近1,000多名，已佔婦女二分之一。全年棉花如不困難，是完全可以多發展紡婦的。因為沒有棉花，去年10月南莊河的工廠就停了工。因此，今年劉主任的意見：把工廠的工人和機子都分散轉到農村裏去，由幾個農戶集股設一架機子，合作社再湊一些本錢。現在工廠有8架機子，分散轉到農村之後，至少可發展到一倍。雖然形式上合作社的工廠停辦了，但實際上是一個發展。根據去年辦工廠的經驗，集中合作社辦，工廠本身是賺不了錢，去年計賠了3萬多元，但紡婦則賺了四五十萬元。如果分散轉到農村裏，一方面可以幫助農村手工紡織業的發展，另方面還可以避免遠路婦女領花的跋涉之苦，同時節省了合作社的許多麻煩。

從上面南區婦紡的發展過程裏，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幾點經驗。

第一、不要公式化的強求婦女參加婦紡組織。劉主任調查了過去南區婦紡為甚麼不能起作用之後，他知道：婦女們是怕參加組織的，他就不提出組織的口號。婦女們怕調往工廠學習，他就不調往工廠。他又知道：婦女們經濟還未獨立，他就予以有利。婦女們愛人家說好，他就多獎勵她們。劉主任了解了這些道理，就用避其所怕、就其所好的方法，引導她們紡織，使其親身體驗到紡織有利之後，自然不用動員也可以參加紡織了。現在南區的婦紡雖然沒有組織之名，但確有組織之實。所有南區的每個紡婦，都認識到合作社之於她們，才是真正有利的，她們和合作社建立了血肉般的經濟聯繫。所以，今後其他地區組織婦紡，也可以採取這種方式，不一定要強求一個組織形式，也不一定調幾個婦女出門學習。而應該就在當地著手，先從對群眾有利的小事上開始，那就自然可以發展起來了。

第二、不要強求普遍發展，而要先從一點著手，給群眾示範，作為發展的真實基礎。南區的婦紡發展，是從李國泰老婆開始的，劉主任沒有到處空喊組織宣傳，但他做出了成績。他知道一樣的話，經群眾說出就有力量。因此，他就利用李國泰老婆做了他的宣傳員。這些方法的發現，都

是他在實際工作中摸來的。他知道任何一件事情，在開始的時候，就要對群眾有利。因此他就多用獎勵方式鼓勵婦女，並且起了效果。各地區在發展婦紡的時候，如能瞅到自己區域裏的李國泰老婆，那就一定可以發展起來。

第三、在發展婦紡的過程中，我們的幹部，必須了解婦女的特性，根據南區發展婦紡的經驗，婦女們一般的是比較狹窄、嚙蘇的，比如在領花和交紗的時候，她們總想佔一點便宜。如果我們的幹部同樣的眼光狹小，計較毫釐，不能耐煩，不和藹，那就和她們搞不好的，也就會影響婦紡的發展。劉主任在南區的每個婦女心目中，都有著深刻的良好影響，他的每一計劃能夠順利完成，同樣由於他在每個男女的群眾中，有高度的威信。因此，我們在發展婦紡的時候，最好找在群眾中有威信的幹部去做。

1943年3月22日

(原載《解放日報》1943年3月28日)

模範的白塬村：勞動英雄石明德講， 魯直記

一、石明德的搭工組

淳耀縣第三區第二鄉第二行政村（包括白塬溝、大南溝、白塬村）共三個自然村，村主任石明德住白塬村，今年38歲，他是1941年從富平糜子鎮逃難來到白塬村的。他曾當過11年長工，1939年，富平縣保甲拔壯丁去，在富平、邠縣、西安、鼇屋前後受壯丁訓練總15個月，後來到了警年春備旅當兵，經過一個老鄉排長的關係，開小差回到富平，1941年他帶了老婆和一個娃逃到邊區來。下面就是勞動英雄石明德的自述。

在受訓的時候，一移地方就用鐵絲把三個壯丁練在一起，怕逃跑了，每天只分吃三個饅饅，再就是喝開水，真是痛苦的很！

到了邊區之後，我就找到了鄉長張福英同志，給我撥了23畝原地，當年收得秋田5石多。去年本村陳樹生說他的地好，要我種他的地，我就租種了他的50畝原地，這一年收得麥子5石，秋田3石多，自動要求交了1石6斗公糧。到了去年9月村裏的人就要選我當村主任。

去冬我就宣傳要組織搭工組，開始有些人不願意，特別是三家老財（李德禮、陳樹生、陳日順）不願意，經過我的耐心解釋後也願意了。統計全行政村共有72戶人，平均1戶有1個全勞動力，有6個老漢，有11個閑住娃娃（上半年7個，下半年4個娃不念書了），有21個能勞動的婆姨，有27犏牛，有18個騾、驢、馬等牲口。我把這72戶人家根據各家的平素關係和習慣分組了9個搭工組：第一組長王根山，7戶人有2個牲口；第二組

長史有桂，8戶人有3個性口；第三組長馮一滿，6戶人有2個性口；第四組長范公保，有9戶4個性口；第五組長石存和，有5戶2個性口；第六組長米加有，有7戶2個性口；第七組長柯德盛，有7戶2個性口；第八組長陳一平，有7戶2個性口；第九組長董世富，有4戶，沒有牲口。這9個組是基本的搭工組，長期不散的。

再把18個送糞牲口組織為一個運輸隊，變工送糞；計有李德禮是騾子2個，范信寬的騾子1個，阮卜有的騾子1個，楊信有的馬1匹，米加有的驢1個，張福英（鄉長）的驢1個，陳日順的驢1個，陳樹生的驢1個，范公保的驢1個，范生財的驢1個，趙開科的驢1個，馮起滿的驢1個，李天英的驢1個，楊宗義的驢1個，王閣由的驢1個，羅狗娃的驢1個，米加順的驢1個，共為18個。隊長選為范信寬。

再把11個娃娃組織起來放牛，全行政村有牛大小54條，分為3個組，推了張滿福為「牛長官」指揮牧場，定下規矩，誰要吵鬧，就罰他背一回柴。到了牧場，閑下的娃娃又開荒，共開了7畝荒地，得1石1斗多穀子、8斗洋芋、8斤青麻，都歸娃娃所有，他們準備給他們置買鬧秧歌（關中叫「社夥」）家具。

又把6個老漢組織起來，做零碎生活，變工墊牲口圈、割草、送信等工作，不會耽誤了好勞動力。21個婆姨也組織起來了，推了1個婦女主任、2個組長，在開荒、鋤草的時候，婆姨變工做飯。勞動力強的還到班子鋤地，有了的時候21個婆姨一起動手做，可以趕緊。所有的這個行政村的人畜勞動力，我統統把它組織起來了。

這個搭工的作用，主要是全勞動力的變工。現在我把它一項一項的分別來說：

（一）運輸隊共18個性口，由隊長范信寬領導，全行政村56戶的糞，8天就完全送完了。如果不分工，窮人和沒有牲口農民的糞要挑的送，1個月也送不上。在送借糧的時候，全行政村的32石糧，用分工運輸隊送，只有兩三天就送完了，並且還給三鄉和四鄉的人幫助送了4回，這時正是環境緊張，頑固分子要進攻邊區，為了集中快，就互助性的幫助送了，缺下工的也不還工。

（二）在9個搭工組裏，在開荒的時候，為了趕急，我就在各族裏抽了40個人組成4個開荒班子，專門開荒。第一班7個人，班長石順和，第二

班9個人，班長朱連照，第三班11人，班長朱六福，第四班13人，班長石明德。我提出組織班子時，有些人還不願意，我解釋後，說明用班子變工開荒快，大家也願意了。這4個班子都歸我領導，規定每天早上我一打鈴，都集合分班上山開荒。缺下工，有的還工，有的出錢，春季每個工規定出21元，願意還工的就不用出錢。全行政村計劃開荒120畝，我們開荒班子，從正月到3月一共開了420畝，差不多超過計劃的3倍。4月間柳林唱戲，他們要去看戲散班子，我解釋要他們不要去看，區政府號召開「義倉田」，我就趁這個機會，用班子的人為基礎集合了全行政村的57人開了1天義田，共開了17畝。種玉米的時候，是搭工組分的種，不變工1犏牛連犁帶納糞、點種子要3個人，如果變了工，因為是隔犁耕，3犏牛5個人就夠了，也算能節省700多個工。開完荒種完秋後，大家提出了要到友區趕麥場，我想了一想，不能去，一則外面拉壯丁，怕拉去一個就糟了，二則出去後，搭工組也就要上散夥了，我就又領導鋤了1次玉米。看著我們自己行政村的麥也熟了，大家要收自己的麥，就不去趕麥場了！

(三) 在收麥的時候，開荒班子又歸到搭工組內，按9個組收麥，全行政村共種1,100畝麥，收了4天就收割完了，用搭工組收割。分工：2個人割，2個人捆，1個人拾麥穗，1個人趕驢往回送，計算比不搭工，要節省300多個工。

打麥的時候，也是用搭工組打的，麥場都連在一起，輻軸用牲口拉，一家碾完接上又碾一家，一天能碾幾十場。有了風一起揚，全行政村共打得160多石麥，4天就打完了，麥子也沒有受損失，比不搭工，可以節省300多個工。

(四) 在鋤草的時候，還是基本的9個組，但是因為趕急鋤草，我又把班子叫起來，全行政村共種2,100多畝地，7天都鋤完了，共鋤3次，比不搭工能節省600多個工，這時候工價漲了，每天1個工漲到32元，還不了工的，1天就出32元工錢，有一兩人還專門賺工錢的。

(五) 在收秋的時候，班子又歸到組裏了，分成9個組收，1個組1天就收完了1家的，9個組1天就可以收完9家的，全行政村70多戶，9天就收完了。打秋田的時候，也是分9組，1天1組可以打完1家的，全行政村共打210多石秋糧，也費了七八天，連收帶打共費了十七八天，比不搭工，可以節省300多個工。

(六) 其餘是修捻地，春季計劃全村要修120畝，結果我們搭工組，乘下雨的時候，一共修了620畝，超過計劃差不多5倍。這個也帶互助性質，在下雨的時候，吆喝在田裏，一時就砌一道畔。

(七) 今年秋麥全行政村種11頃(1,100畝)，是用27犍牛分成9個組種的，一共種了7天，全行政村的都種完了，估計比不搭工可節省700多個工。

(八) 秋收時的打莊稼用具和場，也是用搭工組做的，起了62盤場，修了400木杈，編了150個籃子，50個篩子，18個簸箕，8個簸籬，都是變工編的，屬私人的。

所有以上的變工，都是給誰做工，吃誰的飯，好壞都不說話。

(九) 政府號召運鹽，我們行政村用搭工運輸隊馱的，一共到華池運了3次，已經運了44馱，計劃要運回45馱鹽。

(十) 秋田做完後，搭工班子我們還不能叫散了，繼續變工開秋荒，計劃要開200畝，我起身到延安時已經開過20多畝了，200畝我一定要完成。

這個搭工組，我們打算長期不能解散的，年年要搭下去。

二、白塬村的工作概況

(一) 減租。全行政村72戶，只有4戶不租地，其餘都租的種，共約1,700多畝，每畝8升租子，計136石租子，麥租一半，因今年麥收成不好，政府規定免交了，秋租一半84石，按四六減租，出了33石6斗租子，按政府規定都減了，因為只有4家地主，其餘都是勞動農戶，我們力量大，地主也不敢多收，因此都按政府法令減了。

(二) 農貸。今年白塬村政府放了12,500元農貸款，我買了鋤頭10把，分發給沒有農具戶和難民了，剩下的款子，都做了正經的事了。根據我的檢查，沒有糊弄的。4家老財沒給他們放，他們也不指望要借。

(三) 改造二流子。白塬行政村共有5個二流子，今年政府號召改造，我就對他們解釋，要好好轉變，轉變情形如下所述：

書興旺——是一個賭博鬼，關中俗稱「骨露匠」，沒有老婆，是一個光棍漢，一年不生產，專靠賭博過活，今年政府要他轉變，督促他開來2

畝荒，種了11畝熟地，今秋打了6石糧食，自動的還交了5斗公糧，現在轉變好了。

郭茂忠——也是個賭博鬼，和書興旺是一對，今年他也種了5畝玉米，收得2石，種了6畝冬麥，他自己一個人，有吃用，沒有救濟。

王忠厚——是個懶漢，住的和我隔壁，我就要他和我打夥種，還給他借了1把鋤頭，每天我照料他上山生產，今年他種了5畝蕎麥，能打1石7斗；3畝玉米，能打1石4斗，還種了15畝麥子，糞都是我給他的。

張福泰——是個煙桿子，有一妻，兩個娃娃，還有一個驢，他不轉變，我就把他夾在搭工班子內做活，把洋煙燈抓了交到區上，他沒辦法了，就種了10多畝秋田，30畝麥子。

陳鎖元——是個浪家子，老財陳樹生的侄兒，家裏嫌他懶，把他趕出去另住下，給他分了100畝地，1個牛，10多石存糧，他弄完了，又偷起他本家了。我們把他叫到開荒班子裏要他挖地，開始挖了幾天，他絕食，我們總不讓他，過了10多天，他看沒有辦法，就生產了。今年種了6畝穀子，12畝玉米，種麥24畝，能打7、8石糧食，每天一明，我就叫他去上山生產。一個婆姨好邀娘家。

(四) 自衛工作。全行政村組織了一個普通自衛軍排，分為3個班：共40個人。3個擔架隊15個人，另外又組織了一個基幹班，10個人，經常的查夜，時間不定，有時天天查，有時幾天不查，使壞人摸不住查的時間。今年7月環境緊張的時候，公安借了我們村32石糧，我們兩天就送完了，組織了3個擔架隊，自衛軍每天是在邊境上放哨，8個人分兩班，白日黑夜輪流放，如有一個不帶路條的，就不讓他走。

(五) 學校。有一處小學，30多個學生娃，白塬行政村有14個學生，教育的事情歸鄉長管，我不知道。

(六) 優抗工作。全行政村共有三家抗屬，一家王寶財，家有二個勞動力，不要我們代耕幫工；一家蘇德發，有一個半勞動力，地不多，也不要代耕幫工；只有買牛娃父親是一隻眼，母親是一個手，不能好好勞動，我們給他代耕30多畝地，到了種的時候，我們搭工班子一起去，一晌就種完了，就是買牛娃在家也不如代耕種得快。到過年過節的時候，我們送些豆腐、菜肉等給他們慰勞，全年他們都沒負擔，公糧不出，義務勞動也沒有，現在他們吃的比我的還好些。

(七) 移難民。全行政村今年共安置了15戶難民，正月我回老家富平一次，宣傳說，邊區好，「難民三年不出公糧」。就來了5戶，共14口人，沒有窯，我在村裏湊了5個窯給他們住，沒有糧食，我先借出2斗，影響大家一共借2石8斗糧，暫時都有吃的了。後來難民阮光耀回去又叫來4戶，曹元虎叫來5戶，自動又來了2戶，共45個人，糧又不夠吃了。政府發來青苗貸款，老戶都沒給使用，買了9石糧，都借給難民了，我長4斗洋芋籽，也借給他們了。今年在變工的班子裏，他們15戶都參加了。今年難民能收70多石糧，借去的糧11石8斗，今年只還2石8斗，其餘9石今年不要他們還，他們更高興。

三、白塬村明年生產計劃

(一) 白塬村一般情況

全行政村住72戶，共179人，全勞動力78人，半勞動力30人，稍能勞動的39人，不能勞動的40人，今年共種地21頃(2,100畝)，每畝地都是耕3次，全村有騾驢馬18頭，牛27頭。

(二) 明年(1944年)生產計劃

今冬計劃：

- 一、計劃種麥子1,100畝。
- 二、開秋荒200畝。
- 三、翻秋地700畝。
- 四、修墊地100畝。
- 五、拾糞3,500馱。
- 六、開義倉田13畝。
- 七、運鹽45馱(以9個性口馱5次)

明年計劃：

- 一、全村種玉米700畝，種糜、穀、豆子等雜糧200畝，地都計劃耕3次。
- 二、增加修墊地300畝，補修去年620畝。
- 三、麥子計劃鋤1次，玉米鋤3次，穀子、糜子等雜糧鋤2次。

四、種棉花 100 畝，鋤草 3 次，發動 2 個會織布婦女，給其他婦女教織布。

五、全村種菜 10 畝。

六、計劃到華池運鹽 54 馱（9 個性口馱 6 次）。

七、栽雜樹（花果樹）1,500 棵。

八、開義倉田 17 畝。

九、如公家和合作社能發動紡花，全村穿布不向外買，自織自用。

十、計劃養豬 24 隻，每月全行政村殺二個，誰殺下豬，大家借的吃，殺了再還肉，做到全行政村的人民豐衣足食。

十一、再安置難民 5 戶，因沒有荒地了，來多了沒地種。

十二、成立 1 個消費合作社，舉 1 個人不脫離生產當主任，將救濟難民的 2 石 8 斗糧，不分了還回去。作成股金，再發展本村人入些股金。染料利用本地元木樹葉做染料，不向外花錢買顏料。

四、石明德的今年生產總結與明年計劃

（一）今年總結：

全家共有 5 口人（父、妻及 2 個娃），只有 1 個勞動力，婆姨頂半個勞動力，有 2 條牛，1 條不好，送了難民老鄉，現在只有 1 條了。今年租地 50 畝，計麥 30 畝，只收得 2 石 5 斗多，糜子 3 畝，收得 9 斗，穀子 4 畝，收得 1 石，豆子等雜糧，收得 1 石多，麥子和秋田，共收得 9 石多糧食。麥租因麥瞎了，免租未出，秋田 2 石租，四六減租，出了 8 斗。拆了 30 畝墊地，老婆紡了 7 斤紗，織得 2 疋半布，夠全家穿。孵得一窩雞，挖得蘿蔔 600 斤，白菜能吃到明年 3 月。

消費方面，大人娃娃平均每月 1 人吃糧 1 斗多，全年節省些吃，稍餘些，今年公家借了 8 斗糧，油、鹽、洋火等消耗，全年要 6 斗糧食。住在原上，吃水有些困難。做工作 1 月要誤 10 天工。

（二）明年生產計劃：

一、種原來熟地 54 畝，都耕 3 次，再新開荒 6 畝種穀子，計種了麥 30 畝，糜子 5 畝，玉米 14 畝，麥收後種蕎麥 8 畝、洋芋 1 畝。

二、計劃麥鋤草1次，穀子鋤草2次，玉米鋤草3次，糜子鋤3次，洋芋鋤4次，估計天年好，可以收20多石糧食。

三、栽雜樹（花果樹）10棵。

四、計劃節省錢買牛1條。

五、補修墊地30畝。

六、上糞250馱，1條牛踏糞，再由老父親拾糞積儲。

七、僱1個半小娃，麥收後變賣的開工資。

八、種棉花2畝，估計收50斤。

九、計劃再找來難民5戶。

十、再抱1窩雞娃，喂1個豬。

十一、繼續領導全村72戶人畜的搭工組，使它長期的變下去。

我看了吳滿有同志的生產計劃，我的條件不如他，但我不甘落後，願意和吳滿有同志進行友誼的競賽，特別我敢和吳滿有同志競賽組織全行政村的勞動力，同時要長期的堅持下去。這個競賽，願意在明年勞動英雄代表大會上評判。

（原載《解放日報》1943年12月8日）

組織模範村之間的參觀

在去年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發現許多的模範鄉村。這些模範村，都是在勞動英雄的直接領導和影響之下創造出來的。其中當然還有許多缺點，需要今後努力克服，但是已給了我們一個經驗，就是凡是模範鄉村的建立，必須是群眾自己創造的，才有基礎。這個教訓，過去我們已經有過嘗試，現在則摸到一點方法了！

最近從報上看到各縣的勞動英雄大會消息，都提出要創造許多模範村，相信經過勞動英雄的努力，會有把握搞好的。但在領導創造的方法上，根據一些地方的經驗，我有一點意見，就是組織模範村之間的互相參觀，互相觀摩。因為村民們是現實主義者，他們相信「眼見是實」。即他沒有看見的事物，雖經宣傳，他總半信半疑，他見過的事物，再加宣傳，他就完全相信了。馬家灣模範村的讀報組，每讀到勞動英雄活動的事蹟時，大家都說：「對著哩！原因是陳德發見過那些勞動英雄了！」

現在各地的模範村，其模範程度當有深淺之分，甚或懸殊很大，因此在一定的生產時期，組織較差的模範村參觀好的模範村，我看定有作用。安寨縣李望淮同志計劃今年馬家灣的模範村去參觀吳家棗園，這對兩個模範村的經驗，定有一番交換，對模範村進程，將大進一步。距離遠地區對生產或有妨礙，但一縣之內或鄰縣，必有好處。

（原載《解放日報》1944年3月4日）

關於鄉長工作

「組織起來」的號召，在全邊區的每一個鄉村裏，都在實際的成為行動了。各種勞動組織，在黨政領導和勞動英雄的推動之下，都在進行組織了。但我們要承認開會組織只是組織起來的第一步，它的長期堅持下去，還需要許多工作，而這個工作又要把它放在直接接近群眾的鄉政府身上，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在鄉長身上。但根據安塞四區二鄉的調查，過去我們的鄉政府對於組織群眾生產，解決變札工隊中發生的問題，卻做得不多。實際上我們的鄉長工作很吃苦，每天差不多都在各村跑，在鄉政府住的時間簡直一年沒有幾天。

那麼，鄉政府的工作是甚麼呢？這從我們調查該區對鄉長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來，去年全年全區政府共給鄉政府74件，平均5天就有1件。分類計算，關於動員工作性質的共有35件，屬布置經濟建設工作的有26件，屬執行政策法令（禁煙、禁賭等）的4件，屬指示學習的2件，其他5件。從這個統計中我們首先看出，鄉長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其中估計有些可不必指示的，不然每件都照指示執行，5天1件無論如何是忙不過來的。所以今後對鄉政府工作的指示，我意見盡量減少。同時從指示中又看出我們現在的工作基本上是兩部分，一則是群眾對公家的各種服務和負擔，一則是組織群眾要幫助群眾發展生產。二者當然都是必要的，但我看過去鄉政府多做前者，而對後者做的還不夠。所以今後我想應該把方針變過來，應當多為後者，把主要力量放在解決變工隊、札工隊，以及生產運動中的各種困難問題上。這就需要調整鄉級幹部，加強對鄉級工作領導。

（原載《解放日報》1944年3月5日）

開展「五母」運動

三邊接近綏遠，地處沙漠地帶，牧草繁盛，原來即稱為牧畜地區。所以，這裏的牛馬羊駝等牲畜的繁殖和數量在全邊區說起來，要算為最快和最多了。在今年2月的靖邊縣勞動英雄代表大會上，開展「五母」運動的口號被合作英雄田實霖同志提出來了。他號召全縣的每一家，可以從一個母雞發展起，逐漸的發展為有母豬、母羊、母牛、母驢、母馬的五母之家。這一口號的提出完全有其現實條件，所以經過勞動英雄代表大會的詳細討論宣傳以後，就得到了全縣廣大人民的熱烈歡迎，同時三邊黨政也把它確定為今後經濟建設工作的一個具體任務了。

「五母」運動口號的提出，有其實際根據的。如果我們領導上，能把有關牧畜事業中的飼養、防疫等問題，得到具體實際的解決，那麼我認為在三邊各縣在最近的若干年內是可以完成這一任務的。比如靖邊縣，拿羊子來說：在1938年，全縣只有2,197隻，在6年中已發展到133,000多隻了（2年還死了99,000多隻），差不多增加60倍。以全縣8,200多戶計算，平均每戶已有羊子16隻多了。再拿牛來說：在1938年，有3,396頭，現在則發展到11,000多頭了，平均每戶差不多有1頭牛了。再拿馬來說：在1938年，全縣只有9匹，現在則發展到875匹了，差不多增加了100倍。再拿毛驢來說：在1938年，全縣只有2,520頭，現在則發展到9,675頭了，平均每戶已達1頭毛驢了。母豬則全縣已有1,359口，肉豬則有3,059口。母豬以1年2次生10個小豬計，就能生13,059口小豬。不算肉豬，以全縣人口計5人就有1條豬了。我們從以上的數字來看，靖邊的牲畜發展也算相當的快

了。如果把牧畜的醫療工作做好，使牲畜少死，那麼其數量當大於現在的數目。

其次，關於「五母」運動的發展，在目前邊區工業全部自給的任務下，也有它的重要意義。以紡織業上說：由於三邊氣候條件寒冷，不能廣種棉花。所以，人民的紡織穿布，均仰給於外來。全縣計算起來，就成為很大的一批人口了，對農民來說也是一筆很大的支出。如果白羊發展了，利用羊毛羊絨織成毛呢，穿上又耐又美，不是還可以抵制外貨輸入嗎？目前靖邊在 133,000 羊子中，白羊佔有 60,532 隻。春秋兩季，平均每羊以剪 1 斤半毛計，現在已收白羊絨毛 90,790 多斤。以 4 斤毛絨 1 丈呢布算（新塞工廠的標準），則可織大面呢布 22,500 多丈。可惜的是白絨我們還不能織布。這可供 15,000 人口的全年穿衣（每人全年以小布 3 丈計）。如 5 口之家，一年共穿大布 7 丈 5 尺，則有 30 隻白羊的毛就夠穿衣原料了。所以「五母」運動的開展，單從羊毛來說，在邊區全面自給的任務下，也有其重要地位的。其他如羊皮牛皮可以製革，牛骨可以取燐，牛羊蹄角可以 X 鈕扣。凡此，都成為全面自給的一個重要部分了。

再次，「五母」運動在農業上說，也有其重要的地位，耕牛、毛驢都是農業上目前主要的工具。現在靖邊的農戶，雖然不感到甚麼耕牛的困難，但是牛工還是比人工高貴的。如果牲畜更加發展了，做到一戶一個母牛，那麼農民的主要生產工具基本上獲得解決了。次如牛馬羊驢等糞，都是農業上的很好肥料。

上面我們敘述了「五母」運動發展的重要性及其開展的可能條件。下面我們將要說明一下開展「五母」運動的幾項工作。

第一、要加強牲畜的管理和牧放人員的管理工作。

目前農民對於牲畜的圈養大都是不講究的。有的搭個草棚，不蔽雨雪，有的打個窯洞，潮濕狹窄。甚至有些牧主，放出之後，幾天不牧管了，因此往往造成牲畜的病死、凍死、餓死、生病等現象。甚至有的被狼吃了，或失掉了，也不知道等等。這樣使牲畜的死亡就沒法減少。靖邊在 1943、44 兩年中，死羊 99,000 多隻，以今年計，死亡率佔羊總數的 23% 以上。兩年死了牛 1,195 頭，佔牛總數的 10%。其他如驢子死了 160 多頭，馬死了 30 多匹。追究起來，這些牲畜的死亡雖還有其他原因，但管理不善，圈落不好是極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對於牧放人員的教育工作，也是極重要的一個問題。特別是牧羊人，一群牲畜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說，完全是操在牧放人的手裏。如他不好好的放牧，他可以常常使牲畜吃不飽草，喝不飽水。歇午關在陰暗地方，很快的就使牲畜生了病，所謂「啞音牲畜」，牠是不會說話的。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可以實行獎勵牧放人員的辦法。靖邊縣龍洲區一隊支書方占昌同志的牧羊人，是僱來的工人。在沒有獎勵以前，狼吃了許多羊，他還不知道，掉了以後就等不回來了。在給他一隻羊之後，不僅一年沒有狼吃和失掉一隻，而且沒有生病死亡。由此可見，牲畜的死亡，牧放人員的精心管理與否，是有極大的關係。這裏我們提議對於未來的牧羊人可以實行畜牧分紅辦法。這樣可以激發他對牲畜的愛護心理。同時，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召集牧放人員訓練班，要有牧放經驗的人，講授牧放方法。

第二、要準備牲畜飼料。

在邊區的每年開荒運動的口號下，牧草和屯糧發生了直接矛盾。開荒越多，牧草越少，對於牧畜的發展，越受到影響。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第一要提倡牧小群羊，因為牧場小了，群大了不好放。第二要多種苜蓿，多修草圓子。今年靖邊計劃種苜蓿3,000畝，割野草445萬斤。第三要種秋燕麥和禾草。第四要多植樹木。樹葉不僅可以喂羊，而且可以喂牛和駱駝。靖邊縣在今年6月區鄉幹部會議上，提議在3年之內，每戶平均達到植樹360株，或栽沙柳1,080窩的計劃。估計舊有及近幾年所植的樹，全縣在200萬株以上，今後只要把植樹地的問題解決了，3年內再增植150萬株是有可能的。這樣，不僅解決了牲畜的飼草問題，而且解決了全縣人民的燒葉和種地施肥的問題。因此，「多栽一株樹，養活一隻羊」，「少燒一升糞，多收一升糧」的口號，不僅要繼續的向群眾宣傳，而且要把它變成每一群眾的實際行動。

關於豬狗飼料，在邊區到處普遍的生長著，根據喂豬有經驗的人說：灰條、蘿莉、苦葉、沙蓬、麻花、杏葉、蕎麥花，等等都可以喂豬，據說疾蔥曬乾磨成麵還可以喂胖豬的。

第三、要加強牧畜醫療工作。

在幾年來的牧畜死亡中，雖然會提倡建立獸醫所，建立保險合作社，但迄今還沒做起來。所以，每到發生疫病牲畜大批死亡的時候，我們就沒有辦法了。靖邊在6月的區鄉幹部會議上，討論決定全縣各區成立牲畜防

疫所8處（已經成立起4處），並吸收當地獸醫14人參加工作。在縣上再設立藥材供銷社1處，供銷各區所需藥材。這些防疫所的醫生，要經常下鄉一面進行實際醫療工作，一面進行牲畜防疫宣教工作。並吸收牧畜主參加牧畜合作社，現在鎮靖區六鄉的合作社，已吸收了100多隻羊入股了。這樣的進行，是把防疫工作和發展合作社工作結合起來了，所以一般的牧主都很歡迎。現在各區都在這樣的進行著。

第四、要進行改良畜種工作。

目前靖邊的母羊約有56,000多隻；母牛約有2,200多頭；母驢約有670多頭；母馬約有210多匹；母豬約有1,350多隻。這些母畜的交配，大部分是沒有選擇過的同血種的交合，因此，對於牲畜的繁殖和發育上是不太好的。雖然我們沒有科學的研究，但據有牧放經驗的人談：異地畜種的交配，比同血種的交配好。所以，我們計劃趕今年8月由各區集資到鹽池買好灘羊X羝120隻，分賣各羊主配種。另外再由合作社、防疫所及鄉級幹部，選買拉牡馬（群眾叫兒馬）11匹，拉牡驢（群眾叫叫驢）3頭。經常下鄉進行改良畜種工作。這樣，一面可增加牧畜的繁殖，一面還可增強牲畜的健康。其次對於羊子的繁殖，並進行隔圈，不要混圈。比如靖邊今年羊的死亡率，羊羔為41%，大羊為23%。其原因主要為大羊體瘦乳少，流產或餓死的。我們知道綏米橫一帶的羊羔少死，因為他們大部分放的隔圈羊。

關於發展「五母」的工作，主要的大概說到這裏。

這裏我們再說兩點有關事項：

首先，隨著「五母」運動的發展，並進行民間紡織、製革、熬膠等手工業作坊的建立。現在靖邊的絨毛大部分向外出售了，農民自己紡織絨毛的是極少數的。雖然部分區鄉有少數絨毛「和和匠」，但由於政府的幫助和提倡不夠，現在還沒有較普遍的發展起來。因此，今後注意幫助這些民間手工業的發展，成為必要的工作了。其次，還要設立製革、熬膠等作坊。在兩年來，靖邊死了1,000多頭牛，和近10萬隻羊，其皮毛大部賤價出賣了，或者放成廢物丟掉了。但是利用這皮子來熬膠，都是可以使用的。過去都沒有注意這點，如果把它統計起來，那就是很大的一個損失數目了。

最後，在發展「五母」運動中，要調劑母畜的普遍發展，現在這裏的母畜數量，其在農戶之間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因此，對於沒有母畜的

農戶，要注意幫助他們發展。對於已有許多母畜的農戶，要注意幫助他們調劑和出售。如靖邊龍洲區，共有居民 1,000 戶，有老母豬 217 隻，今年可生小豬 2,100 多隻（以平均每隻生 10 個計），平均每戶則有 2 隻豬了。據區上的同志說：現在有些農戶感到豬的銷路不暢，喂不過來。如要他們再發展，對於這些農戶似乎不太迫切了。因此，今後各區合作社，必須有計劃的幫助農戶進行調劑和販賣工作，使已經發展的農戶，不感養不過來，使沒有發展的農戶，很快發展。

關於開展「五母」運動的許多問題，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論及，這裏只大概的敘述了一下，希望對此有經驗的同志加以指正。

1944 年 7 月 7 日

（原載《解放日報》1944 年 7 月 24 日）

關於小學教育問題

一、對過去小學的一點檢討

我們從這次文獻調查材料中，知道靖邊全縣 50,700 多人口裏，學齡兒童大約佔人口的十分之一（此以新城區調查推算）。而小學數目，從 1939 年到 41 年為最盛時期，全縣完小和普小共有 19 個，學生為 433 人。冬學約 15 處，學生為 235 人，總佔學齡兒童的 13% 強（冬學中還有成年）。1941 年以後，在所謂建立正規化提高質量的口號下，小學大行合併和裁減，全縣完小普小共並為 8 處，學生減至 334 人。冬校只有 9 處，學生約為 152 人。這樣在數量上減少了，但在質量上仍然沒有提高。今天檢討起來，這個以縮小數量提高質量的辦法，是不符合從普及中來提高的原則的。從這次調查材料中考察，過去小學辦不好，其主要原因：不在於因數量多而影響了質量的不能高，而是對於邊區地廣人稀，農村分散的特點估計不夠。所以在辦小學的問題上就產生了許多不應有的現象。如：有些農民，怕念書把娃娃送到友區去，有些農民，把念書當成了當兵，花錢僱用別人的娃娃去頂替。還有的怕念書把家庭分居。有的讓大人來頂：新城區派游擊隊去動員學生，徐老漢把娃娃寄出去，自己到學校來頂，念了幾天受不住，又要求回去接娃娃來。

為甚麼產生這些現象呢？

(一) 學校距離家庭遠，「貴器」子女，父母捨不得送出去，尤其是女孩，他們更不願送出門讀書。據調查，小學學生年齡平均都在14歲以上，同時沒有幾個女學生。

(二) 家庭經濟不發展，勞動力缺乏。念書又要花費很多，如長城小學的一個學生，一年在學時間為8個月，除棉衣單衣不計外，僅吃米、伙食、文具、零用等消費，按目前米價計，即為1石6斗小米了。這樣大的消耗，較寒家境，是供給不起的。這裏我們調查了兩個小學學生的家庭成分。新城區小學36個學生，中農16戶，富農18戶，地主2戶，沒有貧農和僱農。長城區小學30個學生，富農9戶，中農15戶，貧農6戶。由此可見，家境較寒的子弟，是沒有多人讀書的。

(三) 教員質量差，在群眾中威信不高。如：某區小學教員，改作文把「拾糞」兩字，寫為「十憤」。勞動的勞字寫為「老」字。拿東西的拿字寫為「那」字。這是文化的一方面。其次，有些教員認識單純，不懂得社會上的應酬學問。如群眾日常往來的文約、請帖、對聯、紅白喜事等他們都應酬不來。所以群眾的生活和他們不能密切起來，群眾說他們「不中用」。再次，是教學上的形式主義作弊，如一個教員對初小娃娃講地球、太陽、月星等天文地理，學生一滿解不下。對於學校設備上，則要求正規化，要建立圖書館、辦公室、會客室等等。對於學生管理上，每天開一次「夕會」檢討學生的每日生活（上見新城區小學調查）。甚至個別教員借生產之名，行利己之事，包粽子搞生意。勾引大學生騙小學生的錢，引起家長的不滿意。這裏我再舉一個例子，可以看出群眾對他們的沒信仰了，如某小學教員和學生打架，被學生打哭了，而轟動了全村的群眾。這不是挖苦這些教員，而是需要他們注意的事實。

(四) 學生進步太慢，學用又不能一致。如長城區小學的一個學生念了七年書，據測驗才識了1,000多個字，其中還有90幾個字寫錯了。三年級的一個學生，把同學的「學」字，寫成了「蒙」字。再比如龍洲區的小學，是比較好的一個，據測驗：一年級學生只識會100至300字，二年級學生只識會600至900個字，三年級學生實只識會1,000個字。但識的這些字，多是能認不能寫，知音不知義。對於農家日用的石、斗、升、合，糜麻、五穀、文約對聯、書信便條等常識，絕大部分是不會的。如新城區小學測驗：把「靖邊縣、新城區」六字大部分寫錯了，這裏說明我們過去辦的學

校，學生的質量是太差了，同時學與用又是脫離的。所以群眾說：公家學校識不了字，是有其一面道理的。

(五) 學生讀書沒有課本，這裏的小學生，有讀了二三年書到現在還沒有課本的。有的是幾個人共一本，放假回家，不知道歸誰帶好，鬧得大家都不帶，所以回去之後就不能學習，把識會的幾個字也忘記了。辦學校的說不給發新的課本，又不讓他們念《百家姓》、《日用雜字》等舊東西。結果是沒有書念。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未得到很好的解決。

上述五點，是我們對於過去小學教育的大概檢討，問題的確是存在著的。在今後民辦公助的方針下，必須克服這些現象。我們列述這些現象的目的就是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以求克服的方法。下面再講今年我們開辦小學的經驗。

二、我們創造了五種小學形式

6月區鄉幹部會議後，開始了對民辦小學的設立，在兩個月的時間中，民辦學校已有一些發展，現在已開學17處，到校學生304人，連原有舊式8處，學生已達638人了。其數量已恢復到靖邊縣小學的最盛時期。為了把問題弄得清楚，我只講一下，這裏民辦小學的五種形式，和每一種形式的利弊。

第一種是輪教小學的形式。在鎮靖區二鄉人口較多的閻店X，有7戶人家，學齡兒童13個。魚溝濠13戶有學齡兒童11個。狼臥溝22戶人家有學齡兒童17個。共為41個娃娃，都在10歲左右。村與村的距離為3里至5里遠近，以魚溝濠做中心村。每村設1教室，每校設1校長，管理學校學生，負責召集上課。另外設1總校長，負責領導3處，現已開學，3處到校學生45名，內有女生27名。教員是本地人，群眾很熟悉。上課每天分早午晚3次，輪教3處。學生不動，教員流動，教員教後，學生還可幫助家庭生產。這樣，群眾非常歡迎，認為早就這樣辦，他們的子女都已認字了。為甚麼呢？因為它解決了群眾的送學六種困難：(一) 學生念書還可幫助生產。(二)「貴器」子女不離本村，父母沒掛憂，女娃也放心上學。(三) 不出門，不要縫新衣服，穿破鞋也不怕別人笑話，特別是不要縫一塊被子。(四) 家裏吃飯，不要供米麵。(五) 窮人也能上學，沒有學費。(六)

可以減少教員。這六種困難，在舊的小學裏是大多存在的，但是這裏現在把它克服了。

那麼它有甚麼缺點呢？（一）管理比較鬆懈，（二）教員比較勞累。除此以外，倒沒有甚麼不好的地方。為了克服管理鬆懈的缺點，每村設了一個人負責管理召集學生，學生中又分編小組。為了減輕教員勞累，要他不自己做飯，不要管理學生。學習速度，據檢查：14天時間，有識會40個字的，平均起來，每天都認會兩個字。比舊的普小，認字速度還快。

但是這種小學的教員，必須吃苦耐勞，能團結群眾，還要有相當能力，不然是搞不好的。現在教員吃飯，一個村子是輪的吃，二個村子是家長集米一家代替做。明年準備開荒解決。現在經費，是由勞動英雄、積極分子等組織的管理委員會募捐解決。

第二種是村民公學的形式。就是一攬子形式。鎮靖城市鄉就組織了這樣的一個小學，其中包括有：（一）長年學生24人（女子11，男13）。年齡平均9歲以下，以家庭成分論：富農2戶，中農5戶，貧農6戶，半工半農2戶，工人2戶，小商人5戶，僱農2戶。這樣看，貧富子弟都能念書。貧者近者在家吃飯，富者遠者在校吃飯。（二）有半日學生6名（男生1名，女生5名），他們半天生產，半天讀書。家境較貧寒，計貧農5戶，半工半農1戶。（三）有識字組學生6名，計變工隊員2人，牧羊娃娃4人。教員不能怕麻煩，隨到隨教。（四）夜校學生6名，白天生產，晚上來念書。（五）設群眾黑板報1塊，教員負責編寫報，群眾組織編輯委員會。各政村主任，鄉政府委員，變工隊常任通訊員，會寫的用書面寫，不會寫的用口語傳。已出版8期，頗得讀者歡迎。（六）設群眾衛生委員會1個，教員兼任秘書，會舉行1次全村衛生大檢查。（七）設群眾俱樂部1個，教員亦兼任秘書，負責收集民間小調和編寫劇本。曾於6月演出《反巫神》一劇，頗得觀眾歡迎。（八）設讀報組2個，組員18人，負責給他們讀《群眾報》。其經費，由勞動英雄秦彥林、積極分子劉紹邦等向全鄉募捐款洋12萬元，蕎麵1斗，黑板1塊。又決定植沙柳2,000窩、柳樹1,000株，種多麥2垧，開秋荒6垧。原有全鄉之廟產70垧均改歸學田。教員冬季棉衣由政府幫助解決，學生則大部在家吃飯。其管理由勞動英雄和積極分子組織管理委員會，負責解決學校經費，及商定課程、收學放學等一切事宜。現在開學

約一月時間，學生成績檢查：最高的識字 200 多個，最低的也識字 10 個以上。

總觀這個小學，它有以下三個特點：（一）包括全鄉文化活動，已成為一個文化優點。（二）生產與教育結合，雙方都能照顧。（三）不論貧富子弟，皆有求學機會。

第三種，是民辦變工小學形式。新城區五鄉原來沒有學校。今天政府提倡成立民辦學校，全鄉群眾要求把他們送在舊小學的學生抽回來，在本鄉另辦一處。經政府同意後，即抽回學生 6 名，另外又招收了 12 個娃娃。但是這些娃娃在家裏都是放牛放羊的娃娃，念了書即不能放羊、放牛。後來勞動英雄張華把他們組織起來，變工放牛讀書，把問題解決了。如王家的娃娃放 4 個牛，杜家的娃娃放 8 個牛，合起來一塊放。王家 4 個牛 1 次輪流念 2 天，杜家 8 個牛 1 次輪流念 1 天。這樣，既能念書，又能放牛，雙方都兼顧到了。

第四種，是家庭小學形式，這種形式在全縣已出現了 3 處。如鎮靖區一鄉劉玉江家，共有 8 個娃娃，劉玉江管家又識字，家庭比較好，經政府動員解釋後，他即設立了一個家庭小學，另外又吸收了外家 1 個娃娃，現已開學了，識字最多的，已能識到 100 多個字。他們念的書，現在是《百家姓》和《日用雜字》。這種學校較為簡單，沒有甚麼經費開支，學生以識字為主，但是它可能發生落後的非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偏向，對於新鮮事物的灌輸，比較缺少。所以政府對於這種學校，需加強領導，供給新鮮讀物，多參觀檢查，並給予經費和對教員的幫助，使它多招收一些外戶學生，逐漸可以搞大起來。

第五種，就是民辦公助的一般形式。這種形式，佔全縣民辦小學之大多數，其學生大多為外村送人的長年學生，沒有上述四種包括的內容廣泛。因之它還帶有舊式小學的味道。但是由於它是由勞動英雄和積極分子創辦起來的，所以群眾對他的看法和對舊小學的看法不同。如鎮靖區六鄉民小，張四海 1 戶送了 4 個娃娃念書。對過去的舊小學，一家絕不會送 4 個娃娃去上學，這是因為現在的小學是由群眾自己創辦起來的。

這種民小為甚麼內容不能包括那麼廣泛呢？我們檢討，因為他沒有和廣大群眾結合起來，只有積極分子的努力，還沒有廣大群眾的擁護，所以他不能成為「包羅萬象」的一攬子學校。

上述五種學校的形式，據我們研究，比較適合邊區環境的，是前三。後二種形式：前者因為邊區大家庭小學，不易普遍發展；後者因為沒有和廣大群眾密切結合，可能使群眾發生不滿，同時因為它和舊式小學一樣，學生家長在經濟上有相當負擔，因之家境較寒的子弟仍求學困難。在今後推廣小學的工作上，我們的意見，應該多推廣前三種形式，對於後二種形式的小學，應該加以改進，使它逐漸的轉到適合農村的環境。

三、在創辦小學上的經驗

(1) 開辦小學，要適應邊區地廣人稀、農村分散的條件。它因不同於經濟發展和人口集中的大城市，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過去辦小學，對於這一點我們是沒有很好的估計到的。所以許多地方抄襲了外面的一套，以致我們的小學辦不好。從上述第一第二兩種形式的小學學生數量上看，只要能適合農村環境和群眾要求，群眾是願意送他們子弟上學的。

(2) 開辦民小，首先要將勞動英雄和積極分子發動起來。上面五種形式的任何一種，都是經過勞動英雄和積極分子的活動。但是僅有勞動英雄和積極分子的活動，沒有與廣大群眾的結合，事情還是辦不好的。前三種形式的民小，因為它和群眾結合了，所以它就辦的好。後二種形式的不如前三種好，就是因為它沒有直接和廣大群眾結合起來。這裏更使我們了解了：「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的領導辦法，的確是非常正確的一個辦法。

(3) 這次更證明了，一切工作只要群眾發動起來，只要給群眾「甘當小學生」，一切困難都可以解決。如這次17處民辦小學的開辦、教員、校址、經費等困難，都是群眾解決的，他們把公荒、廟產、黑門產都報告出來，作為學校的教育基金。他們自動的栽沙柳、柳樹，給學校燒柴用。他們把自己的好地拿出來，給學校種冬麥，諸如此類的活動事實，證明了一切困難在群眾中都可以解決。過去靖邊在辦學校的問題上，是脫離群眾的，所以許多困難不能解決，沒有辦好一處小學。目前在民辦公助的方針下，才實際的給了我們再次的教訓。

(4) 最後特別重要的，是要把區鄉幹部的思想搞通。據這次調查，鎮靖區幹部的思想搞通了，所以他們區的成績就最好。其他部分區鄉為甚麼

沒有搞出來呢？就是因為他們的思想上的毛病沒有肅清。阻礙了他們工作的進步。如一個區的領導幹部說：「等秋後再搞吧！現在群眾顧不上。」「八路軍說起做甚麼，連午覺也不睡，真是……！」這種說法，充分表現了他們對民辦小學的開展，在思想上是沒有要努力去做準備，只是當成了對上級工作的應敷衍事。

（原載《解放日報》1944年10月1日）

靖邊的識字組和黑板報

一、識字組

這兩個月中，鎮靖、鎮羅、新城、青平、青陽等五個區，共組織起識字組93組，參加識字組男人800人，參加識字組女人53人，合計853人。

這些識字組有的是單純的識字組，有的是利用變工隊形式的，有的是附屬在小學、合作社等內的。這裏我們調查了三個識字組的材料，茲逐一介紹於下：

(一) 鎮靖區瓦房變工隊識字組調查

姓名	年齡(歲)	識字時間(天)	識字多少(個)	會寫多少(個)
張秉彥	19	34	62	36
王萬昌	20	同上	65	58
王萬貴	23	同上	124	106
王志誠	17	同上	14	14
王志護	20	同上	52	50
王六娃	17	同上	99	90
王萬福	27	同上	82	50
高步青	25	同上	188	172

從上表可以看出：34天中，識字最多的高步青，平均1天識字5個以上。最差的為王志誠，平均每天識1個字的十分之四。8人總平均每天每人識字2個半。如經常堅持下去，一年零兩個月，就可以識字1,050個。

這個變工隊的識字組，是由區委書記親自領導的，又有勞動英雄王國寶的經常督促，所以識字比較快。同時這個識字組的情緒也高，在鋤草時大家趕著往地頭鋤，站下就學寫。午上也不休息，在地上寫字。唱起歌來，互相對著唱字。如一個唱麻子，一個唱黑豆等。

(二) 張家畔婦女識字組的調查

姓名	年齡(歲)	識字時間(天)	識字多少(個)	家事多少
李桂芳	20	15天	40	少
張翠鳳	15	同上	38	多
張守班	13	同上	36	多
曹玉英	20	同上	18	多
志強妻	28	同上	37	少
曹玉蘭	28	同上	36	多
張世芳	28	同上	38	多
高玉蘭	24	同上	14	少
趙英妻	22	同上	18	多

從上表看出：這個識字組識字最多的，李桂芳15天識會40個，每天識會2個字以上，識字最少高玉蘭15天識會14個字，1天不到1個。

這個識字組，是由區政府直接幫助的。開始組織時，婦女們有的說：「我們死婆姨有娃娃，記不下。」有的說：「人家不識，為甚麼要我來識，我一個人頂不起天！」還有的說：「識會字，要到毛工廠紡線子去，要當公家人！」如此種種說法，證明她們對識字的意義還不了解。所以區政府又動員了積極分子余惠民向她們解釋，說明識字是一個長期工作，每人要識會1,000個字，誰也不能不參加。誰識得快，誰就可以早畢業。所以她們都沒有意見了，都在爭著往會識。以後又實行了獎勵批評制度，識字多的在黑板報上表揚，不願識的批評，這樣，她們的情緒更高了。李桂芳客氣地說：「我好好識就對了，這登甚麼報！」

(三) 張治中變工隊識字調查

姓名	年齡 (歲)	用心否	天資如何	管家否	光景	識字動機	識字多少 (個)
張文義	24	用心	伶俐	不	好	想做生意	85
馬冰舟	32	不用心	平常	管	好	對政府不滿	13
馬光前	25	用心	平常	不	好		14
王興洲	28	用心	平常	半管	好		42
張世興	28	用心	笨	管	攔工		20
張振華	21	用心	伶俐	不	好		74
趙英	17	用心	平常	不	好		20
正李拴	20	用心	笨	不	僱農		12
張炳彥	19	用心	伶俐	不	攔半工		62

從上表看出：(1) 天資聰明的識字快。(2) 不管家務和光景好的也識字快。(3) 家境不好和管家人識字慢。(4) 不用心和對識字有意見的慢。

(四) 組織識字組的經驗

A. 識字組必須要有強的領導，瓦房識字組的有成績，因為有區委書記的直接領導，所以識字多且快。如果只有組織，沒有經常的檢查和教學，那就大半會變為空架子而不起作用。

B. 識字組織必須和生產組織相結合，它可以利用變工隊、札工隊的集體性進行教學和競賽。單純的識字組織，再沒有專人領導是不起多大作用的。但是如果變、札工隊不能一年堅持下去，則識字組的組織形式，亦必隨之改變。我們研究的經驗：最好以村為單位組織，由一個人利用早午晚的休息機會去教字。如此則既易集合，又不耽誤生產時間。

C. 識字組的組員，每人最好能有一個本本，經常帶在身上，便於溫習。如果沒有識字本，識會的字就容易忘記。張家畔婦女識字組商人給他們捐了一刀麻紙，每人訂了一個識字本，把認會的字都抄在本本上，閑下的時間就學習上了。

D. 那麼應給他們教些甚麼字呢？據我們的調查，有以下的八種識字要求：(1) 要識糜麻五穀，日用雜字。(2) 各種樹木，各種農具。(3) 票面號碼，銀行名稱。(4) 草料收據，糧票路條。(5) 珠算漢碼，記帳管工。(6) 姓氏名字。(7) 揭借收欠，借貸關係。(8) 念《三字經》。從這八種不同的識字要求看，由於經濟的發展，他們都需要識字了。對於這八種識字的要求，除《三字經》外，其他的都應作為我們編寫課本的內容。編寫的方法，農民喜歡字句押韻，順口能唱，類似山歌一樣的《信天遊》句子。這樣比一個一個的單字要好記。

二、黑板報

黑板報還未普遍建立，現只鎮靖城和張家畔建立兩處。據最近檢查，有以下幾點經驗：

(一) 黑板報同樣要採取民辦方針，不要以為群眾辦不了。鎮靖城的黑板報是由勞動英雄和積極分子創辦的，由小學教員幫助編報。各政村主任、變工隊長、鄉政府委員任通訊員。現已出版5期，計來稿41件，其中有不識字的口傳稿25件，識字的書面稿16件。由群眾自己組織編輯委員會，選定稿件後，請小學教員寫出。登載了稿件必須把通訊員名字寫上，通訊員的投稿情緒則更高起來，同時他一定要跑來看一次。由此可見，群眾是能辦黑板報的。

(二) 寫黑板報要拿到掛報的地方去寫。這樣在寫報中間就吸收了群眾和通訊員的意見。張家畔黑板報是在外面寫的。每期寫報的時候就圍了幾十人看，如果你寫錯了字，群眾就當時參加修改意見。如有一次通訊員張問孝的稿子登出了，我們把問孝的「問」字寫成了「文」，他馬上要求我們修改。如果把通訊意思遺漏或弄錯了，他們也馬上提出意見。這樣寫黑板報，群眾實際上是參加了辦報工作。這樣會使消息更加真實正確。

(三) 黑板報內容要地方化，要適應讀者口味。如張家畔商人多，他們喜歡看時事消息。鄉村黑板報，他們喜歡生產、變工、衛生消息。鎮靖城市鄉（實際是鄉村）黑板報把宗文彥不衛生的情形登報了，群眾都去看，宗文彥馬上就把院子打掃乾淨了。黃懷業變工隊唱會五個歌子登了報，一

政村的變工隊聽見了，趕快也就學歌子。從這裏我們看到，黑板報可以起推動鄉村工作的作用。

(四) 黑板報字要寫的大，話要說的明，不要「王大娘裹腳布」一扯一大堆。全幅有幾分鐘就能看完才好。字太小，話又長，群眾就不願意看。

以上四點，是我們檢查黑板報的經驗。詳細的情形，留待以後再談。

(原載《解放日報》1944年10月6日)

靖邊植樹的經驗

一、靖邊提倡植樹造林始於清末年間，據傳光緒二十二年，掌靖邊縣政之丁錫奎曾提倡每人植樹5株，但由於封建統治的專制黑暗，雖再三申令，老百姓都視為害根，不肯種植，所以收效很小。土地革命以前，三邊是匪患頻仍的地區，農村經濟、人民生活，日趨破產，對於植樹造林，更無可言。1939年後，邊區開展生產運動，靖邊縣政府即提倡大量種植樹木，據今年7個區（全縣共8個區）不完全的統計，現在共有樹木946,377株，以7個區的戶數平均計算，每戶還127株之多。但由於區鄉幹部的宣傳不夠，有些群眾不了解政府調查的意義，在統計時有些群眾打埋伏，不實報，所以實有數一定比這個數目還要多。即以1942至1944年三年的植樹計，42年植樹84,059株，43年植樹235,007株，44年植樹307,334株，總計三年植樹為626,400株，成活樹為515,545株，佔植樹量82%強。這可以看出靖邊廣大群眾對植樹護林是認真的了。

但是對於植樹護林工作，仍然存在著嚴重毛病，比如某些機關部隊不經群眾同意，隨便砍伐，影響群眾的植樹情緒。又如二流子偷伐樹木，破壞新苗，牲畜咬啃樹皮等，都對植樹護林起了破壞作用。這些毛病都是急待糾正的。

在牧畜發達又沒有煤燒的三邊，植樹是特別重要的。飼養牛羊，供給燃料，都需要植樹。群眾中有「多栽一棵苗，多養一隻羊」，「少燒一升糞，多收一升糧」的諺語，現在在靖邊群眾中普遍的流傳著，並且已成為靖邊黨政領導經濟建設工作的一個宣傳口號了。

二、在邊區提出長期建設的任務中，每戶種植 100 株樹，根據靖邊的情況，這個口號，全鄉每戶平均計算已經超過，所以我們提出了每戶植樹 360 株的任務，一年 360 天，計劃每戶每天燒一株樹的枝梢，再以其樹葉，作牛、羊、駱駝的飼料。這在上月全縣的參議會和群英會上，已正式通過了。並決定三年至五年內全部完成。這裏我們根據和植樹英雄白雲瑞、杜士恩、王國寶的談話，在植樹法上，我們總結出一些經驗。

靖邊土質和氣候，適宜於種植柳樹、楊樹、椿樹、沙柳、烏柳；其他樹木也能活，不過沒有上述這幾種樹木易活。現在將這幾種樹的種植、培養、保護等方法介紹於後：

(一) 選苗：(1) 柳樹、白楊、青楊等樹的栽子，皮要帶嫩綠色，沒有白黑斑點和裂縫，中間黑心，最好是頭次落椽的樹栽子。山地栽柳樹、楊樹宜選低栽子，長二尺左右，雞蛋粗。高摘子山地不容易活，濕地或清渠地高低栽子都能活，低摘子長短粗細已說過了，高栽子要五尺至六尺長，直徑可一寸半粗。(2) 沙柳、烏柳栽子有筆桿或拇指粗均可。(3) 榆樹 7 月或春季種均可，但榆莢子要熟胖，瘦了不得出來。(4) 水桐樹，低栽子和柳樹一樣栽，高栽子頂上要留三四根細梢枝才容易活。(5) 椿樹，3 月剛發芽時，連根挖一年至三年的嫩苗來栽，但芽不能太大了。(6) 上列五種樹苗的選擇，均要隨砍隨栽，保持水分，不能放的時間長了，否則不容易活。

(二) 選地：栽樹最好選有濕氣的地，山地也能栽，一般濕氣大的地栽高栽子也能活，山地濕氣小的要栽低栽子，靖邊草山梁一帶群眾所謂的「火焰山」，打井五六十丈不出水，但植樹英雄白雲瑞，近十年栽 2,000 多株大樹，都是栽的低栽子，都活了。他的經驗是：低栽子苗嫩水分大，地乾就不易發芽。土地要務的很熟，不長草，每年春季在樹間用犁耕過。夏季把草鋤了，樹就發旺；荒地、旱地，栽樹不容易活。

(三) 栽種時間：(1) 柳樹、楊樹、沙柳、烏柳，在立冬前後十天栽最好，至遲要在地未凍前栽，據有經驗者說：秋冬栽樹先生根，待第二年春天，都發芽了。特別是沙柳，保證栽一株活一株。秋季栽樹，樹在「收心」時間，易活；春季樹在發芽，芽大，栽遲了就不能活。根據這個經驗，今年靖邊地凍以前發動栽樹 18 萬株。(2) 榆、椿、槐、桃、杏等，春季均可

種植，但桃、杏樹核子因殼子硬，秋季種入地下，浸上一冬，春季發芽出苗更快。

(四) 打窖與下苗：五尺高的栽子，窖要挖二尺至三尺深，七八尺至一丈高的栽子，窖要挖四尺深，口二方尺。把栽子下入窖內一角，把土擁進，一層一層的用樁子打實，使風搖不動，如要搖動了，會把生出的根芽拔動，樹就不得活了。低栽子，在沙地和土鬆的地區，可把栽子削成馬蹄形，用木錘打進去；不要把上端打裂，外面露土一二寸高，再用土埋住，不要讓它被風吹乾，吹乾了，上端就不出芽了。沙柳、烏柳挖二尺深的方窖，在四面壓進條子，中間用樁子打實，好叫生根。

(五) 科撫方法：柳樹、楊樹、榆樹春季未發芽前種植最好，科的槎子一年可以長光，樹沒有疤痕，如果要樹葉喂牛羊，在秋分寒露前後十天，樹葉黃時也能科，但斧子要快，槎子要砍齊削光，槎子留二寸長，每個砍的一樣齊，但頭一次落椽的樹，槎子要留長一點，以便再好長椽。沙柳、烏柳，要秋季砍，要二年至三年才砍一次，槎子砍不能留得長了。老沙柳在地涼之後，用鋒利刀頭剃一次幹槎，地未凍時剃削容易震壞根子。桃、杏可在春季剛發芽時科枝，秋季科了容易死。一般的樹都不宜於夏季砍。

(六) 樹苗的保護：樹栽上以後，在栽子上，要捆刺針，或塗上豬血、煙墨、狗屎、大糞等髒東西，防止牲口咬啃樹皮。並要禁止人推搖。發芽出葉後，不要叫牲口吃葉子。各地植樹，最好劃地造成森林，易於保護。這裏的經驗，對於護林工作，各村都採用了「吃各夥」的辦法，誰家牲口把樹苗踢踏了，誰家就要受到「吃各夥」公約的處罰。這種辦法，在護林工作上起了相當作用，在開展植樹的地區裏，是可以試行和採用的。

三、提出全邊區每戶植樹100株的任務，是一個艱巨的長期建設工作。今天的頭等重要工作，一方面是發動群眾大量的植樹，一方面要政府嚴格規定護林辦法。許多地方亂伐的現象，仍然相當厲害，甚至把私人的樹木，也不得樹主同意就私自砍伐了。這種現象如不立即糾正，就不能提高群眾的植樹情緒。

其次，是種樹的土地問題。這裏因為沙地很多，許多地是不能種莊稼的。所以我們利用這些地去種樹。今年在公有的沙地上，群眾可以隨便造林。私有的沙地則採取「二八」分紅制，即十株樹，地主分八株。公家如

此統一規定，然後再大量發動沒地的群眾去栽。這種辦法，在地少的地方可以試行採用，同時這樣集體造林也易於保護樹林。因此今天邊區在開展廣泛的植樹運動中，必須把造林和護林兩件工作同時並重。

上面所說的關於選苗、選地、培植等方法，多半是我們的經驗，沒有經過農林科學上的研究，希望有研究的同志，能多提意見。

(原載《解放日報》1944年12月1日)

靖邊改良土地的三種新方法

三邊沿長城一帶，多為平原沙灘地，土壤中有機質很少，且多鹼性。故在農作上收穫量是很薄少的。兼之氣候乾燥，雨水不調，熱起來就很熱，冷起來就很冷。所以在舊社會裏，陝北三年鬧旱，迭遭歉歲，主要的也就是在這一帶的地區。

在舊社會封建軍閥的統治下，這種自然現象是無法改變的。但自土地革命後，這種現象就開始有了改變。1939年邊區發展了生產運動以來，在政府的領導下，大家更進一步和這類自然現象進行鬥爭。比如幾年來靖邊僅水漫地一項就修了186,420多畝。每年還在逐漸增修。

在去年邊區鄉幹部教練班時，我們發現了農民自發創造幾種新的改良農作方法，這種作法顯然前幾年就有，但是還沒有引起我們領導上的注意。現在我把這幾種改良農作方法介紹出來，作為類似這種地區農作改良上的參考。

第一種是興修草皮地，這種地是在有濕氣的廣大寸草灘上修的。在靖邊附近綏遠界這種灘地很多，其修作方法是：在一個平面的寸草灘上鑿約五步闊的一塊一塊的長方形毗連狀，在兩旁挖約四鐵銑闊四鐵銑深的排水壕，把水引入壕內，將挖出的土，密密的蓋在鑿定的長方形寸草地上，使寸草再不能滋長起來。挖出的泥巴蓋約三四寸厚，就可以下種了。兩旁挖下的水壕，約有一尺深的水，不能使其經常停在壕內，必須選擇四面低窪的地形，把水引流出去。這樣可以使修成地上的潮水流壕內。如果把水停在壕內，慢慢積多了，又會把壕浸塌，修出的地又不能耕種了。

根據調查，這種草皮地，在靖邊有三種土壤：一種是沙土和黃土，下種還好捉苗；第二種是黑紫土，土質很硬；第三種是白泥土。但是不管土壤如何，都是在潮濕的草灘地上修成的，所以都有鹼性。其去鹼辦法：在春季未下種前，把潮起的鹼質，用掃帚掃在一起，倒到別的地方，或者在臨種前從別的地方運一些沙土掃在上面，這樣可以分散和減少鹼力，莊稼也就肯長了。這種土地不怕天旱，而怕雨水太多，不怕連靈，而怕乍晴乍陰。如果刮大北風，就要起鹼，把地皮上吹起一層硬殼，莊稼苗也就容易被咬死的。

這種地，種上三年後，下面蓋住的寸草都漚成肥料了，土壤也鬆綿起來。種三四年不上糞是可以長好莊稼的。如沙土多時，適宜於種洋芋、蕎麥、黑豆。黑紫土，鹼性少，又吃年代，還宜於種穀子。白泥土則最宜於種黑豆和蕎麥。收種量很大，在雨季均勻，平常的年頭裏，每垧可以收穫2石5斗粗糧，至少也可收到5斗至1石。據長城區的一個農民說：在民國十七年陝北遭大旱災時，長城區大石砭的馬連坑的一塊草皮地，一垧收了4石多大麥，救了全家人的性命。

第二種是興修培沙地，這種地是在大平沙灘上培製的。在靖邊的張家畔灘和大小石砭灘都有。其培製方法是利用風的力量吹動游沙到耕地上積起來。第一種是在春季裏把柴草、木屑、牛糞等東西散在近沙的耕地上，可把風吹起的細砂礫擋積起來。第二種方法是附近沙漠土質硬的耕地，在春季裏用X間二三尺遠近深耕一次，使翻起的土塊和犁壕也把細沙擋積起來。第三種方法是頭年種麥子的耨割時留長一點，也可以擋住砂礫。根據我們的調查研究，在細砂礫中是夾雜著很多黃土和草屑的，是一種滋長莊稼的很好肥料。像這樣一垧培沙地，可以收穫到二石多的糧食，比非培沙地多收三分之二。在靖邊長坡區海子灘，有一家農戶，培了五多畝，每年收糧五六石，現已成了一種很好的肥沃土地了。在張家畔灘，這種培沙地是可以大量提倡培製的。

這類培沙地，即可耐旱，又可耐雨，且肯長莊稼。沒有培沙的沙灘耕地，雨水多了就浸死，雨水少了就曬死。但是培沙地是不怕的，所以在一般的年頭裏，它是能夠保持一定的產量的。這種培沙地，在過去是聽其自然發展，不加人力培製，在近一二年來，我們研究了它的作用，所以今後要大大的提倡。

第三種是興修河漕地。靖邊張家畔灘河流，有長達 67 里的一段河漕是沒有石頭的，河流兩旁都是黃砂土。每年河水沖刷很快，二三年之中，即將一塊好的耕地沖為泥灘，尤其遇有山洪暴發之際，數小時內，即可沖毀很多的河灘地。這種現象，在安塞、延安等川亦數見不鮮。在過去是聽其自然發展的，所謂「張家畔的河灘地，泥裏來，水裏去」。

這種現象對於農民土地破壞是很大的，所以在去年實地勘察了一些可修的河灣，首先即改修了鎮靖區三鄉瓦房村的一段彎曲河漕，共約費了 10 多個人工，就把一段很曲細的河流修直了，不僅減少了流水的破壞力，而且澄出 30 多畝好河灘地，農民非常高興。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河漕地的改修，應該首先注意適當解決餘出土地的地權問題。依農民過去的習慣，是水到哪裏，地界即移到哪裏，但我們對這種的舊習慣，要向群眾說明這是一種不合理的東西，現在我們應把它改變。所以在去年改修瓦房村河漕時，在地權的處理上，我們是照顧了兩方利益的。農民就沒有甚麼意見，並高興地說道：共產黨對我們有利的事情是都謀到了！

上述三種改良土地的方法，在過去只是少數個別農民的嘗試，沒有得到政府的提倡和鼓勵。自去年我們調查了這些辦法實行有效之後，今年我們計劃大量發動興修。據去年本縣生產展覽的統計：全縣去年共新修了草皮地、培沙地、河漕地 200 多畝，今年春季的區鄉幹部生產動員會議上，我們又計劃了各地的具體興修辦法，如果領導上能夠認識到這是邊區改良土地的一個辦法時，那麼，在幾年之內，它可能有很大的發展。

關於這三種辦法，尤其是培沙地和草皮地，純係農民自己的經驗和創造，是否有不合科學的地方，尤望能夠得到有識方面的批評。

（原載《解放日報》1945 年 4 月 13 日）

靖邊楊橋畔水利調查

一、歷史

楊橋畔位於靖橫交界處，南靠龍洲堡之老虎腦山，北臨鎮靖河流，東近青坪堡，西依張家畔灘，地形漫平，長城橫貫其間。城牆以南地口原屬靖漫龍洲堡48家之戶族公地，牆北原屬綏遠烏審X地，早於清末為漢民所購置。其行政管理，革命前X龍洲堡屬，革命後劃歸靖邊縣X城區管轄。今年為了便利水利興修起見，設水利鄉直屬縣府領導。

其地X為一南高北低的漫平沙灘，河水上游十里許有一紅石峽，便於修水壩，早於民國五年，即由該村居民盛振金、邊塔誠、石桂山等倡導興修，歷四年之久，於民國八年築成一個柴草土壩，水即引出灌地。因此，農民興修情緒大振，靖橫兩縣之富戶紛紛搶著參加。不料水壩築成，聚水成湫，將上流米家灣、九里灘、白家灣一帶之河灣地被水漫沒，或變成泥灘，或變為鹼灘，而不能耕種，上河人即起而反對，控訴官府，涉訟數年。據說當時官司曾打到縣政府、榆林道尹，案均懸而不決。以後打至陝西省政府，因為修壩諸人賄賂了靖邊土劣樊幼樵，靠著所謂「省參議員」的面子把官司打贏了，政府即「准予興修」，上河人才停止了干涉。但是上河受到土地損失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所以當時即形成上下河農民的互不滿意的現象。但是下河人佔了上風，即聯絡靖橫兩縣的11大戶成頭，議定為11大股，每1大股又分11小股，每小股地為州畝，計地3,666畝。每小股修成後，地主分12畝，參加興修戶分18畝。按股負擔修壩資費。但是

這時修成的水壩是一個柴草土壩，不很堅固，每遇山水暴發之際，即將壩堤沖毀。故於民國十五、六年又改修為瓦壩。這是興修的大概歷史。

這時候，楊橋畔水地雖然修開了，但是經常住戶不上十數家，雖有數十戶參加興修，但大部分是沒有住在楊橋畔，他們是屬富戶並佔土地性質。所以雖然可以灌溉大量水地，但沒有很多人來耕種。據調查，在民國十八年全楊橋畔灘，只澆200多畝水地。及土地革命後，將這些土地分給了無地農民，水地即發展到300多畝，但是由於內戰的關係，在幾年之間，水地並沒有很大發展，農民們顧不及興修水地了。

及國內和平，於1939年，邊區發動了大規模生產運動，楊橋畔的水利，在政府的提倡興修下，逐年又有了發展。趕1940年即灌溉到600多畝，1941年灌溉到1,700多畝。1942年邊府建設廳為了更大量的發展水利，即在靖邊縣政府設立了建設局，專事靖邊水利建設事業，以楊橋畔水利為中心，領導全縣水利的修築。這一年，水地有了很大的發展，灌水地達2,500多畝，新由他地移來居民50多戶，人口也得到了增加。自此以後，楊橋畔的水利，逐年向前發展，成為邊區水利事業的第一個首先成功者。

二、楊橋畔水利工程

築壩

現在有的瓦壩，是在一個紅砂石峽中間築起來的，高約三丈，闊約六丈左右，為一斜坡形。在沒有山水的時候，它完全可以將河水聚積起來，經常灌注地上。遇有山水時，可在壩東旁的石退水口子流出去。這個石退水是紅砂石底子，易於分解，近年來一方面為大水沖洗，一方面被風雨侵蝕，這個退水口子已日漸低落了。如再過數年不加修理，水就有向石退水壩流下的危險。所以現在這個退水口子的修築，成為目前的一個重要工程。據研究，修築這個退水的辦法有二：一個是間三四尺遠近栽一粗木樁，中間用厚約二寸的木板或椽插起來，修成一道木壩，上頭削成水平齊，不掛柴草，內墊一二丈遠的一層土壤子，使山水來了，從壩沿流出，山水過去之後，也不要補修了。據說這樣可以耐至十多年，又可節省修築

費。第二種修法，是築磚壩。用磚一頁一頁的鋪成雞毛翅形，和木壩有同樣作用，不過比木壩要耐久。估計需要二萬頁以上的磚，需資很大，目前依靠群眾是沒有力量修築這樣磚壩的。必須得到政府方面資助才行。

退水閘

在近壩的水濠上，要修一二個退水閘，其作用是一方面防止山水沖毀水濠，一方面可將濠內剩餘的水放出去。這個水閘上，水的沖擊力量很大，所以水閘很容易被沖壞，近年來已經重修過幾個了。現在的一個又不堅固了，很快就有坍口的危險。過去幾次修的退水閘，其出水口，離濠沿很近，水濠很快都被沖壞了。今年我們計劃，在距壩100多步的一個杏樹坪上，修一個退水閘。因為這個坪的地形和水濠是一個漫平狀，修成後使水閘流出水沒有跌頭，水就沒有多大沖擊力量了，水閘也就可以耐久。同時，在這個退水閘上，利用水的動力，可以附設許多工業作坊，如修水碾、水磨、彈毛等作坊。

水濠

水濠幹線全長約12里，闊丈餘，其中靠崖畔的計有5里多長，內有500多步是石濠，其餘都是土濠。在這些土濠上，有的離崖畔近，很不堅固，一旦坍壞一步，就有全部放不出水的危險。所以在1942年，由水利勞動英雄張仲成創造了在1,100多步的沙梁上，利用水力新開了一道大濠。三年來，已完成二段，計540多步長。這一大濠的開濬，主要的是利用水的力量沖開的，前後平均深約5丈，闊約10丈，共費人工13,228個工。如果用人力開鑿，據勞動英雄張仲成的計算，以4個人工修1方土計，約需人工96萬個，但是用水力的沖沙方法，節省了820,772個人工。現在這一道新濠儼然成為一道沙山中的河流了。這是楊橋畔水利工程的一個創造，值得推廣。下餘未成的第三段，因為幾年的工程較大，為了休養群眾的力量，如果沒有政府資助，在今年我們就不準備新修了。這裏須要說明：在修新大濠的工程上，因為我們沒有工程師的指導，和精確的測量儀器，以及領導上的某些地方是還不夠一致，所以在兩年的修濠工程中，浪費了一千五六百個工。在今後修築第三段新濠時，必須記取這種教訓。

其次是南端一段約7里長的大濠，居於澆地南的山麓下。這一段水濠是堅固的一段，不會坍塌的。但是在每年的春季裏，被風沙吹的沙土堆有1尺多的一層沙，使水不能放出，所以每年春季必須費工將土挖出才能放水。如果今後冬天也在濠內放水，X風沙不能堆積起來，就可以節省許多人工了。

這一12里長的水濠，是整個水濠的一條幹線，在澆地的南端。又須開許多支濠，由這許多支濠再分灌在園地上。過去時，在幹線的支濠上沒有根據濠水容量，和可灌地的面積劃定一定數量的支濠，群眾隨便開口放水。所以小水口太多影響大濠的鞏固，據這次調查，在長城牆北就有22道支濠水口，長城牆南就有15道支濠水口，沒有一定距離，任人放水，所以上水地，放的水多，下水地放的水少，尋水又耽誤時間，影響下水農民修地情緒。因此，我們想把整理支濠的水口子，作為今年的一個工程，確定在牆北減少6道支濠，牆南減少3道支濠，由37道減為28道。在每道支濠的水口上，要做一個水門，用木板疊插起來，再不准隨便在大濠旁開口，並規定每道支濠所灌的園地，上下水循環輪流放水。這樣，上下水都能應時澆地，莊稼也受不了旱，放水也不誤工了。

上述水壩、退水、水濠三部工程，是楊橋畔水利工程的整套機構。是三者不可缺一的。

三、水地的修法和灌溉情形

楊橋畔水地的土質是白泥底，但上面蓋著一層沙漠。在整個楊橋畔的土地上，有著很多起伏的沙坵，修平這些沙坵的辦法，同樣是利用水沖拉沙的辦法。在沙坵腳下挖一道水濠，把水引在近沙坵旁邊，使水急流起來，就可以把沙像蠶食似的拉到低窪的沙窩裏。這樣一個一個的把沙坵填在沙窩，地面就漸漸平起來了。如果用人工，那是沒有力量可以攤平的。這種方法，楊橋畔的每一個農民，都有著豐富的經驗，成為他們修地的拿手戲了。如水利英雄張仲成說：「人把水拿住了，水的力量是很大的。」這是他們的經驗談。

目前全楊橋畔灌水土地的面積，據不大精確的丈量，約有4,000畝左右已經能種的水地了。計有楊橋畔、羊路濠、大段坑、柳朴坑、白土灘、

王家口子、伏龍灘、海子濠、橫山坑等九大段，共約4,000多畝。其他能到水未修成的尚有下海子濠、水腦沙、硬土灘、橫山坑、惠橋沙等約有1萬多畝，如果居民增多，勞動力充足，全部修完，可達15,000畝至2萬畝。這些地，是不要費很大力氣就能修成的。據往年修海子濠的費工計算，共修出約700畝地（6尺的弓丈量為680畝），只費了人工5,590個，每畝地不到8個人工。所以，如果在土地缺乏勞力剩餘的地方，全部修成，也不是難事。

至於水的灌地量，根據現在的情形，全部河水，只用了三分之一，一天就已灌到1,000畝的水地了，根據往年灌溉計算，3天可以把全部種植水地灌完。同時現在灌地，是非常浪費水的，一種是放野水，把水引在一塊荒沙地上，人就走了，任其自流。一種是水畦太大，滲水太多。如果不浪費水，再多引河水，灌水再能細緻點分配，每天不分晝夜的灌地，那末，一禮拜輪放一次，可以灌到15,000至2萬畝。

這裏正要說到的第二個問題，必須很快修平水地中的內沙問題。據這次調查，現在修好的9段水地中，還有8塊內沙存在著，大的約佔地200多畝，小的20多畝，共計佔地近800多畝。這些內沙，好似身體上的一塊壞瘡，春季一颳風，便吹得沙土飛揚，到處是沙，好地也要堆上沙堆，又把禾苗都打壞了。時間長了，慢慢的又使沙堆擴大起來。所以今年我們計劃，把這些內沙堆，分春夏兩季把它用沙水打平。但在打平這些內沙的時候，還有許多問題要求適當的解決。比如內沙四周都是修成的好地，如果把沙拉在這些好地上，就不免發生糾紛。因此，在打沙前，必須找出水口子，聚沙地方，不讓把好地推壞。或者是修成梯形的筐地，把沙石推出，就地用水漫平，然後再把濁水灌上，澆五寸厚一層的瓦瓦泥就可以種植了。沙也壓在下面，有風也不會刮起飛沙來。

四、楊橋畔水利的農作情形

楊橋畔的可耕地拿現在的居民來說，是有剩餘土地的。全楊橋畔灘一共有老戶和新戶居民96戶，人口僅360多人。其居住村落，又是極其分散的。前後佔有15個小村子。由於這個地多人少的特點，所以就造成了農作法的不易改進的困難。按一般的種水地的作務來說，它比非水地是費

工的。如要把地務好，一個勞動力最多也不過種十畝地。但是現在楊橋畔的情況是一個勞動力有種十幾畝的。所以種的就非常粗糙，他們求量不求質，只圖多，不求精。這種農作法的習慣，是提高產量的一種障礙。

同時，在楊橋畔農作上又一個缺點，就是忽視積肥工作。現在那裏的居民，對於積肥工作非常不重視。90多戶居民中只有3戶按茅坑。今後對於這個工作，必須用最大的耐心去說服。研究這個習慣產生的原因，基本的還是因為地廣人少，多種多收，不求細作。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水裏邊含有泥土和肥料，灌一次水能澆一次泥，就肯長莊稼，所以老百姓有的說：水裏就有肥料，那裏還要上糞。他們不想，水裏有肥，再加上糞，那末，莊稼的產量就不會更增加嗎？

根據這次的調查，現在楊橋畔的水地，大部分種的是麥子、黑豆、黃蘿蔔、洋芋等。這些莊稼都是混合在一塊種植的。比如春季種麥子，隨時又把蘿蔔也帶進去，待麥子出苗不久，又把黑豆也插進去。這樣，在同一塊地上就種了三種莊稼，施肥又不多，地又不能稍息，所以產量就不能有很大的增加。以現在的條件論，這樣的種法，一畝麥子年頭好了還可以收到1石，黑豆可以收到5斗，蘿蔔可以收到3,000斤。比起一般土地，其產量是相當可觀了。但如果在農作上能再加改進，其收穫量還會提高，尤其是在天旱的年頭，楊橋畔的水利，就顯出了它的有利了。

根據楊橋畔的土質情形，在種植物上，拿已往試種的經驗，種糖蘿蔔是最適宜的。因為土鬆地濕易於苗根，一個能長一尺多長、六七寸粗。一畝地保證可以產到3,000斤以上。今年我們又試種了10畝糖蘿蔔，估計可以產到3萬斤。如果製糖方法能夠成功，以後即大量的推廣種植，發展製糖業。那末，楊橋畔的水利興修，就會有更大的發展了。

五、目前需要進行的工作

第一，要進行土地丈量和評定土地等級工作。現在楊橋畔農戶的水地，共登記數量大部分少於實有土地數量。據現在登記冊的統計，共有水地1,090多畝，但實際耕種土地面積，總在2,000畝以上。至於土地質量評定也是不公平的，有的把上地定為中地，有的把中地定為下地。這樣在農民的修地負擔工上，就發生了不公平的現象，就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和擴大水地的信心。在今年我們調查的時候，許多農民提出這個問題，因此，我們計劃在今年試行農累稅的時候，首先就在楊橋畔開始，把土地的數量和質量作一澈底的公平的登記和評議，使大家都不吃虧。這樣可以提高他們多修水地和擴大生產的積極性。

第二，要進行大量的安置移難民和增加人口工作。目前修成了大批的水地，但是因為沒有勞動力，致水地荒著而沒有人來耕種。過去政府也曾進行了安置移民的工作，但總沒有大批的人口移來。追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初來的頭一年沒有吃糧而不好扎落，這樣就影響了許多欲來者而不能來，尤其是因為這樣的居民又大部分是外來戶，沒有基礎，所以今後在安置移難民工作上，政府應該給予一定數量的糧食幫助，同時，還應在當地區鄉發動廣大群眾的調劑工作，幫助初來移民建立家務。

第三，要改良農作法，以增加土地產量。現在這裏不能招來大批移民的原因：一方面因為幾年來興修工程費了很大民力，影響未來的移民怕出工；另一方面是在現有的土地農作的基礎上，即使沒有旱災的天年，農產物的獲利也還不很大，他們感覺水地和旱地一樣，反而要負擔修築的工程，所以不如移到別處好。因此今後必須加緊改良農作法，提高糧食產量，使農民感到比別處種地有利，那就自然會有許多農民移來的。

同時，在目前楊橋畔農作法上說，也是非常粗陋的，有的上糞，有的不上糞，有的鋤一兩次，有的一次也不鋤。有時草長的比莊稼還大。這樣產量自然不會增加，所以在整個楊橋畔的生產工作領導上，應當把改良農作法成為主要的工作之一。

第四，要發動大量的植樹造林工作。現在楊橋畔有許多不能耕種的土地，可以栽種樹木。這幾年來，政府雖然提倡廣植樹木，同時也栽了許多，但是還很不夠，如果能在水地的四周沙梁都栽了樹木，那末，一則可以抵禦風沙侵入，二則還可調節氣候雨量。因為四周都是沙山，在每年的五六月間，往往天降雹災，差不多三年兩頭就有一次。所以群眾非常害怕。對於這種自然界的災害，今後應想出積極防禦的辦法。

(原載《解放日報》1945年6月11日)

二、軍隊政治與文化工作

政指傅秀芳同志的領導方法和作風

如何領導連隊工作，是部隊工作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乘冬季練兵期間，到連隊裏作了一次調查。「反攻」部傅秀芳連，43年從前方初回邊區時，對生產存在某些不正確的認識，生產情緒是低落的。但是，政指傅秀芳同志很快的轉變了自己的思想和領導作風，領導全連蓬勃的展開生產、練兵運動，獲得了顯著的成績。現在，正值開展今年大生產運動之際，我們將這個調查材料介紹出來，以供大家參考。

從中秋節想起

傅秀芳同志1938年在前方參加部隊，39年即擔任連政指。在前方他的領導方式上，還存在著「兵不打不齊，將不打不勇」的軍閥主義的殘餘思想。回邊區後，在整風運動中，學習了譚政同志的政治報告後，把自己的思想毛病、領導方法，都做了很深刻的反省，並號召每個戰士對他提出批評。結果全連有68個人對他提出了意見，使他大吃一驚。經常自問自的想道：「為甚麼對我有這樣多的意見呢？」他回憶起，一個8月中秋節的日子。團部給每個戰士發了三個月餅，但因管理不慎，被人偷吃了幾個，每個人不到三個了。司務長向他請示意見，他很簡單的答覆了一句話：「不夠三個，就發上二個。」結果戰士們紛紛不滿的討論起來了。傅秀芳同志想，自己沒有貪污，戰士們為甚麼不滿呢！啊，不能怪戰士，要怪自己沒

向戰士們解釋清楚。傅秀芳同志想來想去，想通了一個問題：工作方式簡單化，是不行的，必須改變自己的領導作風。

因此，在「尊愛」運動中，他就又把對他的意見最多的戰士請在一起，進行座談，自己反省過去的毛病。這次座談會以後，對戰士的思想也起了很大的影響，都討論著：「指導員轉變了，和前方大不同了，我們為甚麼不能轉變呢？」最調皮的戰士薛文香受了感動，在軍人大會上宣誓轉變。這些足可看出自上而下的進行自我批評，改變作風的益處之大了。

掌握三種會議

邊區部隊自學習譚政同志的〈政治工作報告〉以後，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的許多毛病，得到了糾正；而群眾路線、民主作風，得到了發揚。但目前在某些部隊中，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的毛病還沒有完全肅清。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在一個連隊中正式規定的會議制度，有十種以上（支委會、支部大會、小組會、連工會、排務會、班務會、經委會、俱樂部會、軍人大會、政工聯席會等）。每種會議，至少一個月開三次，再加上一些臨時性的會議和彙報，幹部每天的功夫，大部分是花在開會上，想問題的時間很少了。

傅秀芳同志克服了這種毛病，他在每個較大的運動中，掌握了三種會議。比如在生產、練兵等大運動中，首先在戰士中進行一般的動員號召，要他們進行醞釀，了解他們的情緒和信心，確認他們的意見。其次再把群眾的意見和反應收集起來，召開支委（小核心分子）會議，提出在運動中進行的步驟。然後，他就召開積極分子（大核心）會議，討論支委會上提出的問題，搞通積極分子的思想，提出運動中奮鬥的目標。討論和通過了這些問題以後，再到群眾中進行醞釀。經過這些積極分子的宣傳來啟發群眾的情緒。如發現個別落後分子信心不高時，他就尋求和他們個別談話，給予解釋和動員。對於各種英雄和積極分子，他也召集談話，更高的鼓勵他們的情緒，以響應領導上的號召。同時，在各排各班中進行討論，訂出個人的計劃。這些個人計劃，由班而排，由排而班的總和起來，就成為全連的計劃。最後，召集軍人大會宣布個人和連排計劃，決定工作步驟。並把好的典型和例子，加以表揚鼓勵，信心不高的加以動員解釋。總要使全

連的每一個戰士的情緒，都能提高起來。在兩年的生產運動中，他的動員方式，都是經過了小核心、大核心、擴大群眾的三個階段和三種會議的，因此，工作成績，在每次運動中都是很好的。

靈活的組織各種運動

在每一個運動中，傅秀芳同志都能提高群眾的情緒，靈活的去組織群眾。比如去年生產，他發現了過去以連為單位進行生產的組織形式，對啟發群眾的積極性和培養幹部的工作能力上，都有妨礙。他即改變了以連為單位進行生產的組織形式而為靈活的組織形式了。在上山，有時他以班為單位進行開荒，有時他又以個人為單位進行開荒，並且發動個人與個人，班與班之間互助。再比如在練兵中，他把戰時按照各種類型、各種能手，分別的組織起來，使其各顯所長，組織小組利用升降級的辦法鼓勵大家的競爭心理。如投彈時，投遠的分為一組，投不遠的再分為一組，叫投不遠的向投遠的學方法，投遠的給投不遠的教要領。把進了步的提升起來，落後的就努力也要趕上。這種靈活的組織辦法，不僅沒有一個群眾永遠落在運動的後邊，而且使落後的都趕上了先進的。同時，還可以培養幹部的工作能力，如一個排長說：「過去我們的工作，上有連長，下有班長，中間吊個排長，就沒有啥事幹！」

具體教育戰士

傅秀芳同志對戰士的領導和教育，很注意研究他們的特點和個性。據研究：第一，勞動英雄和積極分子一般是能夠帶頭，在工作中能打第一炮。應抓緊鼓勵和教育以保持他們情緒的經常性。第二、一般分子有時跟上落後的跑，有時跟上積極的跑。爭取他們到積極方面來是重要的工作。第三、調皮分子、笨的戰士、落後分子，這三種人，各有所異，互不相同。調皮分子一般的是個性強，比較聰明，愛戴高帽子，大錯不犯，小錯不斷；笨戰士裏，有的是真正笨的，有的是思想不對頭裝笨；落後分子雖然情緒比較消極，但也是大部分可教育的。傅秀芳同志對於調皮分子多從側面予以刺激，提高其自尊心，少用正面指責。對於真正的笨的戰士，一

般是好好幫助。裝笨的，要找出他裝的原因，不要一味的批評指責，使他更加消沉。教育落後分子，多表揚，少批評，他們就不會「死豬不怕開水燙」了。

從舊軍隊過來的戰士，因為受過舊軍隊的思想教育，一般的是服從性大，重情感愛面子，勞動觀念差。傅秀芳同志通過已經改造了的同樣成分的人去教育他們，因為他們都是親身經歷過軍閥軍隊生活的，由他們口中說出的話，作用就會更大。該連的崔文德，是在戰鬥中過來的，經過他教育好了許多人。團結他們首先要由感情上著手，然後再從思想上和政治上教育，不然很容易和老戰士造成對立的現象。指正他們的毛病，多採取個別談話的方式，少用會議點名批評。最好是幹部主動的到連隊去找他談，不要一下就請到連部來，因為他們過去在軍閥隊伍的習慣上請到連部去就沒好事情。在開會時，多要他們發言講話。

傅秀芳同志對從舊軍隊來的戰士的缺點，看作是舊軍隊的罪惡，不歸究於他們個人；所以從各方面予以照顧，精細地進行教育，使他們大都積極工作起來了。

掌握群眾情緒

傅秀芳同志對於每個大的工作運動，都非常注意掌握群眾情緒。在去年動員生產的時候，一部分戰士生產情緒非常低落，甚至個別的人員灰心喪氣，因之影響全連戰士的生產情緒。他發現了這個問題，立即把情緒不高、害怕生產的王天成等找來談話。傅秀芳了解了情緒不高是因為身體有病，支持不住之後，即在戰士中提出了互相幫助的口號，並把王天成分配到種菜隊裏去種菜。於是王天成的情緒恢復了，其他人情緒也都提高起來了。但是運動熱潮普遍的高潮起來後，不免要產生一些過火的現象，比如在生產練兵中，個別戰士不愛惜身體拚命幹。傅秀芳閒時找他們個別談話，說服抉擇，而不是「潑冷水」的命令制止，避免危害他們的情緒。

為了保持運動中群眾情緒的經常性，他又組織大家互相鼓勵，在生產中勞力強的幫助勞力弱的，練兵中技術高的幫助技術低的。使強的不脫離群眾，弱的不失掉信心。比如在開荒時，每天使兩個較強的夾帶一個體弱的幫助開。每天各班規定的生產任務，這一班先完成，就幫助那一班。在

去年的生產中，由三連發起的互助運動，而推動了各營各團的互助。如此不但提高了群眾的生產情緒，而且把各班之間、營連之間的隔膜也打破了，並增進了彼此的團結。

按期檢查總結

三連不論是生產、練兵，都是一週一次小總結，一個階段一次大總結。總結檢查首先是個人進行自我檢查，至於個人與排班成績與缺點的指出，先由群眾自己公布，不是領導上先提出來的。如此，由下而上的檢討以後，再集中起來加以研究總結，最後才拿到軍人大會上講評優劣。他講話又具體，又有事實，連成績缺點的根源都說的清清楚楚，絕不是說一套抽象話。這種按期的檢查，第一，審查了原來工作計劃的缺失與不正確。第二，培養了排班幹部的能力，現在三連的排級幹部，都在傅秀芳領導下，學會了總結檢查工作的方法。傅秀芳同志對戰士生活非常關心，經常注意改善伙食。該連去年伙食方面的營業獲利500多萬元，給每個戰士多發了一雙襪子。按一般的規定每人每月吃肉三斤，他們連實際上每人每月吃到四斤。今年新舊年節裏，很早就派人到鄉村去買菜，使戰士每人吃到四斤至五斤肉。在做飯的時候，他總親自下廚房煮飯切菜，訂飯譜。每次經濟伙食委員會開會，他必定參加，開動他們想辦法。也親自給病號做飯，每天還要跑到病房去安慰。在去年生產的時候，戰士楊德元病了，他因為住地距連部遠，不能每天去安慰他，就寫信，捎帶派人送去。這樣關心病員，對牢固部隊加強團結，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光輝的成績

三連在傅秀芳同志的領導下，由於全連同志們的努力，在剛開始生產的頭一年，開荒2,500畝，收糧366石，超過計劃80.8石。收穫菜蔬6萬斤，油籽11石。在手工業生產方面，燒木炭35萬斤，採X苗5萬斤（除開支外，共售洋987萬元，可買到糧食450多石）。成績佔了全營的第一名。去年雖然遭了大旱、移防等困難，但他們還收得糜穀135石，麻子9石5

斗，稻子20石，洋芋2萬斤，煙葉500多斤。副業生產，獲利7,575,000多元。因此，該連的家務建立起來了，保障了全連的生活改善。

在練兵方面：44年冬訓雖只40多天的時間，但其成績是很大的。如射擊，全連平均中靶19環多，為全營射擊最高紀錄。第一、三班中靶每人平均27.4，是全團的第一。同時，在練兵和生產過程中，提高了幹部的工作能力，團結教育了戰士，現在，全連可說沒有一個落後分子，成了一個生氣勃勃的連隊。

(原載《解放日報》1946年5月11日)

開展邊區部隊的聯手運動

聯手運動，是邊區部隊在領導方法上的一個創造，它是互相友愛團結的一種新形式。發現於44年的冬訓期間的「六盤」部中。45年夏季保衛邊區的自衛戰鬥中，它又重新由國民黨軍參加我軍的戰士王治榮發展為戰爭中的戰鬥聯手。X在3月來的自衛戰中，「戰鬥聯手運動」對於這次戰鬥的勝利，起了很大的作用。自此以後，這種戰鬥聯手的工作形式，上級領導上有意識的重視起來了，但是由於我們沒有明確的指出能在邊區部隊中廣泛的開展，所以在全邊區的所有部隊中還沒有普遍的把它開展起來。

為了說明開展聯手工作方式對於部隊工作的作用究竟如何？這裏不妨舉出幾個關於聯手的例子來說明一下。

「六盤」部在1945年6月間三邊陣地的自衛戰鬥時，新解放戰士王治榮和他本班的趙吉總結了戰鬥聯手。在戰鬥前他們規定的共同戰鬥公約是：「走在一起，打在一起，勝利在一起，一個負傷，另一個一定將其抬下火線來！」因為戰鬥時兩人互相鼓勵，互相保護，一個觀察敵情，一個對付敵人。王治榮在前面衝，趙吉就在後面緊跟，兩個人還在一起把敵人追擊了三里。衝垮了敵人的進攻，取得了戰鬥的勝利。

「七團」王保書連的宋少雲等五個戰士都跳不過木馬，於是和王保書結成了聯手，互相幫助。王保書就把木馬墊的綿綿的，再把地上的土挖成虛虛的，跳時又給大家保險。五天後五人內三個人跳過去了，王保書就X合XX抽了自己的股金8,000元買棗X給大家賀喜，結果鼓動了他們的情緒。在冬訓總結時，五個人全都通過了木馬（「友愛」部報告）。

再舉一個通訊聯手的例子：「六盤」部五連的戰士，易金忠、穆富幹、李忠儒等幾個結成了通訊聯手，於是大家都互相督促寫稿，互相幫助收集材料，然後集體研究寫法，由一個人執筆起草，最後念給大家聽。所以每天稿件大部都能在旅報和《部隊生活》登出。很快的就影響了全連的通訊工作，三個月內全連80%以上的戰士都寫了稿子。共寫了1,365篇，爭取當全X的模範通訊連（「友愛」部報告）。

上面舉的戰鬥、學習、通訊等方面的幾個例子，已足以證明聯手運動的作用。其他尚有所謂「工作聯手」、「改造思想聯手」、「科目聯手」等等，都曾起了若干的作用。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些甚麼東西呢？

第一、聯手運動的工作方式，首先促進了部隊內部的團結，融洽了戰士彼此的感情，它在戰鬥、工作、學習中，都聯成了一手，所以不要領導上的督促，自然強的就幫助弱的，經驗多的幫助經驗少的，膽量大的就幫助膽量小的。彼此幫助，互相照顧。這正如聯手們的公約所說的一樣：「走在一起，打在一起，勝利在一起。」團結XXXXX！

第二、結成了聯手，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他們新老之間、強弱之間的聯手互助，在戰場上衝鋒陷陣時，沒有勇敢突擊孤軍無援和怯弱畏縮逃避不前的現象，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三五人的戰鬥群，完全適合於戰術要求上的X的戰鬥動作，能在上級的意圖下，獨立自主的進行戰鬥。

第三、結成聯手加速了部隊政治、軍事的提高。在聯手的互助下，有文化的教文化，有技術的教技術，懂要領的教要領，射擊中的教射擊，會觀察的教觀察。這樣取長補短，各顯所能，大量的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成為一個XXXX的好領導方法。

第四、領導上面可以在聯手中出現許多有能力的幹部，聯手運動成為培養幹部的一個很好的橋樑。10月間北線自衛戰鬥中，「黃龍」部戰鬥聯手組長，一般的在其班長傷亡後都成了班長的代理人，一個連在一次戰鬥後，被提拔的五個副班長，都是戰鬥聯手組組長。

但在展開聯手運動中，還有兩個值得提出來的問題：第一，聯手的組成，必須建構於彼此自願和情投意合的基礎上，發揚戰士之間的高度友愛，不得把組成聯手變成形式主義，更不能強制組織。

第二，聯手的組織，應該是一種不定型的群眾性的互助形式，不能造成一種行政系統。聯手組長應在聯手中XX群眾，在XXXXXXX，聯手組織

和領導不能在組織上有敵對性，在工作上不能搞獨立性。但班排對於聯手組的領導，必須要充分的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領導他們在上級的意圖下，英勇、堅決、獨立作戰的能力。但亦不能放棄不管，把事情推到聯手組身上。應該加強領導，利用聯手形式，開展部隊工作，把聯手變為推動工作的有力助手。

因為我們認為全邊區的部隊，在自衛戰爭中，應廣泛的開展聯手運動，並注意吸收以往的經驗，宣傳其典型範例，糾正其發生的缺點，使全邊區的部隊結成一個大聯手，堅決的消滅敢於向邊區進攻的一切蔣胡軍！

(12.15)

(原載《解放日報》1946年12月23日)

一年來宣傳工作基本總結與今後的 意見：1949年4月26日在野政 宣傳會議上的發言

甲、一年來宣傳工作的估計

根據了過去各部的報告和我們的了解，我們認為一年來的宣傳工作有著比較顯著的進步。如在戰士政治教育上，普遍的採用了訴苦的方法，提高了階級覺悟，增強了戰鬥力。在幹部思想教育上，根據不同時期的思想狀況，糾正了所產生的思想毛病。一般利用戰鬥間隙，召開了教導員、指導員訓練班，總結研究了工作經驗，改進了領導方法。在黨內教育上，開辦了黨員輪訓班，糾正了黨員的一些糊塗思想，同時講解了黨的基本知識。在文化工作上，出版了軍、師、團的各級報紙，和連級黑板報，推動了工作和交流了經驗。建立了自上而下的新聞通訊組織，適時的對外進行了宣傳報導。組織擴大了劇團、宣傳隊，開展了部隊的戲劇活動。發動了連隊的槍桿詩創作，推動了戰士的文化學習。在新區宣傳上，採用了標語、傳單、戲劇、照片、口頭講演等形式，解釋了黨的各項政策，宣揚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形勢，揭破了敵人的造謠欺騙，安定了某些群眾的恐慌情緒。尤以全軍一般的都遵守了群眾紀律，擴大了我軍的政治影響。這一切，在一年來的宣傳工作上，不可否認的是取得了比較顯著進步。

乙、幾個群眾性的宣傳工作問題

自實行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後，部隊的各項工作，都表現了群眾性的活動，在宣傳工作方面，則主要表現在以下的幾個問題上：

(一) 群眾性的訴苦教育。這一訴苦的教育形式，起始於1946年的晉北綏包戰役後，迄今則全軍普遍的推行了。這種以訴苦來提高部隊階級覺悟的教育方法，經驗證明，是一種有效方法。但是某些單位，尚有著若干的模糊看法。如：有的認為苦訴一次就完了，再訴就是不好訴了，有的認為解放後的戰士沒有苦訴，訴不好還會訴到自己頭上。因而對於訴苦教育，不能夠更加的深入和進一步的提高。我們認為：以訴苦提高覺悟的教育方法，在目前的部隊情況下，是一種切合實際的較好方法，這是因為：它可以很快的啟發大批補入部隊的新戰士，特別是新解放戰士的階級覺悟，使之很快的參與解放戰爭。並以訴出來的事實，激發戰士的殺敵勇氣。因此，在過去的一年來，補入我軍數萬的新解放戰士，變成了人民解放軍的好戰士。反之，不用這種訴苦的教育方法，而用抽象的讀本講授，一定不能很快的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不能很快的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不是抽象的記了幾個階級名詞，就是「一滿解不下」。因此，今後對於訴苦教育方法的採用，不僅需要繼續堅持，而且還要更加深入和更加提高。

把訴苦教育的深入和提高，也就是說，要把戰士的階級教育深入和提高。比如，在訴苦中提出：「為父母報仇」、「為打倒保甲制度」、「為消滅蔣胡匪軍」的口號，在今天全國革命勝利的形勢下，顯然的僅僅這些是不夠了。而應該提高對保護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思想，為無產階級徹底解放而奮鬥的思想。但是這種提高，必須是通過戰士的思想，有步驟、有分別的逐步提高，而不是脫離實際的提出過高的口號，使戰士不能接受，因而患了急性病，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

(二) 群眾性的評比教育。自去年夏季的「三評」整黨以來，全軍普遍的實行評比的教育方法，比如評功過、評計劃、評指揮、評技術、評政策、評領導。比思想、比根子、比作風、比進步等。而這些評比的方法，都是以群眾的意見來進行的。對於評比和被評比的教育作用，都是很大的。比如在評查功過時，提出立功者，經群眾評比後立功，提出記過者，經群眾評比後記了過，被推薦為幹部對象者，經群眾評比後提交組織批准

而提拔為幹部。凡此評比方法的採用，不僅教育了立功、記過，或是提拔為幹部者，同時也教育了廣大的群眾，今後應該繼續的推廣起來。但是我們認為在評比的過程中，一方面要防止放棄領導，交給群眾亂評亂比的現象，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和不採納群眾意見，形成了不評不比的現象。這兩個方面的傾向，必須予以糾正，否則，雖然經過了評比，同樣也會得不到成效的。一年來的評比教育，一般的都注意對這些偏向的糾正，所以在歷次的評比教育中，不論在立功記過上、評查思想上、提拔的初下級幹部和經群眾評比而吸收入黨者上，都是有成績的。

(三) 群眾性的戰場鼓動工作。一年來，因為經過了群眾性的訴苦教育，而提高了戰士的階級覺悟，提高了群眾性評比教育，而發揚了幹部的積極性和責任心。因而戰場上的宣傳工作，也表現了群眾性的鼓動。「人人用口，個個鼓動」，不打啞巴仗，成為每次戰鬥每一戰場上自然現象。那麼，這種群眾性的戰場教育，怎樣才能發動起來呢？我們認為：第一，要有高度的殺敵士氣作保證。凡是有深入的階級教育和有高度的殺敵士氣的部隊，那麼他們在戰場上的每一個角落裏的每一個成員，都表現了對戰爭的獻身精神。在這個基礎上，組織戰場鼓動工作，就比較容易了。第二，必須有著深入的戰鬥動員工作。凡是在戰鬥前進行了深入的動員，激勵了士氣，認清了敵、友、我情，訂立了戰鬥計劃，下定了報仇決心，組織了戰鬥互助，克服了各種顧慮，那麼，戰場上的鼓動工作，也就容易進展了。比如戰前訂下立功計劃者，在戰鬥中尚未完成時，別人就鼓動他完成計劃。宣誓殺敵報仇者，在戰鬥中表現畏縮時，別人就鼓動他殺敵報仇。訂了戰鬥互助者，別人就鼓動他幫助別人。第三，必須有具體的戰場組織的指導工作。凡是在戰鬥中領導幹部和政工人員，都要及時的了解與掌握情況，適時的傳達戰鬥中的消息，提出戰場鼓動口號，宣傳戰鬥中的各種英勇事例，保持戰士高度的殺敵勇氣，但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上，還要注意某些過火行動的發生。

由此可見，高度的殺敵士氣，深入的戰前動員，具體的戰場組織指導，是開展戰場群眾性鼓動工作的重要條件，除此，群眾性的戰場鼓動工作，是不能開展起來的，即使一時發動起來了，也是不能牢固的。

(四) 群眾性的文藝活動。一年來，部隊的文化藝術活動，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如各軍組織了劇團、宣傳隊，開展著部隊的戲劇活動，各連隊都

建立了壁報、黑板報，推動著戰士的文化學習。特別是發動寫作槍桿詩，大大的推動了戰士的文化活動，其內容由歌頌武器，歌頌勝利，而發展到批評與自我批評，識字的自作自寫，不識字的別人代寫，貼在自己的武器上，不僅把字念會，幫助了識字學習，而且推動了思想、工作的進步。還有的用畫畫的形式，表現批評本連本班的模範事例和落後分子，因而也推動了他們的進步。凡此種種，都是部隊的現實生活和真人真事，故為一般戰士所「喜聞樂見」，易於接受。這說明了群眾性的文藝活動在我們的部隊內是能夠開展起來的。也說明我們的軍隊，不僅是有武藝的軍隊，而且也是有文藝的軍隊，目前這一群眾性的文藝活動，我們認為：一方面要在現有的基礎上更加發展一步，不使其停頓起來或自流下去，一方面要防止某些地方的形式主義或不實際的現象。這兩方面的工作，是今後部隊群眾性文藝活動向前發展的中心工作。

丙、宣教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檢討

一年來在宣傳工作上，我們對於某些問題，或則表現了模糊不明確；或則發生了錯誤與缺失，現就以下幾個問題作一概括的檢討。

第一，關於功過問題。自解放戰爭開始以來，部隊中即開展了立功運動。新式整軍後，這個運動更廣泛地開展了起來，目前已成為政治工作中一個不可缺少的課題。尤其在每次戰鬥後，總是有著立功和記過的問題。記功、記過、賀功、評過，成為戰後的重要工作了。但是對於立功記過的意義，個別地方在思想認識上，還不夠十分明朗，故產生了「功過相抵」、「功過平列」等現象。我們認為對於功過問題的看法和處理，提出了以下的意見：

(一) 首先確立，立功記過都是為了教育進步，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要認識其目的的一致性。立功是為了更加進步，不是給他增加「包袱」。記過也是為了督促進步，不是給他一個打擊。(二) 有功立功，不求全面。在頻繁的戰爭中，為了提高每一個戰士和幹部的殺敵勇氣和工作積極性，因此，不論戰士和幹部，只要在一次戰鬥或一項工作中，有著優異的表現，經過群眾評比後，就可以給他立功的，不要強求其全面性。四軍的劉炳考，在平時的工作中是一個比較差勁的戰士。但在每次戰爭中，則表現了

非常勇敢的精神，可是，在評功時，因為平時差勁，多次的沒有評上，以後他就賭氣的說：「我劉炳考捉住胡宗南也立不了功。」因而影響了他的戰鬥情緒。以後給他立了功，他的毛病逐漸地改正了，目前已成為該軍比較傑出的戰鬥英雄了。（三）過不抵功，功可消過。即過去有了過失，現在立了功績，立功時應該給他記功，不應拿過去的過抵消了今天的功績。相反的，今天的功績還可以消除過去的過失。但這種「功可消過」的辦法，我們認為還要看其功過的性質（即平時功過和戰時功過）。一般的原則，應該是戰功可以消除其他性質的過，其他性質的功，則不應該消除戰鬥的過。其目的就是為了提高每一個指戰員堅強的戰鬥意志。（四）人人應該立功，但不一定能入黨。即每一個人民戰士，在每一次戰鬥和各項工作中，都應該表現自己為人民服務的決心，這種決心的最高表現，就是戰鬥和工作中的英勇堅決和積極肯幹。我們號召每一個戰士，都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立功。但這些立功者，則不一定都能入黨，立功可以作為入黨的條件之一，而不是所有立功者，都一定可以入黨的。

第二，關於英雄模範的培養與使用問題。在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中，我們的部隊中湧現了千百個戰鬥英雄和模範工作者，他們不論在戰鬥中、練兵中，及其他各項工作中，都起了一定帶頭作用，他們推動了部隊工作的進步發展，他們是連隊中寶貴的骨幹分子，是我們培養與提拔幹部的對象。在過去一年來，某些單位對於這些英雄與模範的培養和使用，有的做的還不是十分好的，因而妨礙了英雄模範的繼續提高和堅持下去。今後對於這個工作，我們認為：（一）要注意選擇，認真提高。對於每一個戰鬥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在選舉時，必須慎重行事，而不能馬虎敷衍，必須是一般群眾所擁護者，而不是群眾所反對者，他們的各方面都應有比較優異的成績。故領導上對於這些英雄模範，應該時常注意培養他們，教育他們，克服他們思想和工作中的缺失。教育他們英雄加英雄，模範再模範，長久地保持這個光榮的稱號。因此，某些單位平時放鬆對英雄模範的教育，某些同志還抱著嫉妒的態度，都是不對的。（二）要加強教育，培養旗幟。在過去一年來，我們對於這些戰鬥英雄和模範工作者的教育培養是不夠的。去年冬訓期間，各軍部召開了全軍的戰鬥英雄和模範工作者代表大會，一般的總結了這個工作的經驗，檢討了若干的錯誤和缺失。但是對於培養一項工作或一個部門內作為全面性的英雄模範旗幟，某些單位還沒有重視起

來。沒有在許多英雄和模範中，選擇優異而又為群眾所公認者，作為一個全軍學習的榜樣。故使英模的發展和工作的進步，缺乏一個明確的目標，因而使得許多名英雄模範不能堅持下去而平路垮台。為了使英模運動更好地向前發展，我們認為領導上必須有意識的選擇英雄模範中的優秀分子，作為所有英模的學習的榜樣。如一軍開展的「劉四虎」運動，三軍的史七則運動等，對於英模運動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帶頭作用，故今後凡有英模分子的各個連、營、團、師、軍都應該選擇為群眾公認之優異的英雄模範分子，作為該單位的一個英模旗幟，號召大家向他學習。上則應有意識的經常培養，使其不斷的進步、不斷的提高。（三）要反對個人錦標主義，提高集體英雄主義。在去年二軍的英雄代表大會上提出的開展集體英雄主義運動，是非常適合時宜的一個口號，是今後對英模教育的方向。各部隊應該有計劃的向著這個方向努力。否則，就容易走向個人錦標主義，就容易使英雄脫離了群眾，使英雄孤立起來。須知英雄模範的出現，都是在廣大的群眾運動中產生的，是每一個群眾運動發展的結果，是群眾路線民主運動的產物。我們對於這些英雄和模範，應該向他們進行這個教育。克服個人英雄主義，防止驕傲自滿情緒。事實上離開了群眾，離開了集體，英雄是不能產生的。就是產生了英雄也是不能牢固的。我們要教育這些英雄們，都能懂得這個道理，都能認識群眾力量的偉大，和集體主義的重要。使部隊的英模運動，產生著更大的力量。

第三，關於落後分子的改造問題。

在部隊中的落後分子，大體說來，是那些思想落後、工作消極、戰鬥畏縮、愛講怪話、肯犯紀律調皮搗蛋等分子。他們在部隊中是極少數的，是群眾中比較「孤立」的分子。一般的是被人瞧不起的，自己則又抱著自暴自棄的思想。我們對於這一些人，在教育政策上，應該是改造爭取的方針，而不應是懲辦打擊的方法。一年來，對於這些分子的教育上是有著很大的成績的。但是個別單位，也是發生了若干的過失現象。因為他們平時比較「囉咗」，故對其發生的毛病，動輒就扣上一個「思想問題」的帽子。如發現有開小差的現象，既要追問有無組織，追出組織，還要追問有無頭目。一連串的追逼下去，因而就發生了個別的不應有現象。因此，今後對於這些落後分子，我們應該持善意的態度和「治病救人」的精神，恰如其分的給予批評，隨時隨地的看到他的進步，哪怕是微小的進步，也應該及

時的給與表揚鼓勵。對其缺點錯誤，則應該實事求是的幫助改正錯誤，使之逐漸走向進步。

第四，關於通訊報道問題。一年來的通訊工作，已經具有了初步的群眾基礎。但比起部隊工作的進步，還顯得十分不夠。這表現在：(1) 對於新式整軍運動的經驗，缺乏經常的有系統的介紹，表現了零碎不全面。(2) 很多報道一般化，對於新興事物的感覺不敏銳，看不出運動發展的規律，稿件的質量不高，指導性不強。(3) 報道範圍不廣闊，表現在政治工作方面較多，軍事建設方面較少，後勤工作方面則更少，對地方群眾工作也報道得不夠。(4) 在城市報道上，雖注意了政策觀點，和左右傾向的發生，但有些問題，還是不夠十分明確的，如對城市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報道，則是很少的。對工商業政策執行的報道，也是不夠的。這些，是一年來新聞通訊工作中的缺失，是今後必須迅速改正的問題。

最後，關於幹部的教育問題。在去年5月前委第二次擴大會議時，對於在職幹部的學習問題，有著明確的指示。但是直至今天，還未造成一個全軍的學習熱潮，過去所指出的學習文件，有些單位，沒有檢查總結；有些單位，則沒有很好的學習。而在我們的督導檢查工作上，也做得非常不夠。其基本原因，是各級組織尚沒有有計劃的組織領導，沒有經常的督導檢查，幹部本身在思想上沒有把學習當成一個幹部的政治任務。因此，在職幹部的學習，比之於其他工作，目前則是最弱的一項。第二是宣傳部門對於教導隊的教育，也沒有負起應有責任來。有些宣傳部門，對於教導隊的教育情況，很少知道，有些單位，則只訂了一個教育計劃。這種現象，今後必須很快的糾正過來。

丁、今後宣傳工作的意見

(一) 關於教育方面。大體分為在職幹部的教育、教導團、隊教育、黨員教育、戰士教育幾方面。現就這幾方面的問題，我們提出今年的教育意見。(1) 在職幹部的教育，主要是組織在職幹部的學習問題。今年我們根據二中全會時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指定幹部必讀的十二本書，我們認為：團以上的幹部，以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毛主席的著作為主，營以下幹部，以學習領導方法和政治學習(包括政策時事學習)提高文化為主。學習的文

件，團以上幹部，計劃今年學完二中全會決議、新民主主義論、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營以下幹部，今年學完二中全會決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第一章〈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要把這些文件學好，必須打通幹部的學習意見問題，因此應該進行一次深入學習動員。為建立學習制度，這裏我們提出：第一，在非行軍作戰環境時，每日必須保證兩小時的學習時間。第二，每一本書，或每一問題學習一段時間後，即進行一次測驗，刺激其學習情緒。第三，每次休整時，均應做出幹部學習計劃，結束時，應做出總結報告。第四，建立學習獎罰制度。在學習的領導上，我們建議均由各級黨委負責，宣傳部門則在其領導下予以組織檢查。這種文件的學習，必須和工作統一起來。學習是為了提高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為了改進工作，因此學習和工作又必須密切聯繫，經常的了解幹部思想狀況，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以學習的武器克服各種不正確傾向，防止學習與工作脫節的現象。關於教導團隊的教育，各級宣傳部門，要經常的了解其教育情況，作為自己的業務之一。過去對於教導隊的教育情況，我們是不夠了解的。(2) 黨員的教育，根據現在黨員的思想水平，和黨的知識水平，今後黨員教育的重心，首先應該加強其對黨的思想教育和知識教育。使黨員初步的懂得黨綱黨章，和黨員的權利義務。教育方法上，要堅持每禮拜的黨課時間，營團級幹部負責上課，以西北局和野政印發的《黨員課本》及《支部問題》，為基本教材。並利用戰鬥間隙，以團為單位，開辦黨員訓練班，輪流訓練全團黨員。(3) 戰士的教育，在今天全國革命勝利形勢下，要提出「打到底」「幹到底」的教育口號，因此，首先要把階級教育提高一步，建立為勞動人民徹底獻身而奮鬥的思想，過去那些「不倒蔣胡匪幫誓不回家」、「不解放家鄉誓不回家」的口號都應該根據目前形勢，而提高一步。

其次，要加強城市政策與城市知識的教育，過去我們所處的環境，基本是一個農村環境，今後我們將要解放城市和進入城市，由鄉村包圍城市，轉變為城市領導鄉村。但在城市中的階層，是複雜的，過去沒有見過的东西，沒有遇到的問題，今後將要碰到。故今後對於戰士的城市政策的教育，應列為經常教育的一項，使他們懂得城市政策的重要意義。對於城市知識的教育，也是需要的，因為我們的戰士絕大部分是農村的農民，大

都沒有到過大的城市，對城市中的普通常識都會不懂，因此，應該收集一些城市中一般常識的材料，編成教材給戰士介紹。

第三，要加強和華北兄弟部隊的團結教育，執行野政發布的對華北兄弟部隊的八條守則，虛心的學習華北兄弟部隊的戰鬥經驗和工作經驗。各軍都要準備會師時的歡迎工作，發動連隊寫歡迎信、慰問信，送慰問袋，設歡迎站，唱歡迎歌，造成一個親密的團結空氣。

(二) 關於新區的宣傳工作方面，根據去年和今年春季渭北戰役時新區宣傳的經驗，要做好新區的宣傳工作，必須有著思想與物質的準備。即每一個同志，都必須學習黨的各項政策，調查了解新區的各種情況，排演適合新區的各種戲劇，印製新區宣傳品等。這些工作準備的好壞，是做好新區的宣傳工作的重要條件。故我們認為(1) 各軍在可能情況下，召開短期的宣傳員培訓班，講解新區的各項政策和新區如何進行宣傳，使他們對黨的政策有一個比較深刻的了解。過去所發生的失卻立場的右傾亂說，和不合政策的左傾幼稚，基本原因是這些宣傳人員對政策的不夠了解。(2) 凡到新區的一切人員，都必須模範地遵守黨的政策，均必須事先給與政策紀律的教育並注意檢查其工作情況。(3) 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宣傳形式，向新區人民宣傳，如設問事處、開座談會、開群眾大會、演戲、展覽照片、散發報紙、散發傳單等等。根據過去的經驗，新區的群眾不是不願聽我們的講話，而是怕我們不給他們講話；不是不敢看我們的傳單，而是搶的去看，帶回家去看；不是不敢看我們的演戲，而是不願十數里跑著來看演戲。這些，都說明了新區的群眾想知黨的政策，要求我們大量的進行宣傳。(4) 在新區宣傳時要區別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各種不同的對象，不要不看對象的千篇一律的宣傳，而要根據對象進行不同的宣傳，這是宣傳工作的重要一項。

(三) 要提高新聞通訊與報紙的質量，一年來我軍的新聞通訊和部隊報紙，有著相當的發展，目前的問題，是如何提高新聞質量與如何實現「全軍辦報」的問題。關於如何提高新聞質量，首先是要提高新聞的政治質量。即是要求新聞稿件，對於全國有宣傳意義，對於部隊的軍事政治工作有指導作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認為所有記者、通訊員必須加強學習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論水平，同時繼續深入群眾，了解群眾的實際生活，

在這些實際材料中，選擇新鮮事物，不要「熟視無睹」。抓住典型報道，找出特點採訪，反對羅列現象，平鋪直敘，沒有重心的毛病。

關於實現「全軍辦報」，這首先和提高新聞質量有著密切的關係，即稿件質量提高了，報紙也就辦好，我們認為要實現「全軍辦報」第一要發動群眾為報紙寫稿，並組織廣泛的通訊網和通訊員，有了大量的稿件，從中再選擇好的發表。但現在的部隊報紙，發動廣大群眾為報紙寫稿，還做得不夠。許多報紙是宣傳幹事唱的獨角戲。第二，要首長負責，領導辦報，經常指示報導、編輯方針。這樣，由上而下的動起手來，「全軍辦報」的方針，就容易實現了。至於確定報紙的對象、語言通俗、印刷清楚、排版活潑等，都是一個報紙要作的事情。

(原稿為刻版油印件)

部隊文藝工作的情況與今後的任務：在西北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這次的文藝代表大會，是我們西北文藝工作者從未有過的一次大會，也是我們西北文化軍隊的一次大演習。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對於我們西北地區今後文藝工作的開展，會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特別對於我們部隊的文藝工作，更會起到推動的作用。今天，我想把我們西北部隊的文藝工作情況做一個概括的介紹，請各位代表加以批評和指教。

我們部隊的文藝工作，和我軍的歷史是分不開的。繼自建軍以來，就有了部隊的文藝工作，遠在1929年為毛主席所領導的紅四軍九次代表大會上，即規定了部隊中設立宣傳隊和藝術股的組織，1944年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上，毛主席又指示我們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日寇，解放人民和建設工業化的新中國的。」在毛主席的這樣建軍思想下，我們的部隊的文藝工作也就隨著部隊的發展一直在開展起來了，並成為部隊政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在西北的部隊內，不僅有專門的文藝組織——工團和宣傳隊，據不完全的統計人數約有7,000人左右。而且很多的指戰員，也都成為部隊群眾中的文藝工作者了。在這些文藝組織中，有歌劇、話劇、京劇、秦腔、落子、也有舞蹈等，在這些文藝工作者中，有文藝作家、有戲劇工作者、有音樂工作者、有美術工作者、有電影工作者，其中又有女同志和小娃娃等。他們散布在部隊的各個角落裏，為著人民的解放事業服務，為了解放戰爭勝利服務，為了全體指戰員服務。他們不論在十年內戰和八年抗戰，以及三年人民解放戰爭中，都始終和部隊在一起生活著，並都經歷了殘酷的戰爭鍛煉。他

們在戰鬥的時候，有的到後勤部門作戰勤動員，有的到火線上去作戰場演唱，有的到連隊裏去作文化娛樂；在行軍的時候，他們沿途設立鼓動棚，打著鑼鼓，扭起秧歌，組織行軍娛樂；在部隊整訓的時候，他們馬上到連隊中去演戲，教唱歌子，幫助出黑板報，組織文化學習。尤其在新解放的廣大地區和城市裏，利用了各種各樣的宣傳形式，進行黨的政策宣傳，打破了群眾的疑慮心理，穩定了群眾的動盪情緒，並爭取了新區的不少知識分子參加了軍隊。這些都說明了我們部隊的文藝工作者，和我們部隊的成長壯大，有著血肉的聯繫，他們肩負了文藝的武器，發揚文藝工作上的戰鬥精神，成為我們部隊文藝工作者的光榮傳統。

隨著戰爭勝利的發展，隨著部隊軍事政治工作的進步，部隊的文藝工作，也在日益的向前開展，現在已形成群眾性的文藝活動，兵演兵、兵畫兵、兵唱兵、兵寫兵的群眾文藝形式在連隊中普遍地流行。尤其在今年生產建設中，則更加發展起了。如一個師，自去年10月到今年6月，自寫自演了3,337個劇本。在政治整訓中，以自己的部隊的光榮歷史，編寫了各團、各營、各連、各排的「傳家寶」。對保持我軍光榮傳統的教育，起到了重大作用。其形式還有說快板、說鼓書、小型廣場劇等，在演唱中沒有胡琴拉，他們就用打掉底子的洋瓷缸和葫蘆殼等作胡琴；沒有三弦彈，他們就用一把洋鋏，挽絲弦就彈；沒有鼓子敲，他們就用升子蒙上皮子就敲。總之，任何困難在他們人民解放軍中都是可以克服的，而在兵寫兵上，則有槍桿詩、鋤頭詩等普遍發展，由歌頌武器和歌頌生產工具到寫批評和自我批評與鼓勵戰友們的工作和思想的進步。會寫的自己寫，不會寫的口述請人寫，一個人寫不成的兩人合作寫，寫成了以後配上調子唱。表現了人民軍隊的集體主義，而這些創作表現了人民群眾的豐富智慧和人民戰士的偉大氣魄。這裏我舉戰士的一首詩在下面：

不怕大風吹，
不怕大雨淋，
不怕爬高山，
不怕沒鞋穿，
不怕打大仗，
天大的困難我不怕！

這種偉大的氣魄，在這首詩裏完全表現出來了。至於，兵畫兵同時的普遍流行，有漫畫、有國畫、有連環畫，題材現實，形式多樣，內容生動活潑，畫出之後，貼在自己的牆壁上或黑板報上以教育自己。諸如此類的例子，真是舉不勝舉。但我們不能滿足，我們還要更加普遍發展和逐步提高。目前這種文藝形式，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說的一樣：「是萌芽狀態的文藝」，是比較低級的東西，需要我們在這個基礎上培植加工，使其向前發展。

這些文藝活動，對部隊的工作，有沒有作用呢？有作用的。首先是啟發了人民軍隊的階級覺悟，特別是富有階級教育的戲劇，對於戰士們的思想改造上作用更大，比如《窮人恨》《劉胡蘭》等戲劇的演出感動了許多戰士落下淚來。領導上抓住這種情緒，隨時組織訴苦，對其階級仇恨的激發，和階級覺悟的提高起到了啟發作用。其次是由於階級覺悟的提高，戰士們懂得了他們的痛苦是地主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所造成的，不消滅他們，人民是不能翻身的，不堅決地革命到底，勝利的果實，也是不能鞏固的。因此戰士們認識了當兵是為了自己當的，想家的思想和行為是不對的，因而又鞏固了部隊和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在今年的大規模生產運動中，對於生產情緒的鼓勵，更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就是說反映政治經濟的文藝，同時指導了政治經濟的向前發展。

這些文藝活動，怎樣在部隊中開展起來的呢？又怎樣能得到廣大戰士的歡迎呢？在我們的經驗中，是由於正確的執行了毛主席的建軍思想和文藝方針，是由於全體文藝工作者的一致努力所獲得的，但最重要的問題，更是要為著部隊的工作出發，為了戰士的利益服務，也就是貫徹「為兵服務的方針」。這一點，在我們部隊文藝工作者來說，目前一般的是解決了的。反之，就會聽到部隊的不好反應，就會在戰士中吃不開。到連隊裏去，不但感到對他們的無益，反而感到增強了他們的累贅。因此，我們的部隊中的文藝工作者，要想在部隊中生根開花，要想和戰士群眾打成一片，要想出做出一點名堂來，首先必須解決一個「為兵服務」的思想問題。

根據這次大會的精神及上述的情況，在和平建設的新時期，我們部隊的文藝工作必須做好下列數項：

(一) 把文藝和武藝密切結合起來。就因為我們的部隊，是一個武裝的戰鬥組織，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是其經常的政治任務；那麼，我們部隊的文藝活動，就應該密切的和它結合起來。不僅要反映部隊的現實生活，而且要指導現實的向前發展，使我們的部隊很快的建設成為一支現代化的國防軍。因此，我們的部隊文藝的任務，絕不能離開這個中心，而追求其他東西，不論在戲劇表現上與文學創作上，都應以反映部隊的軍事素養與軍事藝術的提高為主，舍此而他，就是不對的了，就會變成脫離現實的文藝了。過去的經驗這樣證明，今後的工作仍舊應該這樣去做。

(二) 要面向連隊，為兵第一。克服文工團、宣傳隊及文藝工作者，常常住在城市住在機關而不願意到連隊裏去的現象。現在有些地方的戲劇演出，城市和機關裏已經看膩了，而連隊裏還根本沒有看。城市和機關好像是「錦上添了花」，而連隊還需要「雪裏去送炭」。尤其在今年大生產運動中，許多連隊是住在曠無人煙的荒野裏，精神食糧非常缺乏，雖然兵演兵、兵唱兵、兵畫兵的運動，比較地開展了，但總是萌芽狀態的東西，不能夠解決他們的精神渴望，同時急待我們專門性的文藝工作者加以培養，如果有人認為可以代替我們深入連隊的工作，那是非常不對的。戰爭結束以後，文工團宣傳隊進入了城市，是客觀條件上雖增加了一些到部隊連隊裏去的困難（如交通運輸等），但不能藉此就少到連隊裏去，或不到連隊裏去了。故我們希望這次會議以後，文藝工作者要有一個深入連隊的運動。

(三) 要提高業務，創作第一。現在我們的部隊的文工團、宣傳隊普遍困難是劇本的恐慌，沒有新的東西可演。這是甚麼原因呢？沒有材料可寫嗎？材料很多的，沒有人才去寫嗎？人才也不少，原因何在呢？客觀的原因是：創作人力的不專門，陷於日常瑣碎工作中，領導上再沒有計劃地和即時地指示創作方針與組織創作力量；主觀的原因是：創作思想不夠積極，沒有有計劃性的主動地積極創作材料，沒有下功夫埋頭寫作，兼之某些人「大的寫不出，小的不願意寫」的思想毛病，這就更影響創作工作的開展。但二者比較起來，我認為主要還是主觀的努力不夠，而非客觀困難的造成。那麼，如何開展創作工作，主要的又應該創作哪一方面的東西呢？我想除了領導上加以極端重視，並給予創作上的各種有利條件外，創作者本身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過去的戰爭和今天的生產建設，都有著豐富

的材料，擺在我們的面前，等待我們去搜集、去綜合，予以加工製造。這樣，說沒有材料可寫的說法，不就是不合實際的了嗎？寫甚麼呢？要寫積極方面的東西，要反映戰鬥中、生產中部隊的模範事蹟與英雄人物，要打破創作上的某些公式主義，要開拓創作上廣闊道路。

（四）要提高與普及不可偏廢。過去我們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做到了很多的普及工作，今天仍在做，這是很好的；但把提高與普及截然的分開，這就是不對了。現在我們的數千個專門職業的普及工作者，若不提高於數十萬被普及者，仍停留在一個水平上，同樣也是不對的。今天我們部隊的文藝工作者，在連隊裏跑了五六年，甚至十多年，感到自己提不高，就是偏廢了提高工作。它表現在創作上不能有新的東西，仍舊停留在過去的階段上，而客觀形式的發展，人民覺悟的提高，都在日益向前推進，戰士群眾們對於藝術水平的要求也比過去要高，我們的文藝工作就要適應這種客觀情況的發展。故今後我們文藝工作者，首先必須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加強部隊軍事政治工作學習，加強文藝理論學習，因此，凡是比較有經驗有修養的文藝工作幹部，必須有計劃的認真的研究業務，總結過去的經驗，把它提高到藝術理論水平上去，用以指導工作。凡是文藝修養較差的，思想水平亦低，特別是新參加的文藝工作者，則應該深入連隊體驗生活，提高思想，幫助兵演兵、兵唱兵、兵寫兵、兵畫兵等形式的開展。而在文工團與宣傳隊之間應有適當的業務分工，一般的軍以上的文工團，應當著重業務技術上的研究，多搞示範性的東西，師以下的宣傳隊，應該著重群眾性的活動，多在連隊去幫助文藝演文化娛樂與「四兵」的運動。但這種分工，不是絕對的，而是要按實際情況去出發。

（五）要廣泛地聯繫，交流工作經驗。今後我們文工團之間，文工團與宣傳隊之間，地方文工團與部隊文工團宣傳隊之間，這一地區的文工團與那一個地區的文工團之間，黨的文藝工作者與非黨的文藝工作者之間，舊戲劇與新戲劇之間，都要主動的進行聯繫，交換經驗，交換創作；反對關門主義和「孤軍奮鬥」，增強文藝工作的統一戰線。而在部隊內的上下文工團與宣傳隊中，則又要確立業務上的指導關係，即上一級的文工團對下一級宣傳隊，應當給他們在業務上提高給予指導，糾正過去互不相干的現象，如果把我們的西北的文藝工作者團結成一條堅強的陣線，那我們的文藝運動，今後一定會出現一個新的面貌。

最後，我希望把我們的文藝統一戰線鞏固和擴大起來，西北各界文藝工作者，親密的團結起來！

1950.9.23，於西安

(原載西北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秘書處編，《西北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西北軍區第一印刷廠，1951〕，頁47-54)

附錄：新聞報道。西北舉行首屆文代大會，號召發揚過去陝甘寧邊區人民文藝運動的正確方向，並討論開展各兄弟民族的文藝工作問題

【新華社西安7日電】西北各民族文藝工作者空前大團結的西北首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已於9月21日至30日在西安舉行，西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同時宣告正式成立。大會選出柯仲平、魯直（第一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孜牙（維族、新疆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文藝處處長）等75名正式委員暨15名候補委員。大會討論並確定了開展西北文藝工作的方針和任務。

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各省市及部隊等8個代表團，包括11個民族的文藝工作者代表383人，另有各民族的歌舞團，各地的文工團、參觀團等400餘人列席，並為大會演出各種節目。各代表從各地帶來各民族珍貴的文藝作品3,000餘件，供大會展覽。

這次大會總結了西北地區解放一年來文藝工作的經驗，並著重地指出了過去陝甘寧邊區的人民文藝運動在毛主席親自指導和培養下，是代表著中國人民文藝運動的正確方向並獲得了光輝的成績的，今後更應發揚這個光榮的傳統。

大會確定西北文藝工作必須服務於當前西北人民總的政治任務，即「有步驟地完成土地改革，發展生產，把西北建設成為新中國的工業與國防基地」，必須忠誠地服務於西北人民的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事業，而在現階段則應完成下列各項任務：第一是有計劃有領導地組織創作運動。按照不同的地區、不同的任務、多樣的主題，反映各民族多樣的鬥爭生活。其次是發展群眾文藝運動，在城市內應以有示範作用的文工團為核

心，使業餘文藝活動與職業文藝活動密切結合。在農村應廣泛利用春節賽會，組織民間文藝活動。部隊文藝今後應集中人力從事創作，並須發動有戰鬥經驗和有文藝修養的指戰員參加。部隊文工團應深入連隊，繼續開展「兵演兵」運動。第三是迅速地動員西北區為數約達 25,000 的民間藝人，使之為人民服務。對於他們，思想改造和具體幫助要互相結合。對於較有成績的劇團應給予必要的支持。

大會著重地討論了如何開展各兄弟民族的文藝工作問題，指出必須在各民族友愛團結的基礎上，掌握新民主主義的文藝內容，採取逐步改進的方針。為此，大會確定今後將努力團結並依賴各兄弟民族文藝工作者，發揚各兄弟民族文學藝術的優秀傳統，進一步大力培養各民族文藝幹部，譯印各民族的文藝作品，並以此推動各民族的團結。

(原載 1950 年 10 月 10 日《人民日報》第 3 版)

貫徹部隊速成中學的教育方針：1951年 4月13日在速成中學會議上的報告

一、速成中學的一般情況

大陸解放戰爭基本結束以後，我們國家的基本任務，將是進行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這正如毛主席在全國人民政協會議開幕詞指示的：「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我們軍隊除繼續堅決的肅清殘餘匪軍解放全國外，則必須加速將自己建設成為一支現代化的國防軍。但是這種現代化的國防軍建設，如不去提高我們工農出身的指戰員的文化水平，就是很困難的。因此根據了毛主席的這個指示，西北我軍於1950年的5、6月間，先後成立了培養工農出身的軍隊中下層幹部的文化速成中學，招收了工農出身的中下層幹部及青年戰士入校學習。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的低微，參加中學學習的是很少數的。大部分則入初小、高小及補習班學習。有的速中裏面，現在還沒有中學班次，而實際上是一個速成小學了。但這些學生在鬥爭歷史方面，則是比較長的，一般都是四年以上的軍齡，以及戰鬥英雄和模範工作者。比如十九軍速中的445名學生中，就有272是戰鬥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在政治質量方面也是較好的，一般的黨員佔學生的80%以上。從這些情況來看，速成中學學生的政治質量和鬥爭經驗是比較豐富的。但在教員方面情況就不同了，他們大都是來自西南、中南、西北的解放起義軍官，或者是向外聘請來的。他們的文化水平大部分是中學畢業以上程度，但鬥爭歷史和社會經驗與政治質量比起文化水平就差了些。他們在教學工作方面一般的都表現了積極

熱情吃苦耐勞的精神，可是他們對於這種學校的教學經驗則是缺乏的。由此就產生了教員與學生在文化水平與政治水平上的發展有著畸形現象，這在我們領導上是必須認識到的一個特點。

在半年的學習過程中，一般的學生都表現了積極學習文化的熱情。如有的在休息時候還不休息，有的躺在床上還在肚皮上練字，有的坐凳子把屁股磨爛，也在所不惜。這些都說明了學員學習文化的迫切要求。但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學生都有一定的鬥爭歷史和政治水平，在一小部分學生中，則產生了擺老資格，居功自滿，目無組織，瞧不起教員，自暴自棄，強調年老，甚至發生開小差的現象。在接受課程方面，由於他們的政治水平較高，年齡較大，所以經歷較多，鬥爭經驗較豐富，一般的理解力也較強。但記憶力則是比較差的。

在教員方面，由於他們出身於舊社會的學校，加之缺乏革命的實際鍛煉，和對軍隊情況和軍隊幹部的不太了解，因此在教學方面，就不能掌握學生的特點和實際聯繫起來。因此有的沿用了舊的一套教學方法，有的錯誤的解釋政治名詞；如對社會發展史的解釋說：「社會發展史是新陳代謝」、「打」是打老百姓的打、「教」是三娘教子的教等。因而引起了學員對教員的瞧不起。

雖然如此，但在半年來，學生的學習成績是可觀的，如初中班學習國語有800字，增加到1,700字，並能看懂普通書報，和會寫三四百字的文章，錯白字也少了。算數學會了四則雜題及整數小數，自然常識，懂得了風、雲、雷、雨的來源，破除了傳統的迷信觀點。小學班識字方面，由文盲或識少數字學到能看懂普通書報和會寫簡短的文章，算術也由不識阿拉伯字學會了加減法及一位乘法。

由此看來，只要我們領導上能正確的貫徹速中的教育方針，並能很好的掌握學生的特點，經常保持學員的飽滿學習情緒，以及改進教員的教學方法，建設教學上所需要的科學儀器設備，及時的供給學習課本，使學員們能夠安心的學習。那麼，速成的任務，就能夠如期的完成，在幾年之後將會培養出一批新型知識分子和國防軍的骨幹的。

二、半年來我們取得些甚麼經驗

開辦軍隊的文化學校，在我們說來是一件新的工作，所以不論教學與工作，都是處在一個邊做邊學的摸索時期。雖然如此，但在半年的時間內，不論教學與工作方面，我們都取得了一些經驗，概括的總結起來，約有以下各點：

(1)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這種學校的特點，那就是教員與學生各具長短。一般的教員有文化水平，而缺乏實際經驗與政治修養，學生有實際經驗與政治修養而沒有文化水平。由此而產生的問題就是教員方面要加強他們的思想領導與政治學習，學生方面則要努力的提高文化水平。不論教員和學生，都應抱有虛心學習的態度，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反對各恃己長，互瞧不起的現象。因此，我們領導上就要認識，這種學校，對教員來說是一個改造思想提高思想的政治學校，對於學生來說則是一個提高文化的文化學校，大家都經過這個學校，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個具有文化水平和政治修養的健全幹部。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根據過去的經驗，教的方面，每一教員要從思想上認識自己的不足，多向實際學習，要在教學中、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中，吸取他們認識問題、觀察問題的觀點和立場，以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並發揚愛護學生的精神。而在學生方面，則亦應虛心的學習文化，認識自己文化水平的急需提高，努力的傾聽教員的講授課文，認真的複習討論，發揚尊師的精神。在這裏我們認為互教互學，尊師愛生，應該成為我們速成中學教學關係與師生關係中的一種優良作風。

(2) 對於學生的政治學習與文化學習，應該視為互相關聯著的東西，不能把它孤立起來或者絕對的強調一面。我們的學生雖然都是經過鍛煉，有政治修養的幹部，但是他們的思想意識許多人依然存在著不少的毛病。比如有的認為送他們學習是在軍隊裏吃不開了，有的認為過去沒有文化一樣的能工作，為甚麼今天就要學文化呢？有的在學習中擺老資格而不用心學習，有的為了逃避學習而開了小差。那麼，對於這種有思想毛病的人，如果我們不去首先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要他們用功的學習文化，也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對於學生的思想意識的教育，更加提高他們思想覺悟，安定他們的學習情緒，是完成文化學習的重要保證，尤其使他們對政治水平的提高，不落後於部隊的一般水平，出校以後能勝任愉

快的工作。故在今後政治教育的時間和黨團日的時間內，除了定期的進行抗美援朝和國內時事的報告及中央重要文告的必須學習外，對於學生中所發生的一些思想意識上的毛病也必須進行糾正。從階級觀點上來激發他們學習文化的認識，說明我們沒有文化水平，就是我們在文化上還沒有「翻身」。沒有一定的文化科學知識，就不能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國防軍，同時我們也就不能很好的鞏固我們政治與軍事上的勝利，不能建設成為一個有著高度文化生活的新國家。從這些根本問題上來解決一些學生不願學習文化的思想。那麼，不安心學習的情緒就自然可以消除了。如果認為速成中學是單純的學習文化而不問政治的思想是不對的，同樣，不去加重文化學習的比重而和政治學習平列起來的做法也是不對的。

(3) 要教學、自學與互助學習結合起來。這就是在教學方面，要求每一個教員的教學方法和課堂指導，能夠根據學員的接受程度很好的講授與具體的指導，不要呆板的照課宣讀，提倡學生隨時發問，教員隨時解答。在學習方面，我們還要強調過去的一句古話，即「讀書全要自用心，先生不過引路人」的道理。要他們努力的用功學習，從苦心鑽研中求得文化，這在對於自力學習方面是非常必要的。在課後的自習方面，要組織大家互助。「三個臭皮匠，合成諸葛亮」。這句話，又說明了發揮群眾智慧的作用。今天，我們把這三方面，很好結合起來，那就全面了。在半年多來的學習過程中，也說明了課堂指導、自力學習與互助學習結合的必要性。假如，我們只強調了自力學習的方面，而不去很好的組織活動，那麼，對於教員講授的理解與記憶就會更差了。尤其在一班學員記憶力差的情況下，更應該這樣做，更應該發揮大家的智慧，發揮學生創造幫助記憶和理解問題的各種各樣的方法。但假如我們又只強調了互助的另一方面，而不強調自力的學習，那麼，就容易養成學生的依賴思想，而不去刻苦用功，或者生硬的組織活動，流為一種形式。因此，我們認為，自學與互助的關係應該是在自學基礎上的互助，在互助幫助下的自學，二者有機的結合起來，就會收到更好的效果。

(4) 要切實的做好準備教案，審查教案與課外輔導工作。根據半年多來的教學經驗，我們對於每一課程的講授必須實現有著充分的準備，並於準備之後，再認真審查教案，不能馬馬虎虎的照著課本宣講，尤其在講授比較枯燥的課程時，應該引用許多的具體實際實例加以說明，以啟發學生

的理解與幫助學生的記憶，過去許多學校這樣做了的，今後還應該繼續做下去，過去沒有這樣做的，今後必須這樣做。在這裏我們特別要指出的就是要反對教員中某些人的僱傭觀點，克服「講鐘點」的思想。說明我們把學生的課程講好，也就是我們為人民服務的具體表現，當教員是革命工作的分工，並不是沒有前途的。這裏還要說明一點，就是只有充分的課前準備和審查教案還是不夠的，而必須深入學生中，和學生打成一片，進行課外的輔導，了解學生對於自己講授的意見和對於課程的理解程度，隨時的加以誘導，貫徹「誨人不倦」的教學精神。而對於每一教員所擔任的某一課程，我們可以採取「教員責任制」的辦法，即某一教員教的某一課程，其學生成績的優劣，完全由某一教員來負責。這裏就要我們教員所擔任的課程，最好由開學到畢業，不要輕易的變動。這樣對每一個教員來說，可以加強其教學的責任心，可以有始有終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5) 開展學習模範運動，是我們提高與保持學習情緒重要的方法。因此，我們的速成中學，領導上對於每一個教員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成績，在各種考試中要進行總結和講評，對於教學與學習積極努力者，應給記功登記，選舉模範，並開會慶功。對於消極怠工，學習不積極者，應給予批評記過，並給予適當的處分，建立學習紀律。我們將依據部隊中的立功英模條例的精神，制定學習模範條件，以便各校普遍的採用。

三、貫徹「速成的、聯繫實際的、但又是正規化的」教育方針

為了很好的完成速成中學的教育任務，為了把我們部隊中沒有文化的工農出身幹部培養成為有文化的幹部，我們就必須堅決地貫徹速成中學的教育方針，但過去我們在毛主席沒有發布〈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以前，我們對於速成中學的教育方針是不明確的。所以各個速成中學的教育方針與教育制度，也是不統一的。自毛主席去年8月發出了指示後，我們各個速成中學又沒有認真的研究與貫徹，因此就形成了教育方針與制度不統一的現象。如現在的速成中學，在學生編班上就不一致，有甚麼掃盲班、先修班、補習班、預科班、初級班、低級班、中級班、本科班等等。在畢業的期限上也不一致，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一年半，有的是兩年。在學生水平測驗上也沒有一致的標準，有的單純的以識字多少來

考核，有的以高小初中來估計。在教學方面，雖然大部分是根據學生具體情況聯繫了實際，但由於教員實際經驗的缺乏，因此在教學上，有的機械的講授課本條文，而不能和學生的實際情況聯繫起來，有的搬用學校教學的一套，而缺乏啟發學生的智慧，採用了注入式的方法；有的抱有僱傭觀點，只管課堂上課，少去課外進行輔導，形成「學用不一致」的現象。而在學校的組織與學科的編制及課本的採用上，同樣的是不一致的，如：有的把速成中學與教導團隊混合在一起；有的按軍事制度組成大隊、中隊。課本採用上，則有的是野政編的，有的是兵團編的，有的是自己編的，還有其他兄弟部隊的等。

從上述情況來看，我們的速成中學，不論在教育方針與教育的制度上，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與「速成的、聯繫實際的、但又是正規化的」教育方針不相符合的地方。當然這種現象的產生，應該由我們來負責任的，但是，我們為了把我們的速成中學辦好，把我們的工農出身的幹部培養成為新型的知識分子，我們必須把現在所存在的一點缺點，加以克服。相信我們全軍的速成中學，經過這次實踐之後，不論在教育方針上和教育制度上，都會把它比較正規的建立起來的，會把毛主席所指示的教育方針貫徹下去的。

四、關於今後幾個問題規定的意見

(1) 關於學科、課程、教導方面

第一，根據總政〈1951年部隊文化速成學校暫行實施辦法〉和目前我們速中的具體情況，在學科方面，統一分編小學班和初中班二種班次。小學班以二年半時間學完總政編印的小學文化課本為畢業。初中班以二年的時間學完總政審定的初中課本為畢業。

第二，課程講授的時間比例，根據總政規定的授課時間比例精神，不論小學和初中，文化學習應佔80%，軍事學習佔10%，政治學習佔10%。

(2) 關於組織與領導方面

為了便於學習的要求，學校的組織形式和領導關係，必須適應教育任務的完成。因此在速成學校的組織方面，統一應按照軍委總政的部隊文化速成中學的組織編制表執行。目前與軍事教導團混在一起的編制，應該把

它分開來，以便於文化學習領導和教學的管理。在領導關係方面，各速成中學歸該級政治部直接領導，並由政治主任兼任校長，另設專職的副校長。採取校長負責制，統一領導教導、總務、黨務三個系統。同時為了建立學校的領導核心，各校應該組織校黨委會，吸收教導、總務、黨務方面的幹部參加黨委會，以討論教導、總務、黨務方面較重要的問題。

(3) 關於幾個制度問題的規定

第一、統一規定每學期為六個月，一年分為兩個學期。以一個半月為考試和放假時間。

第二、建立考試制度。包括入學考試、月終考試、學期考試、畢業考試及補考五種，每種考試作出總結並公布考試成績。

第三、建立升降級制度。凡修業期未滿，成績優良者，可以升班。而修業期雖滿，但成績不及格者，可以降班。

第四、制定請假、休假、點名、補課、獎懲制度。

第五、制定統一校風、校規、校歌及課堂規則。

第六、建立教育準備會議與教案審查制度及教學總結制度。

第七、建立請示報告制度，每一速成中學，每月月終考試需向軍政治部做一次報告。每學期考試，需向野政做一次報告。年終考試需做一次總結報告。其報告內容，應包括教學經驗與學習成績。

第八、關於招生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明確，我們開辦速中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國防軍建設的幹部。因此，招生條件上，應該視其學生的培訓前途如何，不要無目的的收生。故暫定小學班的學生應具有二年以上的軍齡及有發展前途的26歲以下的班、排級幹部和模範工作者與戰鬥英雄。初中班應具有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三年以上軍齡，28歲以下及有發展前途的班、排級幹部，及模範工作者與戰鬥英雄。除具備上列條件外，一般的應為無宿病與自願學習者。如果營團級幹部入學者，可以不限年齡。

五、結論

同志們！我認為我們這次的速成中學會議，是成功的一次會議，並有很大的收穫。首先是交流了各個速中的教學經驗，使得我們辦速中的同志增加了信心。大家如果把這些經驗，都能充分地利用起來，並把它貫徹到

以後的工作中去，那麼，我們速中的教學成績，將會更大的。其次是經過了這次會議的討論，對於速成中學的教育方針，都明確起來了，大家都知道了我們為甚麼要辦速成中學，在速成中學裏我們培養些甚麼幹部。這樣，對於我們辦速成中學的同志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任何工作都是一樣，如果方針目標明確了，我們就可以循序這個方針、目標去辦事，在工作中就可以少走彎路和少犯錯誤，或不犯錯誤。第三是經過這次會議的討論，我們制定了統一的制度和統一的辦法。這樣，就使我們的速成中學能夠走向比較統一的正規的方面，就可以避免一些不統一不正規的現象。這三點，我認為是我們這次會議上主要的收穫。

其次是關於速成中學的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內容問題。為了適應目前形勢，使我們速中的學生政治水平和軍事水平不落後於一般的部隊水平，能在畢業以後愉快地擔負工作，故在政治教育方面：經常性的學習材料，從小學二學期起趕小學畢業學完中國革命讀本上下冊。現在的初中班因已過去一個學期，也趕畢業學完中國革命讀本上下冊。如果兩種班次都沒有學習這個課本時，可以合在一起採取上大課的形式，估計在一年半的時間內，是可以學完的。如此和部隊的政治學習進度也就相差不多了。臨時性的政治學習，則以時事問題和黨的政策、法令為材料，使我們學校的學生也能經常了解國內外時事發展，不使他們的政治認識，落在時局發展的後面。最近一個時期，各學校都應學習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使得我們的學生都能了解為甚麼要大張旗鼓的懲治反革命分子，以及目前我們懲治反革命分子的必要性和正義性。

在軍事教育方面：各校統一的執行軍委軍訓部關於速成中學的軍事教育計劃，此間不再另作規定。黨團日的活動和教育，除過進行黨團務的活動外，小學班統一學習黨章教材，初中班學習支部工作條例、革命軍人委員會條例、黨委條例三個文件。至於學校團員的教育，由野政青年部規定。

第三，關於招生問題。因為我們的速成中學將要繼續的辦下去，所以目前各速成中學，如果校舍、教員、供給等問題允許招生時，你們就可以繼續招生，畢業了一班次後，就可以再招收一班。其收生的文化程度條件，估計在一兩年以後，部隊戰士的文化水平，大體上都可能達到小學一二年級的程度，因此，在文化程度的條件上，將來初中班的學生不會有

多大問題的。在年齡方面，我們應該估計到趕中學畢業，一般的不要超過30歲以上，但為了照顧一些年大 XX 並有鬥爭經驗的幹部的學習，各校可以設立一個特別班，對於他們可以不規定一定的畢業年限，視其學習情況及工作需要，決定他們的學習時間。

為了完成速中學生的教育課程和教育計劃，凡送入學習的學生，除了有特殊需要，中途調出工作者外，一般的都不要中途調出，否則就不能很好的完成速中的教育計劃，也就失掉了辦文化速中的意義。

關於教員和學生的待遇問題。在教員的待遇方面，可根據軍委總政關於對知識分子的待遇辦法執行。學生的待遇，在校學習的時間均按其原來的工作崗位待遇，畢業時可根據今年軍委頒布的〈關於幹部評級工作的指示〉中關於學校幹部評級的辦法進行評級。

(原載西北軍區、第一野戰軍政治部半月刊《工作通訊》第62期〔1951年5月15日〕)

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建立強大國防軍：紀念建軍 24 週年

8月1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24週年紀念日，是全國軍隊工作同志特別應該紀念的一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它誕生的一天起，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和國內外的敵人進行著武裝的鬥爭的。在三次大規模的國內革命戰爭和一次抗日戰爭中能夠成長和壯大起來，並終於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個強大的敵人，它和共產黨的領導及毛主席的馬列主義軍事思想指導是分不開的。今天，我們來紀念我軍的24週年，努力的來學習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對於我們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的國防軍，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個法寶

我黨從1921年誕生至1926年，由於當時處在幼年的時代，對建設與掌握革命軍隊的工作，是沒有十分重視起來的。那時的主要工作，在於組織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及至1927年賣國賊蔣介石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大屠殺後，中國革命的浪潮不得不由勝利進攻的形式，而轉入有組織的退卻，以積蓄革命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也正由於這次革命的失敗，給了中國共產黨極重要的教訓之一，就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裝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沒有革命的軍隊就沒有革命的一切。這一教訓，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被證明是正確的，在以後

的革命戰爭中，也證明是正確的。因此，從1927年蔣介石發動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大屠殺後，我們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著手於組織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首先發動了「八一」南昌起義，和毛主席領導的秋收暴動，以及以後在中國的南部、西南部、西北部、各地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暴動和紅軍游擊隊的蜂擁產生，而革命的火焰繼續在全國燃燒著。正如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24年的經驗證明：凡是有人民軍隊的地方，人民革命就可以發展起來，人民就可以得到翻身，反動派的統治機構就可以被打垮，人民的政權就可以建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就可以很快擴大和深入群眾，人民的革命覺悟水平就可以很快的得到提高，革命的形式也就會高漲起來。否則，就沒有共產黨和人民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一切。我們黨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完全掌握了中國革命的這一特點：「中國革命的特點同時也是優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斯大林）。所以，在24年的革命戰爭中，從有紅軍的第一天起，到今天成長為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止，毛主席對於人民軍隊的強大，看成中國革命勝利的主要因素，人民的地位、革命的一切，是要依靠槍桿子創造的。毛主席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說：「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在同一文章，他又說：「一切問題依靠戰爭去解決，中國的存亡繫於戰爭的勝負，因此，研究軍事的理論，研究戰略和戰術，研究軍隊政治工作，不可或緩。」

在中國革命取得了基本勝利之後，在1949年的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又說：「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就是在全國勝利之後，在國內沒有消滅階級和世界上存在著帝國主義制度的歷史時期內，我們軍隊還是一個戰鬥隊。」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說：「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這對發展武裝力量的重要性，作了多麼肯定的結論。

但目前我們回頭來檢查一下我們現在有些軍隊工作同志，他們의思想和毛主席的只是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如有些人認為革命勝利了，就該讓他

「換班回家」了，有些人認為自己年紀大了，應該「解甲歸田，告老還鄉」了。說甚麼當兵沒有完，永遠戰鬥隊永遠是和尚隊。甚至有些人，經不起勝利環境的考驗，竟然墮落腐化起來了。這些，都是政治上的近視眼，他們缺乏遠大的共產主義眼光。如果不能努力學習，力求進步，他們將要變成鼠目寸光的小人。

毛主席以馬列主義的軍事思想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戰術

24年來的武裝鬥爭經驗證明：沒有革命的力量，就沒有革命的勝利。這一真理，是毛主席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人民的解放運動中的馬列主義理論的發展。但同樣的，只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作用，而不懂得武裝鬥爭的正確戰略戰術，那麼這種武裝鬥爭也會被反革命的武裝消滅的。而我黨的英明領袖毛主席對於中國革命戰爭的問題，不僅制定了馬列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同樣制定了馬列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以及每一地域每一時代的戰略戰術。因此才能保證了中國的革命武裝力量，能夠成長壯大以至最後的戰勝敵人而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

從1927年中國有了人民軍隊起，毛主席即根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國，和敵強我弱，敵大我小，敵人脫離群眾，我們聯繫群眾的特點，制定了紅軍戰略戰術。在紅軍幼年時代，他就規定了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16字訣。在他的這個基本的軍事原則下，紅軍的力量得到了發展，革命的根據地的得以建立，及至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在全國範圍內較普遍地發展起來的時間中，毛主席即制定了一系列的馬列主義戰略戰術，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中詳細的規定了我軍的戰略戰術。他說：「很明顯的，正確的規定戰略方向，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守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要反對紅軍的游擊主義，卻又要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與戰略的速決戰；反對固定的作戰線和陣地戰，承認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運動戰；反對擊潰戰，承認消滅戰；反對戰略方向的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大後方制度，承認小後方制度；反對絕對的集中指揮，承認相對的集中指揮；反對單純軍事觀點與流寇主義，承認紅軍是蘇維埃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反對土匪主義，承認嚴肅的政治紀律；反對軍閥主義，承認有限制

的民主生活與有威權的軍事紀律；反對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承認正確的幹部政策；反對孤立政策，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後，反對把紅軍停頓於舊階段，爭取紅軍發展到新階段。」這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原則，在中國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中都證明是正確的。凡是執行了這一戰略戰術原則的，戰爭就會取得勝利，軍隊就會得到發展，相反的，不執行這一戰略戰術者，戰爭就一定要遭到挫敗，軍隊也一定就要受到削弱或被消滅。比如在1934年的反對五次「圍剿」的戰爭中，當時的機會主義者執行了一套與毛主席軍事思想相反的原則，結果是反對五次圍剿成了大規模的「搬家」。他們的甚麼原則呢？這就是：「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拒敵於國門之外」，是「先發制人」，「不打爛罐罐」，「不喪失一寸土地」，「六路分兵」，「反對五次圍剿是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後方主義」，是「絕對集中指揮」，是「短促突擊」。在他們的這些軍事原則之下，使當時全國的根據地和紅軍除陝甘蘇區外，都沒有禦敵於國門之外，蘇區土地也喪失的沒有留下一寸。這一歷史上的慘痛教訓，應引起我們全黨及軍隊工作同志的深刻汲取。

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戰爭之實際結合，它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隨時指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新的軍事原則，如在1937年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毛主席根據了敵我情況與戰爭性質，提出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抗日戰爭的發展階段、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這些，在其名著《論持久戰》中有詳細的闡述。在1946年開始的解放戰爭進行的16個月之後，毛主席在〈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中，又指出解放軍的十大軍事原則，這個原則，對於最後打敗蔣介石的解放戰爭，給了一個勝利的保證。有了正確的軍事路線與戰略戰術，還必須有著正確的軍事行動和軍隊指揮，才能把它變為實際，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否則，正確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也就會變成空洞的東西，不能指導戰爭走向勝利。這裏就提出了一個學習的問題，就是我們從事軍隊工作和指導戰爭的同志，必須要很好的學習。毛主席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因此，學習和認識的對象，包括敵我兩方面，這兩方面都應該看成研究的對象，只有我們的頭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體。有一種人明於

知己，暗於知彼，又有一種人，明於知彼，暗於知己，他們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和使用的問題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我們過去某些戰爭上的失利，歸根到底，不是由於明於知己，暗於知彼，就是因為明於知彼而暗於知己的緣故。特別是對於敵人的了解和研究，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更是應該特別的注意，對於敵人情況的了解和摸熟敵人的規律，往往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所以，毛主席說：「經驗多的軍人，假使他是虛心學習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隊（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又摸熟了敵人部隊（同樣，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摸熟了一切和戰爭有關的其它的條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等，這樣的軍人指導戰爭或作戰，就比較地有把握，比較地能打勝仗。這是在長時間內認識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找出了行動的規律，解決了主觀和客觀的矛盾的結果。這一認識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一種長時間的經驗，要了解 and 把握戰爭的規律是困難的。」（同上）在西北三年解放戰爭中，從每次戰役的勝利看，都證明了彭德懷同志對於胡馬匪軍的行動完全是摸熟了他的脾氣，他是執行毛主席軍事思想的典範，是我們軍隊工作同志學習的榜樣。

政治工作是人民軍隊建設的重要一項

24年來的戰爭和建設人民軍隊的經驗證明：毛主席對於人民解放軍隊政治工作方面的指示，完全是正確的。著名的古田會議的決議，首先明確的規定了以「打仗、籌款、作群眾工作」為紅軍的三大任務。他說：「紅軍的打仗，不是為打仗而打仗，完全是為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設政權才去打仗的，離開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政權等目標，就是完全失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根本失了紅軍存在的意義。」在24年來的建軍過程中，證明了凡是脫離群眾不做群眾工作的軍隊，一定就不能打勝仗，一定就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閥軍隊一樣而不能存在。其次，這個決議上，對於當時紅四軍黨內存在的「不正確思想意識，以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分析的方法，明確了作了批判，並指出了糾正的辦法，事實上當時紅四軍中黨內存在的那些不正確傾向，一直到現在，在我們部隊中還是或多或少的存在著。第三，這個決議上，對於紅軍內的建黨，以及組織、宣

傳、青年等工作，都作了正確的規定。對於俘虜政策與廢除肉刑都從階級觀點上進行了分析，並定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在24年的建軍過程中，證明了古田會議的決議，是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建設上有歷史意義的文獻。不僅如此，毛主席對於軍隊政治工作還做了更明確的闡述。他說：「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三個，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則，這就是肅清了封建主義，廢除了打罵制度，建立自覺紀律，實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軍是團結一致的；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與武裝群眾，減輕群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第三是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在這一工作上，我們的勝利不但依靠我軍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與英國記者貝特蘭之談話）。在政治工作的這些原則下，24年來，人民解放軍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經驗，比如在官兵一致方面，由於在部隊中肅清了封建主義，而實行了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的緣故，官兵之間，對於錯誤與缺點的糾正，一般的都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主要的教育方法。對於每一成員的思想意識和戰鬥工作的檢查，都以群眾路線的方法互相進行批評，以和平說理的方法進行教育，做到有缺點或錯誤的人能從思想上認清產生錯誤的根源，達到心悅誠服，力行改正的程度，特別自1947年全軍進行了查階級、查思想、查鬥志的新式整軍後，軍隊政治工作增加了不少新經驗和新方法。可惜我們對於這新式整軍的經驗，還沒有把它系統的條理化地總結起來。在軍民一致的原則上，對於群眾紀律的執行，不光依靠軍紀維持。而主要的是使戰士懂得為甚麼要執行群眾紀律，懂得為甚麼當兵，為誰打仗，我們是人民的軍隊這些基本道理。軍隊的政治覺悟越高，冒犯群眾紀律，脫離群眾的現象就會越少。因此，在我們人民解放軍所到過的地方，都自動幫助群眾生產，幫助群眾解決困難。募捐糧款，救濟貧苦人民，實行所謂「滿缺運動」和「房院包工制」，群眾一致稱讚：「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軍隊。」「哪裏解放軍沒有到過，哪裏的群眾就沒有解放」，盼望人民解放軍和盼望親人一樣。在瓦解敵軍與優待俘虜的原則上，已成為我黨群眾性的工作，不打罵，不侮辱，不搜腰包的俘虜政策，群眾互相監督執行，俘虜兵過來，經過短期階級教育，就參加了人民解放軍的行列，在解放戰爭時期，對於爭取改造俘虜的工作，創造了比較豐富的經驗。即在全國戰場上，不僅武器給養取之於敵，而且大量的

兵源亦來之於敵，我們對於他們改造的可能，正如毛主席說的一樣：「紅軍像一座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融化。」他們作戰表現也如毛主席所說的一樣：「同時一個兵，前日替敵軍打仗不如今日替紅軍打仗之勇敢。」為甚麼能夠這樣呢？就是因為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為人民的翻身而戰鬥的軍隊，一些被蔣匪幫抓捕的士兵，一從階級觀點去啟發教育，很快的覺悟過來了。這種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革命戰爭中，改造俘虜成為自己的兵源，已為我們的鬥爭歷史所實踐了。

建設強大的國防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24年的戰鬥，已經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使落後貧困的中國，逐漸走向繁榮富強。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把我們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現代化正規化的國防軍，以期有效地保護祖國的安全，隨時粉碎任何帝國主義的進犯。但這種現代化正規化的國防軍建設中，正如朱總司令所說：「國防軍建設，必須是在我軍已有的優良基礎上去繼續提高。拋棄已有的基礎，孤立的去學習正規化、現代化是不對的；反之滿足於已有的基礎，拒絕學習正規化、現代化的保守主義更是不對的。」這是我們在建設國防軍上首先在思想上要弄清楚的問題，不然在建設過程中，就會發生偏向或走了彎路。在建設國防軍的具體工作上，主要應該是這一些：首先是建立正規化的軍事生活與軍事秩序，反對游擊習氣與自由散漫，按「內務條例」與「紀律條例」，健全軍事生活，養成革命軍人應有的氣質。對開始的一些不習慣和抗拒情緒的行為，必須從思想教育和組織強制兩方面糾正，偏於前者就不易很快達到整齊劃一，偏於後者就會造成單純的紀律服從，而沒有自覺遵守的基礎。故二者是相輔以行，缺一不可的。

其次是培養國防軍的幹部。目前我們西北，已設有步、炮、通、空等兵種學校，已抽調了大批幹部入校學習。但有些單位在輸送學員問題上，不能完全按條件進行，因此影響其培養效果，這種現象是不對的。如將不斷發生下去，將會影響建校與培養幹部的目的。

第三是學習技術。特別學習新兵種與新武器的技術。目前在我們建設國防軍的問題上，缺乏指揮現代戰爭的幹部與缺乏掌握現代武器技術的戰鬥員，是兩個比較大的問題。目前以大力來解決這兩個問題，是建設國防軍上不可或緩的任務。

同時，我們還要看到：我們今天建設國防軍還有許多有利條件，如我們有毛主席建軍傳統與軍事思想的指導，我們有24年來的戰爭經驗並有優良基礎，我們已取得了全國的勝利，物質資源有較充分的保證，最後還有偉大友邦蘇聯的先進建軍經驗，給我們建軍上許多的借鑒和榜樣。這些條件，我們如果能夠很好地利用起來，那麼，我們建設強大的國防也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24年來，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毛主席的正確的軍事路線下，已獲有許多寶貴的建軍經驗和作戰經驗，大家努力的來學習毛主席的軍事思想，來總結自己的工作經驗，對於我們建設強大的國防軍有著很大的作用。

建設正規化、現代化國防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

毛主席萬歲！

朱總司令萬歲！

1951年8月1日

(原載西北軍區、第一野戰軍政治部半月刊《工作通訊》第67期〔1951年8月1日〕)

三、新中國經濟發展

陝西省工業建設的開端

陝西省是我國經濟比較落後的一個省份。解放以前，沒有現代化的工業，只有幾家中小型的紡織廠和麵粉廠。現代化的交通運輸工具，只有隴海鐵路的潼關到寶雞一段；國民黨反動統治者，雖然曾經叫喊「開發大西北」，但是始終沒有甚麼實際行動。相反的，他們為了圍攻和破壞當時的陝甘寧邊區，不顧民族和國家的危亡，調集了40萬左右的反動軍隊，集中在這裏進行騷擾。他們建設的不是工廠，而是碉堡和防線；他們挖掘的不是礦山，而是戰壕和陷坑。這個本來經濟就很落後的地方，讓他們糟踏得更是滿目瘡痍，一片荒涼了。

解放後僅三年的時間，陝西省的經濟很快就恢復到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最高水平。從1953年起，我們執行了國家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陝西地區的工人階級克服重重困難，在國民黨反動派遺留下的戰壕和碉堡群上，開始了有計劃的工業建設。

陝西省是祖國的內地，具有發展工業的有利條件，國家從合理分布工業區劃的觀點出發，確定陝西為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建設的重點地區之一，給予我們的工業建設任務十分艱巨。基本建設所佔用的土地面積，在西安、咸陽、興平、寶雞、鄠縣一帶，達40多萬畝（其中一部分是為工業服務的民用建築），目前已經完成了600餘萬平方公尺的建築工程。建築工程所需要的施工力量近10萬人，每年建築物所需要的鋼材約10多萬噸，水泥約40多萬噸，磚瓦近10億塊。從這個數字中，不難看出它的規模是多麼的巨大。陝西地區的建設速度也是很快的。據初步計算，第一個五年

計劃中限額以上的項目的投資額，到1957年末，預計可以超額完成8%；今年上半年完成的投資額為去年同期完成的281%。從主要工程的建設速度看，平均可以提前11個月以上；同樣性質的工廠，一個比一個建設得快。例如建設第一個5萬錠的紡織廠，歷時11個月，建設第二個同樣規模的紡織廠，就只用了8個月，建設第三個10萬錠的紡織廠，只要9個月。工程質量也是一個比一個高。

現在，陝西省的面貌已經改變了。如果你到西安、咸陽、興平、寶雞一帶去觀光一下，你所看到的，已經不再是碉堡和戰壕，而是一片一片的整齊嶄新的廠房和職工宿舍。到處聽到的，也是建築機械的轉動聲和運輸材料的火車、汽車的鳴笛聲。

隨著大規模工業建設的開始，交通運輸事業也在迅速發展。橫貫祖國西北、西南的大動脈——寶成鐵路，已經全線接軌了。

像這樣大規模的工業和鐵道建設，如果沒有當地出產的煤炭作燃料，而靠遠地運輸供給，它將會給工業生產帶來多大的損失。陝西的煤炭蘊藏量，是很豐富的。僅據現在探明的渭北煤田，儲量即達50餘億噸，估計陝西全省的煤藏量，將達500億噸左右。根據西北煤田地質勘探局的資料，在渭北煤田的銅川礦區，截至今年7月底，已經交出了11個井口的地質精查資料，其儲量達4億多噸。到今年底，在這個地區還可交出10億噸的精查儲量資料，它可以滿足第二個五年計劃在這個地區建井的需要。目前在銅川地區的新建礦井和改建礦井，已經完成了兩個改建工程，新建的銅川的王家河一號二號井和三里洞豎井，不久也將投入生產。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井任務預計可以提前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井工程，也正在積極地進行準備工作。

建設這樣規模的工業和鐵道，困難是很多的。但是，陝西地區的工人沒有在困難面前低頭，他們以要「高山低頭，河水讓路」的精神，依靠集體力量和集體智慧，克服了建設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難。自今年3月黨中央發出了開展先進生產者運動的號召後，在全省範圍內廣泛的開展了社會主義競賽和先進生產者運動。半年來，這個運動已形成了規模宏大的群眾性運動。據11個行業的統計，參加廠際競賽的有258個單位，提出保證完成生產條件的有75,000多人，突破舊定額、創造新紀錄的單位和個人約佔職工的30%以上，提出各項合理化建議2萬多條，推廣了各種先進經驗1,000

餘項，湧現出先進生產單位563個，評選出先進生產者3萬多人。這些先進單位和先進人物，在建設工作中都起了帶頭作用，像建築木工傅阿坤經過幾個月的研究，創造了自動打夯機，一人能管兩部，一部打夯機一天等於64人的工作量。門窗工張敏才，創造了四刃刨，工效提高了三倍多。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陝西地區沒有現成的建設人才，因此，這給工業建設帶來很大困難，怎麼辦呢？陝西省領導部門採取了在建設過程中，普遍地組織在職幹部進行學習來解決幹部不足的困難。沒有文化的學文化，沒有技術的學技術。幾年來，工業建設人才，已經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完全不懂到懂。但是，目前的幹部數量和質量，仍然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幹部的缺額不是幾十、幾百、幾千，而是幾萬。解決的辦法，還是只有「自力更生」，除了國家在學校培養外，今年組織了大量的工人和幹部進行在職學習。根據5月份不完全統計，已經開辦了文化、技術業餘學校665處，參加學習的職工已達15萬人。而有些單位參加學習的人數竟達職工的97%以上。經過這樣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就可以生長出大批的幹部來。像第一棉紡織廠，採用這樣的辦法，兩三年來，他們培養提拔了600多個幹部。特別是在黨中央提出12年內趕上世界科學技術水平的號召後，廣大職工向文化科學進軍的熱潮更廣泛地高漲起來了，有些單位工程技術人員的在職學習計劃，要在12年內達到副博士的學術水平。

上面這些，僅僅是陝西地區工業建設的開始，更大規模的建設，還在後面，第二個和第三個五年計劃，將有更大的任務擺在陝西地區的工人面前。從陝西的地理條件和地下蘊藏來看，工業建設發展的前途是廣闊的。對開發祖國大西北的豐富寶藏，陝西省將是一個前進基地。在運輸方面，西安將是全國最大的鐵路樞紐之一，它以隴海線為骨幹，除了西蘭、寶成之外，還將要通向西(安)漢(漢口)、西(安)武(武威)、西(安)同(大同)、西(安)包(包頭)等地，東西南北，四通八達，將形成一個輻射狀的鐵路網。在電氣工業方面，三門峽水庫的建成，和陝西無定河、延河、渭河、涇河、洛河的攔洪壩的興建，都可以建設水力發電站，供應城市和農村的用電，全省高壓線路的架設，將會形成一個縱橫交織的空中輸電網。在礦產方面，除掉已探明的渭北大煤田可供大規模開採外，目前正在勘探的秦嶺山脈，已發現了一個世界稀有的大鉛礦；秦嶺的寶藏雖然現在

還是一個謎，但不久的將來，就會把這個謎識破。隨著這些鐵路和電氣的建設，更多的工廠礦山也將要出現，而現在正在進行建設的工廠和將要開始建設的工廠預期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末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都要先後投入生產。那時候，陝西的經濟面貌，就將完全改變了。

中共陝西省委工業部長 魯直

(原載1956年10月12日《人民日報》第2版)

在工業企業中開展群眾運動的若干經驗

發動群眾做好工作，這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我們的幹部一般都懂得必須發動群眾的道理。曾經在農村中和軍隊裏工作過的同志也都有一套發動群眾的本領。在全國解放之後，情況變了，搞好經濟建設，成為我們的主要任務。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要抽調大批幹部出來到工業戰線上工作。這些轉到工業戰線的幹部，開初，對於工業工作，自然都是沒有經驗的。他們過去學會的本領，有些是過時了，有些是用不著了，許多工作都要從頭學起。但是，像發動群眾做好工作，這樣一個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在任何時候，對任何工作，都是應該貫徹執行的。然而，去年以前，在工業生產方面這個路線卻似乎被一些人忽略了。甚至有人把在工業企業裏大搞群眾運動，叫作「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他們說：工業生產有集中性和連續性，工業管理是計劃管理和科學管理。固然，這些說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認為在工業企業裏發動了群眾，就會打亂「正常」的生產秩序，在工業企業裏大搞了群眾運動，就認為是「外行」們做的事，這就沒有甚麼道理了。正是因為有人怕打亂「正常」生產秩序，而向著所謂「正規化」的方向找出路，所以就使得過去幾年來的工業工作雖然成績大，但在某些方面不像去年那樣生氣勃勃。

1958年，經過整風運動之後，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發揚了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在工業企業裏大搞了群眾運動。事實證明，和過去的那些說法相反，不但沒有違反了工業的集中性和連續性，影響了生產，而且強化了工業的集中性和連續性，大大地推動了生產。1958年的

工業生產建設，獲得了空前偉大的成就，造成了我國今後繼續大躍進的形勢，加速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伐。這些事實，不但教育了幹部，也教育了群眾，再一次證明了黨的群眾路線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工作路線。

現在，對於在工業企業中能不能大搞群眾運動的問題，許多人已經基本解決了；仍然持有懷疑態度的人，也是極少數了。但是，怎麼更好地組織領導工業企業中的群眾運動，則是一個還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這裏，我們僅就陝西省去年大搞群眾運動的經驗，對若干問題提出一些意見。

只有克服右傾保守思想，才能大搞群眾運動

根據去年的經驗，我們認為：今後要繼續大搞群眾運動，首先必須繼續克服幹部的右傾保守思想。否則，大搞群眾運動是不可能的。這裏有人要問，為甚麼會產生右傾保守思想，而又怎樣去克服它呢？我們認為：這應該從兩方面來說明問題。即：一方面，我們應該承認：「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客觀的存在，決定主觀的意識。所以人們的主觀認識，總是落後於客觀事物的發展的。人們對於運動中的事物，往往是看不準確的。這就是右傾保守思想可能產生的客觀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應該承認：客觀事物的發展，可以為人們如實地正確地反映，經過觀察綜合，分析判斷，它的發展規律是可以認識、可以掌握的，「理論指導實際」的作用，是肯定的。科學的預見，也是可以作到的，這就是克服右傾保守思想的主觀條件。從這兩方面來看問題，才是全面的。而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就是因為他們強調了前一面，而忽視了後一面。所以，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片面的、靜止的、孤立的。是向後看，而不是向前看，是見舊不見新，見物不見人。在工業企業中，它的最普遍的表現是：第一，把平衡絕對化。他們沒有認識到，任何事物的發展，平衡總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長期的、絕對的。因此，他們在制定或討論生產計劃時，生怕突破了平衡關係。他們重視的是可以用數字計算的物質因素，而忽視的是不能用數字計算的人的作用。當然，在制定生產計劃時，定一個數字間的比例關係是需要的。我們主張，應該根據發展情況不斷地調整計劃，就是由平衡走向不平衡，再在不平衡的基礎上達到平衡。這種平衡

和不平衡的交替出現，說明企業的生產潛力是無窮無盡的。而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總是看不到這種潛在力量。第二，唯條件論，強調困難。他們常常把困難擺在第一線，總是說，設備不足，材料缺乏，工人不夠，所以也就不能增產。他們認識了這些困難是應該的，但是，問題不在於認識了困難，而更重要的在於克服困難和解決困難。大家知道，去年各縣、市發動群眾大辦地方工業時，不是沒有困難的，而是克服了重重困難之後，才大量地發展的。但是，今年不少的地方，在材料暫時不足的情況下，又說甚麼不能發動群眾了。他們不是想盡一切辦法發動群眾，完成計劃，而是等待有了條件，再去發動群眾。總之，他們不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苦幹與巧幹相結合，而是等待條件，為困難嚇倒，把苦幹與巧幹對立起來。此外，他們還「沾沾自喜」於去年大躍進的成就，認為已經搞得差不多了，滿足現狀，不求前進。上面這些右傾保守思想的表現，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去年有，今年依然有，將來也還會有，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別而已。所以，我們認為：只有不斷地克服右傾保守思想，才能促進我們的生產繼續大躍進，也才能繼續開展群眾運動。

在黨委統一領導下，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爭取生產、思想、技術三豐收

開展群眾運動，解決了思想問題之後，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加強黨對群眾運動的集中的、統一的領導問題。不可設想，任何一個群眾運動，離開了黨的領導，而能夠搞好的。根據去年的經驗，在工業企業裏，大搞群眾運動，必須把黨、政、工、團各方面的步調統一起來。防止借搞運動的機會，孤立地開展一個部門的工作。因為那樣會分散了群眾的精力，影響運動的深入開展，結果，不但部門的運動沒有搞好，而且影響了中心任務的完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向同志們講清楚：「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毛澤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而第二、第三位的工作，必須在圍繞中心工作的條件下進行。否則，群眾運動是搞不好的。這是領導群眾運動的第一個問題。領導群眾運動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對於各項工作的統籌兼顧和全面安排。1958年

的群眾運動，是一個接著一個進行的。在整風運動勝利之後，又開展了反保守、反浪費運動，在這個運動的基礎上，又出現了生產高潮。為了適應生產高潮的需要，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高潮又接踵而來。這樣，在整個工業企業裏，形成了一個運動套運動、高潮套高潮的錯綜複雜的局面。可是，我們有些同志，在這樣的情況下，眼花繚亂，頭腦發熱，而隨著運動打轉。於是對各項工作，缺乏統籌兼顧和全面安排，不是抓了這一面，就是抓了那一面，捨了這個，丟了那個。譬如：去年，有些單位，抓了生產，而忽視了教育，沒有完全做到生產教育兩不誤。這裏，我們還要說明：在群眾運動發展到一定的情況下，為了解決工作中的某些關鍵問題，為了保持群眾的旺盛士氣，在一定的時間內，集中全力進行短期的突擊，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這只能是短期的和一定情況下的，而不應該也不可能是事事這樣和天天都這樣的。因此，那種企圖把群眾運動，經常置於突擊的狀態下，只顧一方面的或者只顧一個問題的解決，而不顧其他工作的作法是不對的。正確的作法是，在運動中把經常性的工作和突擊性的工作結合起來，把長期的計劃和短期的安排結合起來。而這樣的安排，和運動發展中在一定時間內又有一個方面的側重點，也是不矛盾的。因此，今後在工業企業內大搞群眾運動中，必須把生產、教育、技術學習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力爭生產、思想、技術三豐收。領導群眾運動的第三個問題，是要加強運動中的具體組織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適應運動的發展。去年的經驗證明：在生產運動中常常碰到的問題是，在運動開展起來之後，就會出現生產的調度工作趕不上，原材料的供應趕不上等等現象。由此，使整個運動中的鎖鏈，發生某些脫節現象，影響生產有節奏地進行，影響群眾的情緒。為了克服這些現象，在今後的生產運動中，我們必須預見到這些問題，並充分地進行準備，組織各方面的力量密切配合，及時地加以解決。領導群眾運動的第四個問題，就是在群眾發動起來之後，要防止發生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的傾向。在一般情況下，群眾的積極性越高，領導上的命令主義現象，就越容易發生。就是說這時候，本來應該和群眾商量的，也不去和群眾商量了；本來群眾的思想還沒有打通，應該很好地進行說服教育的，也就不去很好地進行說服教育了。他們主觀地以為領導上懂得的事，群眾也一定懂得了。他們超過了群眾的覺悟程度，而簡單地依靠命令辦事。他們忽略了在群眾運動中應該把黨的口號變

為群眾自己的口號，應該把黨所提出的任務變為群眾自己的任務的道理。所以，很容易為了追求運動表面上的轟轟烈烈，不顧群眾的覺悟程度和實際可能，規定了不切合實際的指標，而要群眾完成，犯命令主義的毛病。為了防止這種現象的產生，我們在組織實施計劃任務的時候，必須貫徹實行「交底」工作。就是把國家的或上級部門下達的計劃，向全廠的職工群眾交代清楚，並發動群眾廣泛深入地進行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細心地聽取群眾的意見，討論和制定實現計劃的措施。通過這樣的討論，使每一個職工都明確自己所負擔的任務和奮鬥的目標，並訂出自己實現計劃的保證條件。我們認為：經過群眾討論的計劃，才是有群眾基礎的計劃，才是有可能實現的計劃，才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計劃。除此而外，我們還要防止尾巴主義的偏向。因為在群眾發動起來之後，他們會對領導作風上、工作制度上、生活管理上，提出成千上萬條意見來。對於這些意見，領導上應該虛心地傾聽，認真地分析。凡屬合理的部分，而且應該採納的，必須及時採納辦理。凡屬不夠合理或者很不合理的、不能採納的，也必須向群眾交代清楚。對於運動的新的問題和新的經驗，必須及時地加以研究和總結。對於群眾的發明和創造，則更應給以熱情的鼓勵和積極的支持。但是如果普遍推廣時，那就必須經過試驗和上級領導機關的批准。因此，在群眾運動中，不能對群眾可能做和已經做了的事，領導上還不敢提倡和動員群眾去做，也不能群眾要怎樣辦，領導也就怎樣辦，而落後於群眾或遷就群眾，做群眾的尾巴。

結合節日獻禮活動和貫徹黨的號召，組織群眾性的生產高潮

工業生產的特點主要是它的集中性和連續性，沒有像農業生產那樣四時八節的自然氣候的影響。因此，在工業企業中，動員群眾掀起生產高潮，一般地不受天時地利的影響。但是我們在工業企業中，發動群眾時，也應該選擇比較有利的時機，並且提出能夠動員群眾的響亮口號。經驗證明：利用重大紀念節日和結合貫徹黨提出來的政治號召，動員職工群眾，開展運動，是比較有效的一種方式。去年，我們密切結合了黨提出的15年左右趕上英國，幾年之內工業總產值趕上農業總產值、爭取超額完成1,070萬噸鋼等等政治口號來發動群眾，同時也利用了「五一」、「七一」、

「十一」等紀念節日，號召職工獻禮。這樣連續不斷地發動群眾，就使去年的群眾運動造成了一浪接一浪、高潮再高潮的形勢。除此以外，我們還根據了企業生產上某些薄弱環節，組織了一定時期或一個方面的高質高產運動。在開展運動的形式上，我們又利用了企業比較集中的特點，組織幾萬、幾十萬人的全省全市廣播動員大會，邀請當地黨政主要負責同志發出號召，然後，動員工業戰線上的一切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先進生產者和模範人物，帶頭響應號召。同時，組織各個廠礦、各個車間、各個工段對於國家給予的生產計劃，展開深入的討論，提出保證完成計劃的措施，把黨提出的任務，變成群眾自己的任務。這樣，在幾天之內，在全省或全市的範圍內，立即掀起了一個波瀾壯闊的生產高潮。這種景象，一方面，說明了我國工人階級具有高度的覺悟水平，對黨抱有無限的信賴。另一方面，又說明了動員群眾的時機，必須選擇適當；動員群眾的口號，必須生動有力。這個經驗，是在去年大搞群眾運動中反復驗證了的。經過了多次的實踐之後，才認識到它是工業企業中發動群眾的一種有效方法。

群眾運動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波浪式的

一切群眾運動，都是千百萬人的活動。它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波浪式的。它不能和一架紡織機上的紗錠一樣，馬達一開所有的錠子都一模一樣地轉動起來了。事實也是如此，不論甚麼樣的群眾運動，即使是在一個地區內的各個企業裏，甚至一個機關裏，在同一天的時間內，布置了同一個運動，它的發展也會是：有快有慢的、有廣有窄的、有深有淺的。為甚麼會這樣呢？就是因為：運動的本身帶有競賽性。誰都不願意落在別人的後面。再就是因為：各企業的工作條件、領導水平、群眾發動的狀況等是千差萬別的。於是，在運動中，就會出現先進和落後單位，以及它們之間互相追趕的情況。先進的更加先進或者落後了，落後的趕上了先進或者超過了，新的追趕鬥爭又展開了。如此循環往復的交錯發展，就造成了運動發展的不平衡性。

運動的發展，也是波浪式的，有起有伏的，一張一弛的。不能設想一個群眾運動，會直線式地發展下去。我們應該在每一運動的間歇中，有計劃地進行總結、評比和獎勵工作，布置下一階段，準備新的戰鬥和迎接新

的高潮。它和我們軍事工作上的戰鬥——休整——再戰鬥的規律是一樣的。所以，我們認為：任何一個群眾運動，在它的發展過程中，一定是有高潮也有低潮的，有戰鬥也有休整的。而往往又是，低潮過去來高潮，休整以後再戰鬥。所以，在領導運動中，只看見高潮，而看不見波浪，是不對的。只願意休整，而不再苦戰，更是不對的。為了使運動的發展，由不平衡走向平衡，就要掌握運動發展的不平衡規律，去不斷地開展運動。應該認識到，在社會主義的工業企業中，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推動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的一種運動；同時，也起著調節生產關係上某些環節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作用（如運動中對於規章制度的改革）。那些不大贊成在工業裏搞運動的人們，是由於他們沒有認識到群眾運動推動生產的巨大作用；是由於他們滿足於工業的機械運動，看不到無窮無盡的群眾的力量。而工業的機械的運動，只有在人們的掌握下才是能夠進行的。

正確地貫徹兩參、一改、三結合制度

群眾運動發展的過程，就是克服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思想作風的過程，也就是密切領導與群眾關係的過程。去年的群眾運動，在這些方面，收到了比較顯著的成績。尤其是推行了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規章制度和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工人群眾三方面結合的方法，所收到的效果，更為突出。在幹部參加勞動方面，去年一年，全省工業幹部參加勞動的大約有二萬人左右。其中，一部分是經過考驗的領導骨幹，一部分是沒有經過好多考驗的一般幹部，他們參加勞動之後，對密切領導和群眾的關係，解決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都起了極大的作用。這充分地說明了黨的幹部參加勞動的政策，是十分正確的。根據一年來的實踐，我們認為：前一部分幹部參加勞動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勞動的形式，克服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密切與廣大群眾的聯繫，更好地領導企業生產；後一部分幹部參加勞動的主要目的，則是鍛煉他們的勞動觀點，並在勞動中進行實際考驗。這樣，對不同的幹部，提出不同的要求，我們認為是完全必要的。為此，企業領導幹部參加勞動，就不應該是單純進行體力勞動，起著一個普通工人的作用。而應該通過參加勞動的形式，主要地去調查研究企業中存在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目前，按

照工業企業中的實際情況，領導幹部參加勞動的時候，應當調查研究企業生產上人力和物力的浪費現象；應當調查了解各車間各工種配合協作的情況；應當調查研究群眾的思想動態，以便及時解決群眾的思想問題；應當檢查領導機關制定的決議、計劃的執行情況，並了解這些決議、計劃的正確程度。凡此，都應當是領導幹部參加勞動的主要任務。但是，有些參加勞動的領導幹部，卻埋頭於一個車間，專心致力於一個工種，企圖在短時間內，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精通技術的幹部。作為一個領導幹部來說，既參加了勞動，又學到了技術，當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在短時間內，這樣去作，那就是主次不分了。因此，我們認為：所有的領導幹部，在參加勞動的同時，除了盡可能地學會一些生產技術外，著重的應該是解決問題和指導生產。

在工人參加管理方面，一年來，也收到了顯著的效果。它表現在：工人階級的主人翁責任感加強了，對工具的使用和保管比過去愛護了；遲到早退和缺勤曠工的現象減少了；生產的積極性高漲了；與不良現象作鬥爭的空氣濃厚了；管理部門的脫產幹部減少了。同時，也開闢了培養和提拔幹部的廣大泉源。凡此種種，都說明了工人參加管理的方法，在社會主義企業中，是必須推廣的方法。但是，目前有些單位，在這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的是：不看具體情況和需要程度，一律設置了「八大員」或「十大員」；對於工人參加管理工作的時間，沒有作出具體的規定，影響了工人的休息；把許多不應該下放的權力放下了；對於工人的技能估計不適當，分配了一些力不勝任的工作；對於技術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發揮得不夠。這些問題，都是應該迅速解決的問題。否則，就不能更大限度地發揮工人參加管理的作用。

為了發揮工人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為了提高各項工作的效率，對於規章制度的改革與建立，必須採取慎重的態度。去年在工業企業中，由於對規章制度進行了改革，大大地推動了生產和發揮了工人群眾的積極性，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認，對於某些規章制度的改革，缺乏具體的分析和長遠的打算。結果，把一些不應該改的也改掉了，把一些不該廢除的也廢除了。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規章制度改革的成績。「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在今後的群眾運動中，應當對於過去規章制度的破立情況，進行一次檢查。當改的繼續改，當立的必須立，當恢復的就恢復

(如質量檢查制度等)。鑒於去年的實踐，今後對於建立、改革或廢除規章制度，應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任何破或立，都應該有一個試驗實踐的過程，使之能夠比較適合我們的企業管理情況。同時，還應該區別哪些是暫時性的，哪些是永久性的，哪些是必須通過群眾討論的，哪些是要經過領導機關批准的。只有這樣，規章制度的破和立，才能做得比較正確一些。

為了更好地發揮幹部和廣大工人群眾的智慧，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實行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的三結合。因為，不論領導幹部、工程技術人員或工人群眾，他們的知識和經歷都是不同的。他們看問題的方法也都是有局限性的。而實行了三結合的方法之後，就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比如：在制定生產措施的時候，在進行新產品設計的時候，在改進工藝規程的時候，在處理合理化建議的時候，等等，都應該在黨的領導下，組織三方面的人員，一起大鳴大放，擺事實，講道理，研究解決上述有關方面的關鍵問題。這樣就可以找出比較好的解決辦法。「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不就是和我們所說的「三結合」的道理是一樣的嗎？

以上所述，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發動群眾改革規章制度，實行幹部、技術人員、工人群眾三結合等，是黨的群眾路線在工業企業中的具體運用，是完全符合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原則的，也是使幹部逐漸地由外行變成內行的有效辦法之一。因此，在一切有條件的工業企業中，都應當加以認真的推廣。

1959年5月

(原載中國共產黨陝西省委員會主辦，《思想戰線》總第12期，第6期〔1959年6月1日〕，頁4-11)

附錄：新聞報道。重慶、西安市委動員 全民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立刻行動起來 多多增產糧鋼

本報訊 中共西安市委號召全市職工，立即行動起來，開展一個以糧、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群眾運動。

8月11日，市委召集各較大工廠企業黨、政、工、團負責幹部和市、縣、區各工業主管部門負責幹部舉行動員大會。會上，市委書記處書記魯直代表市委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魯直同志在報告中，談到了西安市工農業生產的大好形勢。他說，西安市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確領導下，保證了工業生產月月超額完成了計劃，做到了生產水平逐月上升。

魯直同志指出，為了完成和超額完成全年生產計劃，當前必須立即開展一個以糧、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他說，市委決定一切企業單位，立即發動職工群眾檢查今年前七個月生產計劃執行情況，同時討論擬訂今後四個多月的指標和措施，並且繼續深入地開展以「四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他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繼續深入生產第一線。市級各工業主管部門的領導幹部以至工廠企業的書記、廠長，第三季度都要以三分之二的時間到工廠、到車間、到高爐旁去，切切實實解決具體問題。

會後，各縣、區，各工廠企業都迅速組織有關幹部討論市委的號召，並且發動全體職工進行討論。市委工業部和有關各工業主管部門已抽調600多名幹部組成工作組，由各部門負責人率領，分別深入30多個基層單位具體幫助工作。

（原載1960年8月19日《人民日報》第1版）

延安

精神探索

魯直文集

「魯直是老一輩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中國革命的早期締造者。他一生見證和參與了中國革命從延安時期直至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這些文章是他領導和投身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珍貴紀錄。本書是魯直工作實踐和調查報告的實錄，是『延安精神』的具體呈現。」

——孫曉忠，華東師範大學

「這本文集是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和早期建設的珍貴一手資料。魯直的著述不僅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精神，而且有對 20 世紀中國革命和社會巨變的深入觀察和反思，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宋耕，香港大學

《延安精神探索》為魯直先生的文章結集。作者畢生從事革命事業，並曾在《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和其他報刊發表大量文章。本書共有三個部分，刊載了作者對於陝甘寧邊區建設、軍隊政治與文化工作和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意見。魯直的文章不但體現了「延安精神」，更能令讀者了解他的個人經歷和 1940 至 1950 年代中國的革命氛圍。本文集亦為學者提供了寶貴的原始史料，對研究中國革命歷史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程，極具參考價值。

魯直（1914–1971），原名魯嘉廉，陝西省橫山縣人（今陝西省榆林市橫山區人），自 1928 年起參與共產主義革命。他先後在縣、市、省等級別擔任共產黨和政府的各種要職，如中共西北局辦公廳秘書、陝甘寧邊區靖邊縣委書記、第一野戰軍和西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兼文化部長、新華社西北野戰分社社長、陝西省委工業部長、西安市委書記、農墾部科委副主任等。

魯曉鵬，魯直之子，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為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比較文學傑出教授。著有《從史實性到虛構性：中國敘事詩學》、《影像、文學、理論：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性》等書，並編有《嶺南學人林縵華文集》和《碧城樂府：林碧城詞集》等書。

封面圖片：魯直，攝於蘭州軍區，1950 年代初。

照片提供：魯曉鵬。

中國現代史 / 個人文集

ISBN 978-988-8946-85-3



9 789888 946853



<https://hkupress.hku.hk>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開放取用電子書